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隐	大同书
默觚	仁学
采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弢园文录外编	
筹洋刍议	虺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论	睡的人醒了
强学—戊戌时论选	
民声—辛亥时论选	
新潮—民初时论选	

盛世危言

郑观应 著
陈志良 选注

(辽)新登字1号

盛世危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 陈志良选注.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61-2

- I. 盛…
- II. ①郑…②陈…
-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②政治-中国-近代-选集
-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9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8,000 印张: 9 $\frac{1}{4}$ 插页: 5
印数: 1—11,596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枫 责任校对: 刘亚杰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定价: 9.7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血与火打开了中华天朝帝国的大门。沉沉昏睡的中国人看到了一幅自身难以理解的画面，历来以世界中心之国自居的中国，居然大大落后于西方和世界。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人关切和奋起的主旋律。启蒙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涵。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力图摆脱愚昧、落后和贫困，求富强、求奋起、求发展的启蒙史。

中国近代启蒙的历史舞台，迅速演出一幅幅壮丽的活剧，它至今催人深思，动人心弦。先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为代表的早期爱国主义思潮登台呐喊，催国人从沉睡中惊醒。而后，形成了两股新的思潮，一股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丁日昌、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思潮，另一股则是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郭嵩涛、容闳、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思潮，而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正是中国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它们在中国的启蒙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起到使国人由改良进到维新再到变革的中介作用，至今仍映现着它的现实意义。

郑观应（18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僑鹤山人，罗浮僑鹤山人、慕雍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雍陌乡人。郑观应既是中国近代最早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思想家，又是一位由买办转化过来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民族资本家。他一生中有近六十五年时间忙于各种工商业的实践活动，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郑观应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与洋务派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过从甚密，但也明显地暴露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郑观应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曾向李鸿章提出十六条建议，认为招商局应办成仿照西方国家的公司，由股东公举董事、总协理，力图克服“官派陋习”，但李鸿章并没有接受郑观应的倡议。又如，由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因是官办的，企业亏损难以维持。盛宣怀推荐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在铁厂按西方经营原则整顿企业，将官办章程改为公司，仿西人商律办法，这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同样也没有被盛宣怀所接纳。正是与洋务派的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使郑观应的启蒙思想迅速地发育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富强救国”改良主义思想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由于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盛世危言》曾有二十多种版本，成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

多的一本书，但其中大多数版本是出版者自行出版，未经郑观应册定。经郑观应本人审定并加序的是三种版本：一是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五卷本；二是1895年增订新编的《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三是1900年增订新编的《盛世危言》八卷本。五卷本有文五十七篇，加附言、附录三十篇，共八十七篇；十四卷本在五卷本的基础增加了一百十三篇，成二百篇，文字达五十五万；八卷本与十四卷本有增有减，基本相仿。这次出版，从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中精选六十四篇，以飨读者。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宣传的改良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郑观应出身于一个与买办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受封建庭训，17岁考秀才未中，于是离开家乡去上海投奔在新德洋行当买办的叔叔郑秀山，并开始学习英语，在办实业的生涯中逐渐形成改良主义思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反映出他的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梯。1873年3月，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刊行，思想尚停留于因果报应与触景伤时略陈利弊两个方面，封建思想与改良思想萌芽同时并存。1880年冬，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由中华印务总局刊行，《易言》舍弃了《救时揭要》中封建迷信的弱点，发挥了《救时揭要》的积极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律法、税务等各个方面，集中宣传了中国要富强必须改革，走效法西方国家的路。《易言》成为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为《盛世危言》构思创造了

条件。

《盛世危言》作为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的成熟著作，书中所宣传的下列思想是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一是“富强救国论”。

“富强救国”是郑观应的救国方略，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富强救国”本质上是实业救国，郑观应不同于洋务派的根本之点在于，他认为要富国先要富民，富民才是富强之本，是世界各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共同点。郑观应指出：“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①因而，郑观应的改良思想是从“实业为本”与“民为本”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的。郑观应曾以煤矿为例，力述其富强之道。他认为，中国有煤矿可开采量一千万亿吨，足够一千年之开采，但现在须大量进口煤，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大量引入外资，创造外资适宜生存的“良好之矿法”，二是彻底改变官署发号施令的“官办”之风。只要按此良策运转，“以中国矿产之富，矿苗之旺，人工之廉，诚定有良好矿法，吸入外资办理，又得公正廉洁才干明敏之员，将不十年必变为煤铁输出国矣，又何至仰赖外人接济也哉。”^②但郑观应的富强方案，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理想，是一个早熟的夭折儿。郑观应一生奔波于

① 《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② 《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2页。

实业，但各种事业“十举九败”，处处碰壁，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生存和思想状态，使郑观应触及到一些极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人们和后来者带来更大的历史深思。

二是“重商论”和“商战重于兵战论”。

在如何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这一根本问题，洋务派与改良派发生了根本分歧。洋务派把“师夷长技”看作是富强之本，主张练兵、制舰、造枪炮、习外语等，实际上只是增强清朝帝国的专制统治力量而已。改良派则走着另一条道路，他们把发展经济看作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出路。重商、重实业、重经济，是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呼喊“商握四民之纲领说”，马建忠力陈“富民说”，陈炽强调“富国策”，目的都是强调经济在富国中的重要地位。郑观应则进一步提出商为国之本的“重商论”。郑观应认为以农为本这是古代社会的特点，而现代社会则以商为本、以商富国，“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商务一》）中国之所以在今日弱于外洋，其原因盖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商务三》）因此，商对于当今中国具有根本意义，“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务二》）

“商战论”或“商战重于兵战论”，是郑观应“重商论”中的重要思想。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是同时并用的两手，即“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商务三》）而且“兵战”与“商战”之两手，往往

以“商战”为先、为目的，因此“商战重于兵战”。郑观应提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敌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屡欲，孰得而谁为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上》）

从商战重于兵战这一立场出发，郑观应批判了洋务派只知“兵战”而不知“商战”的做法，认为他们是“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郑观应提出，要强国不仅要“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更重要的是要“讲求泰西土、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商战下》）应该指出，郑观应的“商战论”中的商战，是一个包含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多内容的综合范畴。围绕“商战”，郑观应提出收归海关、保护关税等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护商而不病商的国策，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郑观应的商战重于兵战，护商而不病商的思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三是设议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杰出地体现在设议院的种种意见上。早在1884年，郑观应便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被清政府斥为“狂妄之言”。^①应该说，郑观应在甲午海战前便激烈地倡导设议院，是极有胆识的。郑观应认为设议院是

^① 《郑观应集》下，第303页。

“富强之本”，西方行议院制而国富强，东方的日本亦因维新立议院而勃然兴起，中国要富强也应走设议院制的道路。此外，他还认真研究了各国的议会制，认为有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他力主中国实现君民共主制。郑观应指出：“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议院下》）他致力于君主立宪，称“方今二十世纪立宪时代”，^②“非立宪国几不能立于世界，”^③但郑观应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也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

在“体”“用”问题上，郑观应大大超越了当时的洋务派。洋务派们认为，中国落后于世界，其原因在于“用”不如西方，而“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的伦理政治体制即“体”则优越于西方，因而只须“中体西用”便可富强于世界。郑观应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仅在于“用”，而且“体”也必须予以改革。他批评洋务派：“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盛世危言》自序）因此，中国欲自强非变法、变体不可，除了设议院，开国会，

① 《郑观应集》下，第310页。

② 《郑观应集》下，第322页。

郑观应还认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主张对政治进行全面改革；他的“公举”、“日报”、“吏治”、“限仕”、“汰冗”、“革弊”、“建都”等文章，提出许多好的政治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在现在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当今改革时代的思考能提供一个参照系。

四是提倡习西学仿效西人之法。

郑观应在“中学”与“西学”问题，认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西学》）尽管他认为“西学”的本是中国过去的，其实质是“中学”，但仍然大力提倡学习“西学”，并主张把“西学”引入选拔人才的考试的内容。

郑观应对于“西学”的内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西学”分类为天学、地学、人学三大类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輿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西学》）“西学”中包含着工艺学和社会科学。他主张“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学校》）对于“西学”与“中学”的矛盾，郑观应不像后来者那样尖锐对立，而主张中西并用，实事求是。

郑观应在办实业的实践活动中，力主仿效西人之法办

企业，走公司、股份制、有限公司的道路。郑观应把“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作了比较，他认为“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闻近年中国商情，惟棉纱匹头大占利益，上海纺纱局获利甚厚，而湖北织布局（官办的）仍虞折阅。其故何哉？窃恐各委员不免仍拘官场积习，非但不知商务利弊，不通权变而已也。”（《商务二》）郑观应在当时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商务二》）但郑观应的思想是早熟的，在当时中国很难奏效。在郑观应那个时代，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是中国三大公司，也无法与西方公司并驾齐驱。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郑观应感叹地说：“呜呼！以办旨成效之三大公司，犹以官督商办之故不能与泰西各公司竞争于世界之舞台，此中国商业之所以日居退败也。”^①为改变这一状况，郑观应上书清政府，要求“朝廷设立商部，尤须顾名思义为民谋利益，不可与民争利权。”^②历史是一面镜子。郑观应关于“官办”与“民办”，以及政府为民谋利益不可与民争利权的思想，对于当今中国如何进一步改革，如何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何竞争于世界舞台，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意

① 《郑观应集》下，第622页。

② 《郑观应集》下，第622页。

义。

五是改革学校科举制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强调指出，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是富强之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极其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认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学校上》）为此，郑观应研究了德、英、法、美、日的学校规制，特别推崇日本的教育兴国的大略，指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之善，培育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一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①对于学校的体制，郑观应主张设小学、中学、大学，宜“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为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省会、京师者为大学。”（《考试下》）考试内容也要进行改革。郑观应认为旧科举制理论脱离实际，“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学校上》）为了学以致用，广开才路，郑观应主张在文、

^① 《郑观应集》上，第261页。

武正科外，另设艺科、专科，对“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学校上》）郑观应的这些想法，都是极有意义的。

为了使人尽其才，郑观应指责了中国封建礼教，认为“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女教》）他希望清政府能改变这一状况，“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女教》）郑观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主张大办工艺学校，认为“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学校上》）郑观应认为，只要关心教育，多种渠道培养选拔人才，中国富强可望，“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学校上》）

《盛世危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作了批示并印了二千部分发各省有司，而国内各书坊立即辗转翻刻，印至十多万部之多。当时国内科举，也往往用《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时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盛世危言》对尔后的维新派产生巨大影响，谭嗣同把“商战”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重大内容，孙中山也这样那样受到《盛世危言》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读了《盛世危言》，激起救国的强烈愿望，并由此离开湘潭而去长沙求学业。当著名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段历史，说“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

本书我非常喜欢。”^①可见，《盛世危言》一书的作用是进步的。

在《盛世危言》出版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这本名著，仍然获得不少教益和启迪。《盛世危言》为什么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究其原因，在于《盛世危言》所揭示的“富强救国”的具体内容，是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实践中天天遇到并要化大力气解决的。说到底，《盛世危言》的主题也就是现代化问题。西方各国在17世纪后率先迈入现代化的道路，尔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也步入了现代化之路。中国，这个曾在历史上有灿烂文明并对人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恰恰在西方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时刻落后于西方，成为当代的落伍者。中国怎么办？中国要不要走上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的富强之路？这正是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盛世危言》当然会引起现代人的关注。

历史是奇特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来应该较快地提出现代化问题，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现代化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消失了。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之后，人们才痛定思痛，重新高举现代化的旗帜。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7年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指出：“日本人从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

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①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的宣言书，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弱点，他们的现代化理想只是一种空想，但是，这一切毕竟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现代化的最初实验，无论是他们的失败还是他们的思考，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就是《盛世危言》在当代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的原因。

历史便是这样：

17世纪是西方老牌资产阶级开始现代化的世纪，他们成功了；

19世纪是日本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现代化的年代，日本也成功了；

19世纪也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宣传现代化，力图走富强救国之路的年代，但他们失败了，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今天，是中国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年代，这是曾经贫穷了几个世纪、受尽欺凌的12亿中国人重振雄风屹立于世界的年代。在今天，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能够得以成功，我们当然要借鉴和沉思西方的、日本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但是更要关注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页。

中国人自身的经验。《盛世危言》是历史的夭折儿，是思想的早熟儿。在中华民族当代波澜壮阔的现代化的历史画卷全面展开之前，我们不妨听听先人们告诉我们些什么，其中也包括听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告诉我们些什么吧！

陈志良

1994年11月

目 录

总 序	张岱年 1
编 序	1
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	1
《盛世危言》彭序	4
《盛世危言》郑序	6
《盛世危言》陈序	8
《盛世危言》自序	12
道 器	16
学校上	19
学校下	22
西 学	26
女 教	31
考试上	35
考试下	40
藏 书	43
议院上	47
议院下	52
附论 答某当道设议院论	55
公 举	61

原 君	65
自强论	73
日报上	75
日报下	78
吏治上	82
吏治下	88
典礼上	97
典礼下	100
游 历	105
公 法	108
通 使	112
传 教	117
交涉上	121
交涉下	126
条 约	129
入 籍	134
书 吏	137
阁 宦	141
廉 俸	144
限 仕	147
汰 冗	151
革 弊	157
建 都	162
户 口	165

教 养	168
训 俗	172
刑 法	176
狱 囚	181
巡 捕	185
罚 赎	191
医 道	195
善 举	200
僧 道	205
税 则	211
厘 捐	216
捐 纳	223
停 漕	226
度 支	230
国 债	233
商战上	238
商战下	243
商务一	246
商务二	249
商务三	255
商务四	259
商务五	263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267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269

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 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①

为时事艰难，亟宜补救，谨陈管见，敬录书籍进呈，吁恳乾断施行，建新猷以维积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以求明医以愈疾，必无良药苦口之嫌；际穷久而思通，贵有易辙改弦之举。古来制治保邦，未有不因时制宜而能成长治久安之盛业者。溯自洋务肇兴，我朝廷宵旰忧劳，孜孜求治数十年，内外臣工讷无志虑忠纯，思深谋远。几经筹画以图自强，而国势迄未能张，外侮迄未能御，岂财力之真有未逮哉？毋亦封于故步而兴创鲜同心，昧于时宜而胶执多自误也。自海禁开而外夷麇集中华，目睹彼族之炮利船坚，所向无敌，何尝不规规仿效振作于前？是以建船坞，筑炮台，购铁甲之船，设制造之厂，所耗帑项何止数千万？然而马江之役兵船灰烬，藩服终属于他人。今

^① 此文是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六日，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时的奏折。

以倭奴蕞尔小邦，步武西法仅十余年，竟借无端之衅，强据我属国，虔刘我边陲，攻夺我海军，侵及辽疆，所至披靡。以堂堂中土，竟示弱于三岛之区。此天下臣民所为疾首痛心，而不胜其太息愤懑者，谓是由当事者之机宜坐失，固属人所共知。臣愚以为非仅一时一事之贻害，其所以召侮而致祸者由来渐矣！

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①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他如商务、技艺、教养、武备诸大端，彼所有者我所无，彼所长者我所短。习焉不察，遂至因循。际此势绌情见之秋，自无不思亡羊补牢之计。而臣犹有鳃鳃过虑者：诚恐习俗拘迂未化，或以用夷变夏为言，凡事畏难苟安，复蹈浅尝辄止之失，不思倭与我本同文之国，彼以能自得师而效著，我何难幡然变计以维新。

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为时务切要之言。查该员游历诸邦，留意考究，其坚心刻苦，诚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书以就正。臣见其语皆征实，说集众长，间有戆直之辞，莫非肫诚所发。至于推

^① 泰西即西方。

行次第，何后何先，在斟酌于当几，斯变通之尽利。谨抄录原书，恭呈睿览。当此君父焦劳图治，固食毛践土所欲效忠，伏惟圣人俯察迕言，虽葑菲刍蕘，胥能上达，谨陈管见，并录原书一函五册，随折恭进。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①

^①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奏回原折。光绪朱批：“知道了，书留览。欽此。”

《盛世危言》彭序

《盛世危言》一书，香山郑陶斋观察所著也。陶斋原名官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反是则为俗吏迂儒。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

尝读《春秋》，知当时君相，无不周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日求富强之策，不以资格限人，似无异于今日泰西各国。我朝怀柔远人，海禁大开，亦当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方有着手之处，岂徒尚皮毛，购船炮而已乎？余赋性木讷，不谙洋务。今阅是书，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故缀数语，亟劝其刊行问世，以期与海内诸公采择而力行之。将见孔孟之道风行海

外，莫不尊亲；彼族之器我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夷宾服。奚不可以是书为左券也哉！

甲申冬日衡阳彭玉麟序于海南军次。^①

^① 彭玉麟，清粤东防务大臣，郑观应于1884年，左右在彭玉麟处帮忙。

《盛世危言》郑序

尝读史盱衡千古，穷究得失盛衰之故。方其厝火未燃，履霜始至，未尝无人焉。识微于未著，见机于将蒙，不憚大声疾呼，痛哭流涕而言之。乃旁观辄病其狂瞽，以为忧盛危明之太过。洎乎朕兆既见，补救无从，则始叹惜为前知之言，未能见用，亦复何及。此吾宗陶斋观察《盛世危言》所由作也。

陶斋于余，谊同宗，生同里闾。幼读书，知大义，恒以帖括为耻，乃弃去学陶朱术。比同客淞滨，昕夕过从，结为道义交，约以有过相规，有善相辅，沆瀣诚相得也。陶斋乃出其枕秘数册，就正于余。阅之，皆纵论中外情势，商榷古今利弊，旁搜远绍，网罗无遗，有当世贤豪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谨巽柔之辈，知言而不敢尽其所以言者，真所谓大言炎炎，小儒见而咋舌者也。余时适奉调权津关榷政，旋被出使美、日、秘三国之命，草草劳人，久无以报。既瓜代移疾归，养疴田间，人事稍暇，乃出其书悉心正订，间亦参以鄙见。陶斋颇折衷相许。阅既竟，乃璧还原本，并

劝其早付手民，出以问世。

夫盛衰倚伏之机，即天人相通之故，懦夫俗士往往蒙昧其本原，相与粉饰而委顺之，乃无由收人定胜天之功效，皆坐其不能见机于早也。惟然，而陶斋之书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若采而免诸施行，则女娲氏补天之石不是过也。方今运会中兴，圣明在上，镜外以治中，准今而合古，必能容长沙之忠直，采治安之说论。若能由此书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人事既工，天心弥眷，安见此日忧危之语，非即后日喜起之先声？则此书实太平之嚆矢，抑亦盛世所亟宜上闻者也。余故乐为之序，而推衍其著书之旨，以广当世士夫之意云。

光绪纪元壬辰八月中秋节，前使者同宗兄郑藻如玉轩甫识。

《盛世危言》陈序^①

香山郑陶斋观察著《危言》五卷，吴瀚涛大令以际余。读既竟，爰缀言于简端曰：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识微见远之君子，观于火器、轮舟、电报、铁路四事而知之矣。

自黄帝以来至于秦，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相距约二千余年。王迹熄而孔子生，祖龙死而罗马出。故三代以上之为治也，家塾、党庠、学校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智而始皇愚之；通商惠工，沟洫遍天下，惟恐其民之不富而始皇贫之；建鞬设铎，惟恐下情之不通而始皇窒之；遗艰投大，惟恐君威之过侈而始皇怙之。民气本强也而弱之，民情本安也而危之。盖自焚书坑儒而后，古圣王之遗制荡然无存，不有孔氏之书，则万世之人心几乎息矣。《书》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皇帝作之君者也，孔子作之师者也。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空文垂

^① 陈炯 (7—1899年)，江西瑞金人，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训，道可传而器不可传，古先王制作之精深，器存而道亦寓焉。洎古籍放失，黔首颛蒙，作者何师？圣人弗起，我中国之君民因陋就简。溯秦并天下以迄于今，盖亦二千有余岁矣。虽然，圣人之心天之心也，圣人之道天之道也，圣人之器亦天之器也。天地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乱极于七国之季，而承之以秦，夫亦若无如何者。既生孔子以正人心，达天道矣，维道之中有器焉，不可使之散佚而无所守也。秦政酷烈熏烁，中国无所可容，彼罗马列国之君民，乃起而承其乏焉，其声明文物之所启，亦自东而之西。有器以范之，故无一艺之不精；无道以维之，故无百年而不乱。分余闰位，迄今亦二千余年，将以还之中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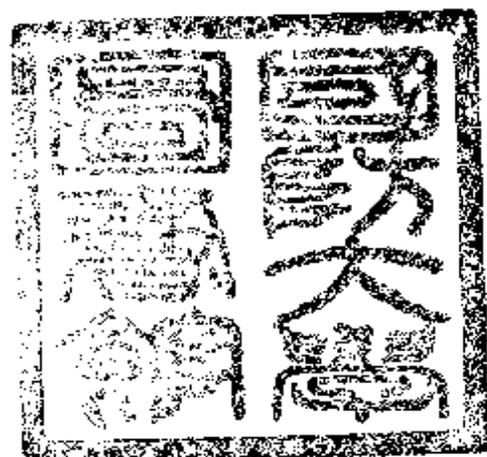
然道远则不能自通，力弱则无以自振，天因其人之深思好学，益假手于彼以大显宜民利用之神功。轮舟以行水也，铁路以行陆也，电报以速邮传，火器以抗威棱，而后风发雾萃，七万里如户庭。中国乃闭关绝市而不能，习故安常而不可。是故矿产、化学，矿人之职也；机轮制造，考工之书也；几何、天算，太史之官也；方药刀圭，灵台之掌也；倚商立国，《洪范》八政之遗也；籍民为兵，管子连乡之制也。议员得庶人在官之意，而民隐悉闻；书院有书升论秀之风，而人才辈出。罪人罚醵，实始《吕刑》；公法睦邻，犹秉《周礼》。气球炮垒，即输攻墨守之成规；和约使臣，乃历聘会盟之已事。用人则乡举而里选，理财则为疾而用舒，巡捕皆警夜之鸡人，水师亦横江之练甲。宫室宏侈，如瞻夏屋之遗；涂径平夷，克举虞人之职。所微异

者，银行以兴商务，赋税不取农民，斯由列国属土之多，道里相距之远，因时而制变者也，无足异也。至于传教之师，用夏变夷之嚆矢；民主之制，犯上作乱之滥觞。他日我孔子之教，将大行于西，而西人之所以终底灭亡者，端兆于此。此外，良法美意，无一非古制之转徙迁流而仅存于西域者，故尊中国而薄外夷，可也；尊中国之今人，而薄中国之古人，不可也。以西法为西法，辞而辟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国之古法，鄙而弃之不可也。执人而语之曰，尔秦人也，所行秦法也，无不怫然怒。语人曰，尔古人也，所行者古之道也，无不色然喜。今日日思复古，而于古意之尚存于西者，转深闭固拒畏而恶之。譬家有明月之珠，遗之道路，拾而得之者，不私不秘，举而归诸我；我乃按剑疾视，拒之而不受也，智乎不智乎？方今万国通商五十余载，见闻日广，风气大开，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其意贤者知之矣，不肖者不知也；少壮者知之矣，衰老者不知也；瞻言百里者知之矣，局守一隅者不知也。我恶西人，我思古道，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我虞、夏、商、周之盛轨。揆情审势，旦暮之间耳。故曰，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我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

曩拟作《庸书》内、外篇，博考旁征，发明此义，簿书鲜暇，卒卒未果。陶斋观察资兼人之稟，负经世之才，综贯中西，权量今古，所著《盛世危言》淹雅翔实，先得我心。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乃今圣明在上，宏揽

群才。异日假以斧柯，扬历中外，坐而言者起而行，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方之古人，抑何多让。第其间有本末先后之序焉，如良医之治疾，大匠之程材，所为条理井然，铢两悉称，积习丕变，而民听不疑者当别有在。愿与观察大令沉几审变，及天下有心人共证之尔。

癸巳七月瑞金陈炽叙。



《盛世危言》自序^①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②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

① 《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曾将此篇改为《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② 《孙子》原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软！”诚中的之论也。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秦、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辘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①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篋，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

^① 《易言》是郑观应早期代表作，先有《易言》三十六篇本，后精选成《易言》二十篇本。《盛世危言》是在《易言》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

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戇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道 器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乘，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有名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孔氏^①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终始。”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曰：“君子不器。”良以握原者可以制化，大受者不可小知。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

^① 孔氏指孔子，语出《大学》。

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三教分途，均不识中为何说。《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易·系辞》云：“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存此中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原耶稣传教之初心，亦何尝非因俗利导，劝人为善。惜其精义不传，二、三生徒妄以私心附会，著书立说：托名耶稣，剿袭佛老之肤言，旁参番回之杂教，敷陈天堂地狱之诡辞，俚鄙固无足论，而又创设无鬼神之说。夫既无鬼神，则天堂地狱又复为谁而设？矧别派分歧，自相矛盾，支离穿凿，聚讼至今，迄莫能折衷一是。究其流弊，皆好事者为之，有识者断弗为所炫惑也。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

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十四卷本增：而〕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浸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皇极于黄、农、虞、夏，责巨工以稷、契、皋、夔。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猗欤休哉！拭目而俟之已。

学校上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坐废，莫辨之无，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学校废而书院兴，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世务，而为国用。乃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肄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书院虽多亦奚为哉！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迹

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先入小学堂，教以浅近文理，地图、算法、史事、格致之属。小学成后，选入中学堂。所学名类甚多，名曰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皆须全习，惟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

日本之教科名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本教育敕语，旁参五经四书及泰西伦理。学生中学校毕业，则发给凭照，自此以后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各听其便。习文事者，入高等专门学校习专门之学。凡可称高等专门学校者，如高等师范、高等商业、高等工业、医学专门、东京美术、即绘画、雕刻、嵌钿、铸冶之技东京外国语、东京音乐皆是。此外尚有女子高等师范，为女子专门学校。若欲入分科大学，先入高等学校修预备科。科分三部：第一部为法科、文科，第二部为理、即格致农、工，第三部为医学。门径既识，然后入大学。校中分科专习，科分六门，即法、文、理、农、工、医六者，但较预备科为专精耳。分科毕业，发给凭照，略如中国举人。其愿再学者，入大学院以精究奥义。大学院毕业升转。若充兵出身，非战时不得为士官，至特务曹长而止。特务曹长位如中国把总。其自少尉、中尉之中入陆军大学校，以储参谋之资。自大尉而上，曰少佐、中佐、大佐，

略如游击、参将、副将。再上曰少将、中将、大将，则位如提、镇、总统矣。凡愿习水师者，先入海军兵学校，三年毕业为候补少尉，在舰练习一年，此一年中须远航一次。其隽秀者升入海军大学校。查海、陆大学校，其体制与文事大学校颇殊。

泰西各国学制不同，入学之岁亦不同，然其用意事事相同。故大、中、小学年限，无论文、武，大率三、四、五年不等。等级渐深者，科目亦渐多。学生多则班数亦多，然每班不过数十人。此班学满即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小学堂于来学之生徒，察其贫者免取修脯，稍贍者半之。中学堂即普通学之修脯亦廉。

此外国学校教士官人之大略也。

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仿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一蒙学、一普通、一专门、一编译、一会计、一典试、一巡查。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飭疆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巨资。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各州、县、省会学堂生徒之课艺，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专习一艺，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且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以工艺一事，非但有益商务，且有益人

心。院中课习制造、机器、织布、造线、缝纫、攻玉，以及考察药性与化学等类，教分五等。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亟务也。

学校下

孔子论学道之功，循序而进，譬诸升堂入室。余谓读书之功，亦循序而进，譬诸自地登楼。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终身从事于章句之学，帖括之艺。试问以五洲形势，列国政治，历朝史鉴，诸子百家，天算、动植、形声、格致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其课徒也，曰五经，曰古文。五经将以通圣人之道，古文将以开童子之智，斯固然矣。特是五经中有童子能解之篇，有童子不能解之篇。其述往事而无议论之文，童子所能解；其讲性理道德之学，童子所不能解。今乃取其难解，略其易解，以为圣人之道义尽在于此，童子虽不能解，必令读之，犹大言曰：士子读书所以通圣人之道。欲通圣人之道，须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非童而习之不为功。是以黄口小童，入塾数月，先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继而读《中庸》，读《论》、《孟》。四书读竣，又习五经。然膏继晷，朝夕从事于斯，彼其用

心将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义理无所讲究也，于文法无所留意也。故有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迓，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

凡人之灵有悟性、有记性，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试观五尺之童，有人讲一笑谈故事，彼即入于耳，会于心，牢记不忘，津津乐道。若课以数行《学》、《庸》，彼罔然不知所解，口吟终日尚难背诵。为之师者又从而啜之。于是童子以读书为至苦，就学校如就囹圄，对师长如对狱吏，恒思半途废业，弃文就武。

夫《大学》之道，至于平天下，《中庸》之德，至于无声臭，《论语》讲仁义道德之事，《孟子》言尽心养气之功，吾恐老儒经生亦难悉其底蕴。今以老儒经生所难解者，而教数龄之学童，知其必不能解也，而犹然授之，非天下至愚者不为也。况今之为师者，当讲解时不过将各家注释翻诵一遍，苟且塞责而已。设有颖慧子弟问先生，何谓明德，何谓至诚，何谓用力于仁，何谓浩然之气，将舌桥口呿，甚或恼羞为怒，斥子弟不敬而深责之，俾不敢复言。若此，非贼人子弟乎？非锢蔽智慧乎？

然则如何而可？曰初学蒙童每日授以方字，逐字讲解意义。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识二十字为限。俟识二千余字，即选《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学堂日记》、《感应篇图说》、《阴陟文图证》等书，先取目前有形之物，日用寻常之事，或俗语浅文，或韵言歌诀，使其易于索解，易

于记诵者编为三百课，配以石印绘图。每晚为讲一课，随令还讲，即加句读，作为次日之生书。次晚背诵无讹再上第二课。每早仍添识新字，以满六千字而止。由《说文》中挑出六千字，分别繁、要、简三种，均刻木板，用坚硬之洋纸刷印，切成方字，每生各给字一匣，务必读识二千余字方准读书。此第一年功课也。次年，仍兼温字义，取《家语》、《国策》子史等书文义浅近者，及地舆算法，孔教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门，今之学校纵不能全授，而礼仪、体操、算法，是人生日用必不可少者。盖不知礼无以立，不知体操无以卫生，不知算法无以谋生。各国人物风俗诙谐故事，编成三百课，仍随解随读，兼温旧课。此第二年功课也。再次年，择《国策》、《史记》、《汉书》等文理稍深，篇幅较长者，仍选三百课，随讲随读，兼温字义。此第三年功课也。

合计三年后，有六千字义烂熟胸中，有九百课由浅入深之书本，而谓不能融会义理乎？后授之以四书五经，有不声入心通乎？其开笔联句之法：或函牍，或故事，或新闻，先由一、二句至三、四句，扩充至数十句、数百句。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即谓之作文。岂若世俗做破、承、起讲，方谓开笔耶？然做破、承、起讲，实亦基础于此矣。夫如是，教者不劳，而读者有味，愈读而愈有精神，愈有意味。何不仿而行之。

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学分十课：一曰经学，以中国十三经之大义，择其浅近而切于伦常

日用者训之，以培其德行也；二曰读中国书，凡华人不能不通华文，上而章句，中而论说辩难，下而浅近往来书牋，虽文理有浅深，而学徒皆不可以不通也；三曰算学，以西算为主；四曰地舆，以中国地理为主，旁及各国之地舆；五曰史学，以中国史学及外国近百年之史学为主，其外国古史稍明大概足矣；六曰生物植物学；七曰格致学；八曰画图学；九曰体操；十曰习中国字。小学堂为本国通用之学而设，故不及外国文字功课。其欲子弟大成者，则有中学堂与普通学在。^①

^① 自“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以后的文字，是《学校下》篇的附言。

西 学

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贤者蹈海而沉湘，不贤者靦颜而苟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欲救时弊，自当对症以发药。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中国独京师有天文台，讲求者甚少。查西国无县不有天文台、地理会，讲求者甚多。日本亦有天文台二十处，地理会设已多年。法国之地理会岁铸金牌数枚，以赠各国测地之士。英京伦敦旧有地理

会，纵论古今沿革，探讨舆地源流，入是会者，尤多学问渊博之士。近复辟会聚议，遣人分往各部，探地者刻已陆续回英。其赴亚非利加者共有一百五十人，以栗味斯敦为首，自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由伦敦起程，南往亚非利加。其领袖者道卒，有一弱冠少年起而代领，相率前进，至罢倍凹地方访寻金、银各矿，知前人传述不尽可信，而所过之处亦有前人所未至者，均笔之于书。泰西考核地理，不惮纆幽凿险，以资印证，宜其精辟罕俦也。亚墨利加洲之中境，近闻新立一格致会，其领袖者名夏而纳，素精舆地之学，足迹所涉，遍跨数洲。其经费半由该处某富商捐助，半由法国公家核给。乃选人四出探察物产，详别道里，如其物能自取携者，则挈以归，否则，画图贴说，储诸夹袋，亦足以资考订，而勒之成书。章程极为尽善。我国亦当仿而行之，以资多识。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则无本之学，不足登大雅之林也。

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惊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

止，有名无实。盖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识师授优劣，课艺高下，往往为人蒙昧，所以学生所习每况愈下，不如人。西报云：日本幼孩已得教训，与泰西不甚相悬。其教习之法，仿照英国北省章程；男女皆分塾督教，穷究诸学，博考各国疆域甚详。其房屋亦高大爽垲，并令学徒通晓保养身体脏腑方法。虽英之伦敦，法之巴黎斯学校，亦无以复加云。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家，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巧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舆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地圆之说创自管子。不仅此也，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楼船，双轮激水，行驰如飞，则轮船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

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磁石引针，琥珀拾芥。此电学之出于我也。

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余见同乡幼童读书数年，非但不知地理、算学、应对礼节，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识权衡斗量数目，惟专攻八股而已。且见读书久者，其背如驼，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之法，亦无礼、乐、射、御、书、算六艺之学故也。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近人江慎修融贯中西测算，兼能制造奇器，尝制木牛以耕，造木驴代步，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创之。谁谓中人

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颺颺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尤有进焉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其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女 教

中古古重胎教，盖谓人生自孩提以至胜衣，大都瞻依慈母，跬步不离。此家有贤母，其子若女必多造就。然后日之贤母即当年之名媛。中国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单文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鬲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中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贍。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于古人所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者，有其名无其实。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学仕学者，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

夫，为贤内助矣。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如果精通亦可给凭行道。而收生一端关系尤重。俄国特设教女收生院，凡胎前产后一切要症，必须明白透彻，体恤入微，既讲求妇科，即内、外各科亦可兼习也。

中国之人生齿繁昌，心思灵巧，女范虽肃，女学多疏。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国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至，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独此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严词厉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断筋摧，其心乃快。以为如此而后，他日适人可矜可贵；苟肤圆六寸，则戚里咸以为羞。此种浇风，城市倍于乡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戕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觐沉灾。西人论女子裹足，男子宫刑，乃极弊之政，为合地球五大洲之所无，宜为彼族嗤笑。

革之者真为圣君贤相矣！稚年罹剥肤之凶，毕世婴刖足之罪。气质虚弱者因以伤生，虽父母爱怜，而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矣！即幸全性命，而终日需人扶掖，并曰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盗贼之灾，则步履艰难，坐以待毙。戕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诲淫之尤。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所望有转移风化之责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一转移间而道一风同，利兴弊去。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

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剪，不穿耳。”^①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应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

^①（庄子·德充符）原文应是“为天子之侍御，不爪剪，不穿耳。”

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况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堕矣！夫裹足为贱者之服，岂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予所以言之喋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

我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徒，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以为无关紧要，事竟中止！第使当时禁不过急，持之以恒，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①

^① 自“天下事贵自然”以后的文字，是《女教》篇的附言。

考试上

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考试之法虽王子国戚，亦等齐民。如欲为将帅者，必先入武备院、韬略馆读书，兼习天球、地舆、测星诸学。期满，由现任水陆提督偕各大臣亲到学院，与掌教鉴定，考取一等者即编入行伍，授以把总、千总之职，次第而升，以资历练，文件自理，枪炮自发，虽至贱至粗之事，亦不惮辛劳而尝试之。及功成名就，致仕闲居，犹不废立说著书以传后世。即矿师、医士，必须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尤须明律例，考取文凭方准用世。

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而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夫以八股为正途，视别学为异端，其不重可知矣。人材焉能日出哉！如是，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

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屡诏中外大臣保举人才。然所谓大臣者，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绝，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习者，私亲密友而已。亲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应诏，亦惟举一、二有交之显宦，或庸懦无能之辈，以塞责而已。何曾保一岩穴隐遁之真才哉！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湮没不彰，或市井潜藏，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终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害之耳。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请分立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经史以覘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例案以观吏治。原拟：一曰考证经史，疏通疑义，以覘学识。二曰策论时事，昌言无讳，以征抱负。三曰审问疑难例案，以观吏治。四曰兼试文章诗赋，以验才华。首科既毕，凡海疆各省主试者，宜就地会同各西学大书院山长，如天津之水师学堂、博文书院、福州船政学堂、江南水陆军学堂、广东水师学堂诸山长。订期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西学虽多，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知天文者必知算学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该考官须素精其艺，系大书院出身有执照为凭者，方准奏派。取中之卷，皆呈主试者鉴定，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

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并令内外臣工博访周咨，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堪任将相者，立行表荐。聘岩穴之隐逸，举幕府之宾僚，参行古征辟荐举之法。得其人则荐主同膺懋赏。或怀私滥保，则举主坐罪。斯不敢徇情面，植党援，应故事矣。武生向以骑射技勇见长，而世之习武者，武经一卷尚属茫然，一旦临敌出师何恃不恐？咸、同间荡平丑类，建立大功，并无武科中人。所习非用，其明征已。如不能学西法选材于武备学堂，亦当力求新法。今战守之事，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今之考试，有奔走数百里至数千里者，其费甚巨，且钦差学政，主考总裁，所费国帑不知凡几。不如仿泰西考试之法，由掌教会同地方官考取，亦三年一考。县试小学堂，考列上等者为秀才，贡之于省。省试中书院，考列上等者为举人，贡之于京师。京都大书院考列上等者为进士。大书院所学，虽与中书院相仿，惟大^①书院掌教仍稟请奏派总裁会考，否则，主考总裁亦须奏派精于制造之机器师，熟识驾驶、能施火器、是船政学堂出身之水师提督，会同督、抚考取，庶得真才。惟所费国帑更巨，不若各省船政局、武备学堂，会同地方官，岁订一期，由各生自行赴考，以省糜费。一试点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二试点施火器，命中及远，驾驶战

船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须奏派精于制造之机器师，熟识驾驶、能施火器、是船政学堂出身之水师提督，会同督、抚考取，庶得真才。否则有名无实，为外人笑也。一经拔擢，令入武备院、艺术院再行肄业，优给俸禄。武备院以收才力勇智之士，艺术院以收聪明技巧之才，惟必须读书明理，文字清通，方能入选。且特降明谕，俾以后文武并重，不得歧视，庶多士向风，可得干城之选矣。

虽然，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既于文、武岁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遴选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选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以三年为期。其膏火经费仿上海龙门书院章程，官为筹备。按月出题课试，所出之题务须有裨时务，如铁路之事，轮船之事，矿务之事，邮政之事，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钱法、钞法、测量、测候、地理、地舆、博物院、赛珍会、息兵会、派员游历、使臣出洋，与夫各国风土人情，文学武备皆可出题。令诸生详究利弊，择其文之佳者登诸日报，以广流传。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查各国京师俱有大学堂，各精一艺、各专一业者，非比我国同文馆教习只通算学、天文、

地理、各国言语文字而已。或谓同文馆如外国小、中学塾、非大学堂也。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据日报云：现计其能当管驾轮船、机器、武备各员者，每业约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设西学堂，所育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军有事，人材不足耳。准其一体乡试会试。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且我朝有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翰林异试异榜，与正科诸士同赐出身，援例立科，必无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

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以昭激励。昔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学习，意美法良，特稚齿髫年，血气未定，沾染习气，乖僻性成，甚至有从教忘亲不愿回国者，则就学诸生于中学毫无所得故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即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日本肄业英、美、德、俄之学生，至今尚络绎不绝。欲救其弊，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识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学政所录文、武各生，择其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厚给资装，出洋学习。如此分途资遣，庶事理通达，而各有

成材，身列胶庠，而咸知自爱，功崇业广，体立而行。曾文正作育之苦心，不致因噎而废食，诸生之数奇不第者，亦得别出一途以自效。归后愿就职者听，愿就科举者亦听。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

考试下

或谓：“中国仕宦首重科举，乡、会试取决于时文，京朝官絮长于小楷。自明至今五百余年，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其由他途来者，不能得高官，膺重权。取士之法，上篇论文、武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仍靡费而无实效。如能变通成法，广科目以萃人材，则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然考试之法将若何？”

窃谓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省会京师者为大学。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

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一曰陆军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军科，凡测量、测星、风涛、气候、海道、沙礁、驾驶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学中教习。详订课程，三年则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然后分别任使进用之阶。文、武一律，无所轻重。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即不入小学肄业者，逢小学甄别之期，亦须赴试，必先由小学考取有名，三年后始准预试。入学之始，必令于文、武各科各择一科，专其心志，一其趋向。至于登进之阶级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三年一试，由朝廷命该省督、抚、水陆提督，会同大书院掌教校阅，广其额，精其选，一返从前空疏无补之积习。如此变通办理，约而计之有数善焉。

从前各州、县学官仅拥虚名，几同疣赘。若由各省督、抚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宫、书院可以居住，无须另筹经费，另行建筑，一转移间，通国即可举行。一善也。

各分各科，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兴起，为国家有用之材。二善也。

学中甄别，以三年为程。士之学问浅深，平时同业诸

生共闻共见，期满考试，或优或绌，参考三年之学业，可得其详。其取人又不凭一日之短长，怀才者有必得之权，废学者无侥幸之望，考核明而人才出矣。三善也。

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四善也。

一科有一科之用，任使务尽其所长；一人有一人之能，驱策必久于其任。将见士气振作，人才奋兴。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五善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及至外患循生，内忧叠起，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以一人之身而终身三变，精乎不精乎？幼学壮行之谓何？而国家犹勉策驽骀，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

藏 书

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作人养士之心，至为优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度，寒士未由窥见，及寇乱游经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靡史，博览群书，堪为世用者。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惟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疆吏亦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则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后知藏书之为益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功大也。

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本国书肆新刊一书，例以二分送院收贮。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

千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个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就长案上静看，不许朗诵。阅毕签名书后，何日、何处、何人阅过，缴还经手。该值堂年终查核，知何书最行。另有赁书楼，有股分者每年出书银四元，可常往看，各处新报俱全，只准借书两本，限两礼拜归还。如无股分者赁阅，每日计银两先付。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执事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通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如法兰西书楼共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共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共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利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独藏书二百七万九千册。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钜观，博学之津梁也。

我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鄞县范氏之天一阁，杭州汪氏之振绮堂，钱塘吴氏之瓶花斋，吴门黄氏之滂熹园，石冢严氏之芳茱堂，郟镇鲍氏之知不足斋，昭文张氏之爱

日精庐，南浔刘氏之暝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佚。近日则吴兴陆氏之皕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阁，请于大府，奏于朝廷，供一郡人士观览。其大公无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让。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飭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贮。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比利时国届开国五十年之期，臣民咸醴金上寿，王受而署诸外府，曰：“此众人之资，将为众人求益。”飭议院议之。下院拟以此款开设格致院一区，广购图书器皿，用供国人探讨格致之学。英君主寿诞，臣民亦醴金筑一大博物院，无物不备，为其君主寿，留名千古，与民同受其福，何乐如之。宜各国皆当仿行也。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果能认真经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或钩元摘秘，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达化穷神，造中外所无之利器。于以范围天地，笼罩华夷，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极巍焕信景铄，皆于读书稽古二事基之矣。

今天下竟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

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复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苟强分畛域，墨守规为固陋昏蒙，甘受人制，则印度、琉球、越南、缅甸之续耳。前车已覆，来軫方道，有识之君子将何择焉！

议院上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僉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制治固有本也。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因君，以

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支，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之，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之上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举员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举而不公，亦可废其例，停其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入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规制大概亦同。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虞

歌，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齟齬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曰从众，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

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凌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而籍贯不可分，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

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侍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入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所以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之下十居其六，君主之国十居一、二，民主之国十居二、三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凌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颠矣！^①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筐。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颞预。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颞预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颞预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②

^① 自“或谓：议院宜西不宜中”至“噫！颠矣！”，系《盛世危言》五卷本《议院》篇的附言。

^② 自“今之公卿大夫”至“是非设议院不为功！”是《盛世危言》十四卷本《议院上》的附言。

议院下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凌侮中华。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诸日报，妇孺皆知。凡有病于民者，如公禀政府改革，无不俯顺舆情，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

英国马恩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其民迫求在上者改章易法，不许，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矣。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

破仑制其死命。普相赐德鹰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破仑，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自立报馆，任意见论政事，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为一，以逐拿破仑。日耳曼、奥斯马加、俄罗斯、波兰、希腊、法兰西、西班牙诸国人，皆苦人君治国，专恃权势，若不改旧章，不得不潜自立会，藉以整顿国家，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会党即自然解散，匿迹销声。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而在欧东，如俄罗斯一国，仍以权势治民，故有尼希利会党。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贤者亦复乐列名于会中。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其铲除净尽，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势振兴必远胜于曩日云云。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其余则大半无异心，故能去其积习，不专恃权势，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上下自胥安矣。

考之欧洲各国上、下议院，近年新订公举章程。法兰西上议院员，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转举者四分之三；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人所公举。比利时上议院员，由每年纳赋合华

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下议院员同上议院。奥斯马加上议院员，有君所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皆可公举。恒加利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每年纳赋合华银三两二钱者，皆可公举。普鲁士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亦有君所命者；下议院员年二十五岁以上之民，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之员数。日耳曼联邦上议院员，各小邦政府所举；下议院员比户可举。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命者，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员所举；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之民所举。英吉利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已纳赋赈贫者，比户可举。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岁以上，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希腊仅有一议院，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葡萄牙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下议院员，凡民一年中入款在华银八十八两以上者，皆可举。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皆得举。俄罗斯无议院，大权皆操之于君。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君与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瑞士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下议院员，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挪威仅有一议院，其议员分作两班，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皆可举。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一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皆可举。塞尔维亚上议院员王命之；下议院员，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

纳赋人所举。罗马尼亚上议院员，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下议院员，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举。

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猗欤休哉！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附论 答某当道设议院论^①

窃谓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荇，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

或谓：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昔法国维新之时，民智亦未开，先设议院，变通制度。其时绅士有创设学校以教议员之诮，故富强未闻，徒受先设议院之害。

^① 此文是郑观应答复盛宣怀的一封信。盛宣怀曾于1906年中间郑观应：“变法何者为先？”郑观应以本文答盛宣怀。

或又曰：“风气未开，欲设议院，骇人听闻。”不知此寻常之见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以何为贵？”管仲对曰：“民。”武王曰：“纣有亿万人，惟亿万心；朕有三千人，惟一心。”孟子告齐宣王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而用之。”^① 其为去、为杀，皆以国人为断。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议院乃上古遗意，固非西法，亦非创辟之论也。不有议院，何以使亿万姓惟一心乎？夫强邻之畏我者民心固结。若此时不设建，迟至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恐欲设而不能。曾闻其属地有华人聚众议事，即为巡捕所拘，推此可知矣。

或又曰：“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不知此由章程未善，公举不得其法耳。西人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国会论中。惟创办之初，不必悉仿西例，因地制宜，随时可以商改。惟议绅必须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不合格者不准选。果能遵守议规，何虑滋事之有？统计每县数十万人由士农工商公举三、四人，亦何难之有？各县议绅中公举一人到省，每省约得数十人。由各省议绅公举二人入京，约得四十余人。岁会有期，是非共听，优则奖之，劣则黜之，自然各顾声名，不敢轻举，贻笑中外。如山僻小县无此人材，势必合众捐资，延品学兼优聪明之士，游历各国、各省，博访周谘，洞悉利弊，归

^① 《孟子·梁惠王下》原文应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而备充议绅。朝廷尤须破格用人：果其议绅品学优长，为一县所钦，即授为一县之牧；为一府所钦，即升为一府之牧。必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或恐因此谋叛。不知今日电线信息灵通，铁路调兵神速，各要隘有兵扼守，何虑内变。况朝廷准设议院，体恤民隐，亦何苦生变，今日之天下，以兵力争胜，非火器精、训练久之兵，不足以制敌。土匪作乱，托言忠义，实思富贵，害己害人，引寇入屋，殊堪痛恨。致身家性命不保乎？

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总之，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书中《礼政》首篇业已详论，非谓学校可缓也。兹将洞悉中外时事者所论列于后，冀当道深长思之。

癸巳冬，余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诸生，题为《议院论》。苏州许生象枢文最佳，兹附录于后：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非禁民之议也。有道之君其知识足以烛民之隐，其仁慈足以苏民之困，其勇断足以除民之患，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虽欲议之无得而议焉。是以三、五之世，不有议院而物阜民康，后世莫及。然

而圣不自圣，未尝不集众思以广益也。故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虞帝有告善之旌，夏后有昌言之拜。不特此也。传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是三代盛王罔不博采众议也，特未创立议院名目，故遇哲王而言路通，否则言路即塞耳。

考泰西上古亦无议院。耶稣降生前五十七年，即汉宣帝五凤元年，巴勒斯坦新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此为欧洲议院之权舆。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迄于今而上议院、下议院无国蔑有。诚以议院之有益治理非浅鲜也。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德、俄等国是也。民主者，权落于下，议院得以专威福，弊在无君，美、法等国是也。英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立法独为美备。然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

我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饶，人民之众，甲于五大洲；然而地利不能尽，国用不能充，弊政不能革，刑罚不能简，民困不能苏，国威不能振；下有贤才不能遽用，上有庸佞不能遽退。非中国之君不若泰西各国之君也，非中国之相不若泰西各国之相也，上下之情隔焉故也。是故中国而不设议院则已，中国而设议院，其有利益于国家有可俛指计者。中国五金煤矿，宜于开采；地气丰腴，宜于种植；物料宏多，宜于制造。如有于开矿、植物、制造确有见地者，即由议院上请开办，则地利尽矣。其利一。泰西各国凡大师旅，大兴筑，议定后即由议院筹款，盖百姓利之劝输自易也。中国皆拨庠款，故虽明知厘卡、开捐之弊，而用度支绌，不能不借以补苴。有议院则上下同欲，筹款有自，国用不患无措矣。其利二。我朝忠厚开基，深仁厚泽，皇古未有；然而部办之掣肘善政，州县之滥用非刑，厘捐

之不恤商情，诸弊尚多沿习。如建议院，则弊之所在即许直陈，不患不能尽革矣。其利三。泰西之俗，习律例者原有专家，设刑司以听断，设状师以辨驳，初不隶于议院，然上下情通，博访周咨，真情易得，中国诚能仿而行之，有狱不至留滞矣。其利四。海禁初开，中西立约通商，西人着着占先，中人事事吃亏。查近今通商贸易册，英之每岁赢金有四千余万之多，民力安得不困乎？有议院以维持之，则已往之条约可设法更换，后来之弊窦可先事预防，不受其抑勒，不受其把持，则商民之气伸，而困可稍苏矣。其利五。中国剿发、灭捻以来，整军经武，已非道、咸时可比。然承平日久，故态复萌：侵蚀名粮则额虚而不补，刻剥军实则器旧而不更。甚或耽于烟酒，不知操练为何事；私通梟贩，转以卖放为利藪。有议员以抉其弊，其上无虚糜之饷，下无不练之兵，而国威可振矣。其利六。泰西诸国大臣皆由议员公举。民主之国，虽伯理玺天德之废立亦由议院主持。是以贤才不至淹滞，庸佞不得固位。中国宜略师其意，内而大学士、六部大臣，及总理衙门、海军大员，外而督、抚、提、镇，及驻各国使臣，皆咨于议院而后简放。则怀才之士进，而不肖者退矣。其利七。

虽然，事属创始，必有出而挠之者。日本步武泰西，其气较中国为锐。观其工艺之日精，制造之日盛，几疑举国皆知西法之善。然前年开院集议，有掷石噪扰伤及议员者。况中国拘守成规，牢不可破，尤非日本之比哉。窃意中国政事动援成例，议院之议为国家兴利而已，除弊而已，岂必有成案可循，则部臣必有挠之者。中国之迁擢臣僚也，不视人才之可否，而视资格之浅深。议员之公举，重才能不重资格，则内外臣工必有挠之者。天下升平，武备渐弛，有议院以议其后，统兵大员不得冒口粮、废训练，则提、镇以下诸武弁必有挠之者。各省设立善后工程、军装等局，名目繁多，盖以调

剂闲散人员也，实则耗财用、无实济。如立议院，此等人员必多删汰，则各省闲散人员必有挠之者。凡州、县佐杂之廉银禄米所得几何，其得以肥身家、裕后昆者，非阴蚀国帑，即显剥民生。有议院以发其覆，则美缺皆为苦缺矣，则州、县以下必有挠之者。中国之民少所见多所怪，可与图终，难与虑始。前年设立电报，强者拔竿断线以肇事，弱者街谈巷议以惑众。议院之设亦为闻所未闻，则百姓必有挠之者。其挠之之说必谓中国民风土俗与泰西殊。泰西之民顾大局明大势者居多，中国之民往往爱己不爱人、顾家不顾国，行之既久，必有借公议以箝制官府、把持公事者。

不知天下无无弊之法，而有无弊之人。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如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即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人人恶之则为公矣。即有时众议员意见不合，各执一是，亦可互相辨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何虑其有弊乎？中国诚能行之，将见君民联为一气，家国合为一体，古所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所云“众志成城”者，不难再见于今也。故蒙得而决之曰：有利无害。^①

^① 自“癸巳冬”至“故蒙得而决之曰：有利无害”，为《盛世危言》八卷本所增附录。

公 举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使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以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贍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己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意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

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愜，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

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器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

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浅深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哺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傅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今国家既下诏求贤，凡位列宰辅及部院名公，封疆大帅，既遇此难得之遭，自必踊跃欢欣，各举所知，以仰答求贤若渴之意。然荐贤者，平日既未于海内奇杰留意物色，则此时举以应诏，自难必果系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踴躍四顾，中选者颇难其人，不得已而始以亲旧中之稍有节操，或以著书立说自炫者取以塞责。其于体国经野之谟，拨乱反正之略，茫乎

未有得也，曾何裨于实用乎？尤甚者，则以奔竞为能，以干求为事：或奔走王公之门，或夤缘津要之路；且有丐显者作尺一书为之先容者。辟幸进之门，广苞苴之路，而人才自此不可问矣！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 君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①“神农憔悴，尧瘦矐，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②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原其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借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国会中人，即下议院之人，法民创立行新政，除积弊，

^① 《淮南子·修务篇》原文是：“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

^② 《淮南子·修务训》的原文是：“神农憔悴，尧瘦矐，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优劳百姓甚矣！”

勃然振兴，各国闻风而起。新法不准行，乃愈压而民愈乱，因变君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救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裂，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问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

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瞶，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无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

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乎，孰使之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贤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万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惓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苻；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愒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可？”则曰：无难也。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非上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故知君人者，欲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

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所著《民权》、《共治》、《君权》三论，识见高远，发挥透辟，足以起痼振聋，为救时良药。无论民权、共治、君权，宪法皆不可无，惟各有参酌耳。附录于后以备当道采择施行。

民爱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养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

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勿能保于天则为弃，疾视而侵之于天则为背，全顺者受其福，而背弃者集其殃。何者？民与权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宪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维持之，使无失坠，非有宪法律令而后有民权也。故国人皆曰政府可设，而后政府设；国人皆曰政府可废，而后政府废；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行，而后宪法律令行；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革，而后宪法律令革。国家大事，措施得失，阖四境之民平议而行，其权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错莫能画一，且各有生产作业，不能亲政，为古今通患。于是立贤者以为之王，以为之辅相，借之以柄，以齐整天下。故君相之权，固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柳宗元曰：“吏于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谚曰：“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仆鞭捶其主人，则不伦孰大于是。余窃观中国古圣贤创业垂训，具合于泰西民权之宗旨。盖公理无东西，而大道无古今，凡有血气，其积思所至均也。尧、舜官天下，求贤禅让，何与美利坚合众国公举总统之制类也；汤武顺天应人以放伐独夫，代膺大位，何与欧州列国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类也。孔子对哀公曰：“百姓足，君谁^①与不足。”孟轲以“君为轻，民为重”^②发明民权。岂有彰明较著于此者哉？意者，孔、孟之时距三代不远，尧、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圣一贤，得志于当时，其所成就，盖有难测者矣。惜乎后世昧于圣哲本旨，不能扩充阐明以成太平，至于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汉以降，沦胥至今，风气之不开，纪纲之不肃，国本之不固，官闱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气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无顺天之君下，有

① “谁”字，《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为“孰”。

② 《孟子·尽心下》原文为“民为贵，君为轻”。

弃天之人而无敬天之民。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

古今东西，一治一乱，盛衰之变，不能百年。今欧、美诸邦，日跻富强隆治之域，国运蒸蒸乎不知其艾期，是其故何也？不治民而与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专制为治独裁为政之谓也。有贤明之君在上，则国富兵强；有暗愚之君在上，则国贫兵弱。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盛衰兴亡之几系在一入，自古贤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东洋诸国常不振也。曷言乎与民共治之也？公议为治，集思为政，举国中之良撰而委以政焉。故虽有幽、厉不能行其暴，虽有管、蔡不能逞其奸，盛衰兴亡与一国人心相表里，此所以泰西诸国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强而恶弱，爱治而忌乱焉，而东洋诸国之遂不免夫乱与贫者，独有尚古薄今之弊，根底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国儒者开口辄言许身稷、契，致君尧、舜。呜呼！周、汉以来，论治道者畴不以尧、舜、禹、汤为指归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浇，风气日薄故也。彼唯貌似圣人，而忽圣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为旗帜，而三代之治愈远也。余尝读史，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而求其聪明睿知为天下真主者，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百五、六，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灵鱼肉，肝脑涂地，宗社亦随而亡。历朝相袭，如环之无端。天下播、绅章甫之士，独不能鉴于前辙沉溺二典，歌颂三代，以待圣人之出。其愚岂止待河清之比哉？若有人于此，其力能摆脱三千年宿弊，变专制独裁之治，作众思公议之政，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

或难余说曰：“民权说颇善，然似不与君权相容，为之何如？”曰：君依民为重，民依君为重。上下一德，君臣一体，无相侵之理，是为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诸国重民权者，莫英国若焉：国中四民皆仰

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间无纤芥之嫌。去年政府举女王即位五十年庆节，举国欢腾，皆祈王之万年以致神明，忠爱之沉沦浃于民心。未闻民权之侵害主权也。世界诸国崇君权者，莫突厥若焉：箕敛头会以贪民利，箝口结舌以禁谤言，国民视王如仇讎，寇乱数起，上下解体。彼以君权为维持尊严之具，而不知启民心涣散之渐。今以英国比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为何如乎？自古一国之主，亲裁万机，权不旁落，名实两副为天子者，唯创业垂统之君为然。至乎中材以下，则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权之名，而无君权之实，况于庸劣之主乎？故权不归宰辅而归外戚，不归外戚而归宦寺，不归宦寺而归藩镇，君唯垂拱拥虚器耳。令宰辅为伊、周，外戚为霍光、窦武，宦寺为张承，藩镇为郭子仪、田弘正，犹有专权之嫌。若令宰辅为莽、操、卓、懿，外戚为贾充、武三思，宦寺为仇士良、魏忠贤，藩镇为李师道、朱全忠，其为祸将不胜言矣。故其未造有绕柱而走者，有饮鸩投缳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天家为祷者，以万乘之贵求为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国儒士弥儿曰：“独裁专制之国，无爱国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夫独裁专制之君，以天下为家，宜爱其国。既爱其国，宜举其国之贤者委以政事。今顾偏信左右，听于佞幸，以至丧其宗祀者何也？则明有所不见，而聪有所不闻也。昔唐德宗谓李泌曰：“人皆以卢杞为奸，而朕遂不知杞之为奸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犹有此言。难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听于左右者，听于国中；以所选于寡者，选于众；以所分于宰辅、外戚、宦寺、藩镇者，分于亿兆，与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从众君德也，虽专制独裁之主，其初非得众心则无以取大位，况于发愤自强与欧、美争雄者，何以削君权为介介乎？善夫！薛叔耘星使之言曰：泰西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考泰西之有议院自罗马始，当中国周贞定王十五年时。罗马因条律不公，选十人公议国政。巴勒

坦，汉宣帝五凤元年，纪元前一百一年，设议政五大会，每会七十人。迨纪元后八百余年法国泰甫帝大选议员一千一百五十一人，春秋征集与之议国宪。一千一百四十四年，当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意大利新立议会。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当宋度宗咸淳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垂诸后世。嗣兹而降，议院大兴，文明日启，遂为千百年有国不易之宏纲。惟俄、土、波斯至今尚无议院。识者忧之曰：压力重则拒力生，热质凝则火山爆，君权尊则民变速。法、奥前车，民党覆辙，乌可以不寒心哉！^①

^① 自“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所著《民权》、《共治》、《君权》三论”至“乌可以不寒心哉！”，系“原君”篇附录。

自强论

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未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而天下治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骹法，而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兴，秦二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时、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古云：“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可与专制政治互相发明。惟纯常子《自强论》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与立君政治为近矣。

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

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圆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①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飭下督、抚，由督、抚飭下司、道，由司、道飭下府、县。府、县召书吏以一纸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耳目，此外寂无举动矣。甚或前任所为，后任裁撤。虽创之费巨，成之日久，皆所勿恤。此由于中国从无立君政治耳。夫立君政治，除俄、土二国外，专制政体，在今日称各国例外之政体，将来亦不得不变。俄早议有宪法，但未行耳。文明诸国无不从同。惟君主与民主之国，宪法微有不同。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或谓恐失君权。不知君主之国，如英、德议院，所议之事与君不合者，可置不行。昔英儒矮里斯托路氏云：“政府之强大，古则尚力，今则尚德，反是则势涣国衰。”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沪上葡萄牙国总领事华君告余曰：“中国欲拒外侮，务在合群。我国穷民少全得此益。”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篇中拟立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之遗规也。

^①《自强论》篇是《盛世危言》八卷本所增，文中所指《危言》系《盛世危言》五卷本。

日报上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②，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

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各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亲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其先声。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惟禁报馆妄言，以肃观听。英、美、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如英国《泰吾士日报》馆主笔者，皆归田之宰相名

臣，自然无勒索人财，亦名驰中外矣。

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索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借公事以报私仇，藉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迹同秽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惩治。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噎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如谓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常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

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覬觐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施施然甘受他人之凌侮也！

日报下

上篇论中国沿海各省宜次第仿行日报，以通民隐，达民情。今观中、西名士所言，而叹日报之有关朝野，不独沿海各省亟行仿行。《新政论议》云：“宏日报以广言路。”是日报者，即古乡校之遗意，今西国议院之滥觞，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故西国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

若夫官家之鬻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

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股分之低昂，店铺之开歇，田宅之鬻售，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选，人材之兴举，民情之向背，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都邑之公项，司事之诚伪，医道之善法，药物之灵异，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之优劣，陪员之轮值，水旱之灾祥，生死之报章，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画，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汛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奇，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虽极之高人之片词只字，愚妄之荡检败行，足以寓劝惩，使人鼓舞而兴感者，无不罗布发明，俾阅者快焉劝焉。征信质疑，莫善于此。

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伪，一秉真肫。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英国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足教官吏而不敢违背。若夫医学、化学、天学、即象纬历算海学、行舟测量之法电学、艺学、矿学，以及治兵课士、军装战舰，皆必另设一报。不

惟详言其事，而且细绘其图，此又利世利民而欲与天下人共趋于上理者也。

夫日报逐日阅之，殊不费时，随事求之，必有新获。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嗫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凡为主笔，必须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援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至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如主笔借此勒索，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不论大小官绅，当控诸地方官审办，并准两造公举中、外陪员听讯。如果属实，则照西律，分别轻重，治以禁锢之罪，重则在禁作苦工而已。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夫如是，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

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非用压力不行，故动以兵船相要挟。当

道于彼族律例风俗，强半未谙，应争而不争，应让而不让，卒为所算，悉数难终。乃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意在激怒其民，以与中国为难耳。如中日之战，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乃反诬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惩前毖后，或日报，或礼拜报，宜亟用西文，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若我行我法，人言不恤，则沧海横流，伊于何底，非我侪所敢知矣。^①

^① 自“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至“非我侪所敢知矣”，系《日报下》篇的附言。

吏治上

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中枢之与督、抚，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操用人行政之大权者也。然国家设官，本以为民。其与民最亲，而贤否得失之间，动关国家之治乱者尤在州、县。何则？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内而六部，外而两司、道、府诸官，皆考察此州、县者耳。伊古以来，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亦未有牧令非人，而疆臣政府可以坐致太平者。独奈何进身之始，科甲、保举、捐纳既已不一其途，而吏部铨选之章，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及选补得缺，则需次日久，负债累累，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乡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复生，断者已不可复续矣。

间有廉能之吏，一意兴利除弊，教养斯民，而知府之

意见不同也，司道之威严可畏也，上官倚之，同寅笑之，众庶疑之，必溃其成而后已。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媵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钳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噫！上下之间相蒙相遁至于如此，而犹日日言自治，是犹南辕而北其辙也，其必无成耳。

况上之任人也不专，用人也既不尽其才，又不问其能否。陆路之将可改水师，水师之将可调陆路；刑部之员可调工部，兵部之员可调吏部。强以所不能，而不专任其所以能，岂果有兼人之资，无事不精，故能随事胜任耶？正虑其所谓无不能者，乃竟无一能耳。徒伴食贻讥，一任颠倒于胥吏之手为可叹也。溯唐、虞之世，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不相兼统，如契为司徒，皋陶为司寇，伯夷作秩宗，夔典乐之类，皆以其所优为者任之。未闻以敷教之事强皋陶，以刑名之事强伯夷，以典礼之事强夔也。是以百职庶司，皆能各称其职。

泰西官制与中国名异事同，惟户部之外有农部，专考树艺之经；外部之外有商部，专讲贸易之道；工部之外有邮政部，专管驿递之往来。其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陆路提镇不能调水师。学古入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升迁，终于为此部之首领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迁移，故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愈久而识更精深。富强之原，实基于此。独无吏部之设，无铨选之条，百僚升

降权归议院，期会之令出自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无回避本省之例。盖既洞悉其风土人情，自收驾轻就熟之效也。西人云：泰西地方官非土人不用，非土人不举者，恐其不能尽知风土人情利弊。凡属身家清白有产业者，均许保举人材。考察录用，与中国上古行乡举里选之例无异。俞荫甫太史云：今州、县吏乃若佣力者然，计一岁之利，任一岁之事。其地诚肥饶耶，上之人不欲使久擅其利，满一岁率去之；其地诚瘠薄耶，其人又不待一岁而亟亟以求去。以故贤者莫能有所施設，而不肖者惟知饱其私囊。官与民漠不相习。一旦有急，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疾视其长上之死而莫之救。然而曰吾将自强，正不知果在何日也。

听讼之事，派以陪审，而肆威作福之弊祛；列以见证，而妄指诬陷之弊绝。所谓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者，昔闻其语，今见其事。而且，俸糈优厚，人无内顾之忧；职任精专，事有难宽之责。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孜孜然日求有益于民，有益于国。否则，议院排之，国君斥之，不能一日居其位。此泰西诸国所以不言吏治，而吏治自蒸蒸日臻于上理者，彼此之情通，声名之念重，而壅蔽之患除也。尝阅西报云：泰西自设议院、日报馆，各处声气相通，上下无壅蔽之患。其西例，武员升降皆由兵部，水陆提督黜陟，以其部下畅晓戎机，迭获胜仗之武员升任。从无文职大僚，不知武备，而权能举错武员，及委任军事等局总办者。今中国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皆有统兵守土之权。既素未孜孜讲求武备，何从知其偏裨优劣，而遽委以举错升调，虽无私心，亦恐难期尽善。昔丰顺丁中丞办事精明，闻某以贿赂而得管

驾，故亲坐该船验其能否。该管驾与司舵说通，视司舵者之烟筒嘴所向为的，指东则曰东，指西则曰西，丁中丞不知其暗号，竟为蒙蔽也。

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官司益多，否塞益甚，堂廉益远，积弊益深。欲一扫而空之，诚非开设议院不可。即势殊地限，久而难变，亦当裁汰冗员，酌增廉俸，以渐通其隔阂，而渐化其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强之本计也。夫天下虽大，其州、县不过千余，所属牧令不过千余人，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以慎选之，以严核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固，国势日强，而何畏乎英、俄？何忧乎船炮？何患乎各国之协以谋我哉？故曰：国以民为本。而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生乱之原，莫急于病民之政。所谓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此之谓也。

英国授职之官，无论充兵官、议员、刑员，以及内政、外政衙门，大小臣工，皆须在众人前向天发誓，谓以后当忠心为国，笃爱朝廷，身许驰驱，为国家效力。发誓后方能任事。今泰西各国及合众国皆用此例。西俗：国家凡有兵祸，或匪人谋叛，或敌国来攻，朝廷志在安民，兴师戡暴，必令兵官誓众以安民心。其或官民谋逆，则令彼处地方官民皆对天矢誓。其内作者立时可睹见于颜色。朝廷即知为某也忠，某也奸，某也曲，某也直，有诸中而形诸外，自无所逃遁。然亦有刚愎不仁，强项不驯，不知敬畏帝天，虽有别谋，亦

复当众同誓，以为口头言语，无足重轻。此等人为众所不齿，乃桀骜之尤者也。

王爵棠星使云：法国政治以大统小，以内控外，体制与中夏略同。州、郡、邑、乡分设专官以理民事，而其权操之于上，咸遵一律，罔或违异。每一干端则设一官，若中国之州、县。凡膺是职者，必考授律例师，凡民间琐案，悉由其剖断。苟有稍涉疑似未臻平允者，则代为申详，上宪据法研鞫，俾成信讞。各乡、镇则另设甘门一员，如中国巡检之类。凡其所设各署，俱有专职，从不兼摄数事。大抵理地方民情者，统称刑讼衙门。而官有崇卑，如州、县、乡、镇等官其小者也，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有事控于地方官，悬案不断或剖断不公，俱可复控诸所辖上司，遍历二十七所而后止。然此尚系琐细案件也。若值重大之事，其上另有专断之官，其职分约同中国按察使。各府中均设是署一所，凡有冤抑，听其赴诉，每年四期，每三月一集，开堂会鞫。并许被控者自选秉公耆老十有二人，届时质证剖理，惟毋得徇私偏袒。然后鞫者听两造之辞，以辨直枉，舍寡从众，期无诬屈，以为惩劝。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负，则有钱债衙门。其官由州、县百姓公举，三年一任，期满再举。但推选虽由民庶，而俞允仍归国主。凡乡民因索逋涉讼者，其数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即由州、县上司判决；若一千五百福兰以上之案，乃控于钱债衙门，为之比追。每府皆有驻防水陆兵丁，苟有犯案，统归所主办理。至于巴黎所有衙署不可胜数，凡国中官吏所断一切词讼，均必上闻。其有悬拟未决者，亦皆关白以定是非。其中办事人员均系著名律师。除上、下议院外，有参赞机密大臣，有执国政大臣，有总理度支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主军旅者，有榷税饷者，有专理户婚田土事者，有专理商贾事者，有治盗贼斗殴事者，有治列邦事者，有管属国地方事者。观其分职建官，颇能尊卑相御，内外相维，无

畸重畸轻之患。其为部十二：曰内部，总理庶政兼摄群司，职同中国之首辅，本国事件咸听裁决。曰户部，专司出纳，国中一切财赋税饷皆其主持。曰商部，管通商事务。曰农部，管民间一切种植。曰工部，凡军械、火药、修治、建筑皆其经理。曰文部，掌管学校。曰兵部，主治军旅，凡调遣一切，皆其主政。曰海部，修战舰、治水师。曰藩部，管理各处属地。曰刑部，主持律例，兼理教案。曰创例院，筹议军饷，增改律法，皆其专政。以上皆以勋爵大员为之。国有大政，国主与此数人谋之，有机要事，皆得参谋议。同治十一年，国会别设军机一职，由上、下议院公举二十八人，伯理玺天德亦简派十五人。凡下诏谕、上笺奏，皆由此四十三人管理。据其报册，每年建官计文员约二十万人，可谓繁矣。欧洲各国度支往往出多入寡，皆因设官繁密，事不兼摄之故，而又给禄丰盈，食浮于人，以致经费常患不足。然秩虽崇而事克举，国中大、小臣工，无不守法尚廉、不懈厥职。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即贵至执政大臣，抑且以民之可否为去留。又其权征税饷具有常度，涓滴必归公款，不得朘民为生。其所谓库臣者不过综厥大纲而已。其所谓理财者不过司出纳掌簿录而已。而所谓因循蒙蔽，侵冒剥蚀，乾没克扣之弊，彼反无之。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

按泰西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各部长归宰相自择其人。如宰相一换，而各部长虽才德素优，与宰相不情投意合者亦必解组赋闲。我国家时艰孔亟，万难苟且姑安，急欲补救，量为变通。惟恐为不洞识时务或未经历练者所误，而反归咎于变法之人，故前篇有拟请朝廷简派亲王贝勒游历一说。今时不可缓，亟宜简派亲信之王公大臣，能通西国言语文字者更妙随带翻译，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考究各国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如有才德兼优之老臣宿将，当奏请朝廷重聘回国，以其所长分派各部

佐理，如素当户部大臣归户部，素当兵部者归兵部，素当农部者归农部，万不可以户部人员当兵部。去年以陆军兵官汉纳根当水师副统领已为外人所笑，且中国政教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已素为各国轻侮。不致为官商所愚，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①

吏治下

上篇论州、县为亲民之官，而贤否得失关乎国家治乱。然督、抚为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统属之贤否，全在督、抚公正廉明，平日留心察视，不为人所蒙蔽，然后能甄别确当。一有偏私，则所贤、所否者皆不当矣。一省之司、道，佐督、抚以出治者也，而用人理财尤为藩司之专责。藩司之贤否得失，督、抚居其半。若督、抚大公无我，严加举劾，朝廷察其好恶以定黜陟，人皆有自爱之心，敢不称其职守乎？首府者，又督、抚、两司所寄为耳目，而藉以进退州、县，其责亦綦重矣。自有以人地相宜之条量移州、县，而后各省为人择地者十之八、九，为地择人者十无二、三。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驽庸竞进，以事贪婪，孰能尽心于民事哉！而以民事为事者，又每拙于逢迎，故

^① 自“英国授职之官”至“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所增的附言。

黜陟不公则奔竞不息，源浊而流清，未之或有也。守牧有表率之责，大省不过十数州、郡，以督、抚、司、道之长才，鉴别十数员知府、直州之贤否何难？大郡不过十数州、县，小郡亦不过数州、县，以本管知府就近察数州、县之贤否何难？

愚以为甄别府、厅、州、县，必须分别等差。平素具有灼见真知，临时乃能因材施教，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为一等；廉明诚静，有守有为，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劳绩，可理烦难之地者为一等；复将通省、府、厅、州、县，查明肥瘠难易之区，一一分别注明，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之员，选以优缺，俾知瘠区不可规避，而美缺之不待钻营，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奋兴。吏治转移或在于此。要之州、县为亲民之官，与州、县切近而实临其上者是为知府。州、县之功过知府得以详之，司、道、督、抚而察其可否，以定其优劣。上之视知府重，则知府自视亦不轻，使州、县有所敬畏，而不敢不为好官。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至于关差厘局每一缺出，百计营谋，幸进之徒往往有三、五年不更替者。否则交卸彼局，而又接管此局。托词事关重大，非资熟手不能胜任，其实无地方之责，不过收支银钱耳，一谨愿之吏已足为之。乃有徇情市恩不畏物议，巧者获利，拙者向隅，以致关税厘金日形短绌，己则饱填欲壑，惟利是图。若以治地方，宰百姓，安望其为廉吏乎？黜贪崇廉，任贤而斥不肖，是又在督、抚破除情面，一

秉至公也。或云：朝廷下诏求贤，十数年来各督、抚所举皆门生故吏及业经简在帝心之臣，无一山林隐逸之士，负奇才而励品行，尚气节者终不得上进。无廉耻而善于钻营者竟得保举超升，惟知削下媚上，不问民生休戚，以讳言有事为解事，以苟且了事为能事，因循玩愒，相习成风。广东贿赂公行，赌劫之风甚炽。被劫者多不报案，因破案者百不得一，徒耗禀费、差费、勘验夫马费耳。官之为民亦可知已。间有洞识时务才德兼优者率皆秉性忠正，不善逢迎，虽欲兴利除弊，往往事多掣肘，不克举行，亦有学西法而图自强者，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不能集思广益，多为洋人所愚，安得不为各国所欺侮乎？

善夫剑华氏之言曰：“今之督、抚才德兼优而又洞识时务者鲜，类皆尸居暮气，非病于才力不足、精神过短，即病于情面太重，以公济私。有识见浅陋不识时务者，只知偏听节费以博虚名，往往前任遗政虽将来大有益于国计民生，惟尚未见其效者，无论其糜费几何，亦即裁撤，以致功败垂成，临时需用重新复议，非独缓不济急，而糜费反多矣。有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者，虽知时务，任性妄为，既不能知人善任，又不能量材器使：或采文字虚声，或重师弟年谊无论能否胜任。有一人而兼数事者，因无阅历，以致为人所愚。迹其所为，皆糜费多而成功少，制造不及洋人之精，价值不如外来之廉，而旁观月旦多属膺中之佼佼者矣。至如平日官声本属平常，及晚年循资例进，洵升督、抚，暮气已重，遇事粉饰因循，只知饱其囊橐为子孙计，初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论者金谓：近日宦途风气，每以省事为老成，而甘于因循弛堕；苟勤于厥职，不惮烦劳，类招多事之嫌，执其一节之失，而并没其他事之长，坐令勇于任事者不若

尸位之輩转足苟安而无恙也。悲夫！人材之绌岂非由于不能造就人材之过哉！造就人材之权上在元首，下在枢廷。查泰西各国凡新任宰相视事之始，必自择其平日同志之人升诸朝廷，以为心腹，庶几议事和衷，办事无棘手也。故何律师《新政论议》谓复古之要有七，首择百揆以协同寅。并吏、礼二部而为一，名曰内部，宜添商部、学部、外部，合户、兵、刑、工而为八部。以一人之宰相，而八部之长使宰相自择其人。夫政者各有专司，不能越俎。政既为某部之政，则官必为某部之官，故升降黜陟必由该部定义，方能允当。繁文末节治体无关，于有谓之事而加之意，先于无谓之事而省其烦，故拜跪趋跄必概行除免，而杰士始来。故并吏、礼两部而为一，所以专责成而大得士也。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故加立商部。学部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故加立学部。农事不讲则种植畜牧不旺，故加立农部。

今强邻日逼，时事多艰，正宜澄叙官方，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亟当力为整顿，剔弊除奸，为百姓求贤父母，培养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亦罔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不称其职，知府揭之于上司；司、道不称其职，督、抚立上弹章；督、抚不称其职，朝廷立予罢斥。整纲饬纪，除恶择贤，则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难扫除净尽矣。故正本清源必自慎用督、抚始。

泰西日报尝谓我朝内外臣工，泥古不通今，所学非所用，偏重科甲，上下相蒙，植党营私，卖官鬻爵，不能量材器使，有一人而兼数任者。吏治不讲，流弊甚多，惟身家念重，畏难苟安，以聚敛为才能，以废弛为节俭，以因循为镇静，以退缩为慎重，以调停掩饰为熟谙夷情。凡事皆有名无实。所用刑具过于残忍，所学西法亦

仅得皮毛。能洞识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病者无几。岂非教化未敷，尚未处处创立中西大、小义学所致？若不通权达变，因时制宜，终难富强，无异土耳其风俗政治萎靡不振。等语。查光绪四年八月十四日英报论土耳其：大、小官员贿赂公行，曲直颠倒，有朝绶符而夕摘印者。苞苴竞进，贿多者得善地，若贫而有才者，终不得预选。土王暨部臣明知，亦拘守成见，萎靡不振。谓小亚西亚如此办理，恐难富强。何不通国更张？于是论议纷纷，渐有因循推诿，久之并前议亦不提。土国之病在于不迅断，欲振不振，非一次矣！所以然者，世官爵裔生长纨绔，未尝出国门一步，如井底蛙，何尝见一善政？民之颠连呼号如无闻见，即亲睹之而以为于我无涉，欲其保全疆土难矣！按中国未必如土耳其弊政之甚，清廉之官尚多，惟惜不洞识外国利弊情形，拘守成例，因循苟且，但顾身家性命耳。

噫！此皆道听涂说，未读列朝圣训及名臣奏疏之故。今姑举一、二为阅洋报而随声附和者览焉。恭读世宗宪皇帝批谕李敏达公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疏曰：“封疆大吏关系国家隆替，若得有猷、有为、有守者二十余人，分布寰区之内，俾各莅临民敷宣教化，则天下大治计日可期矣。无如英髦罕覩，即能公之一字亦不易获。朕只得随材器使，量能授职，徐观后效耳。”雍正十二年批谕广东总督鄂文恭疏曰：“身膺封疆要任，当远大是务，不宜见识浅狭。公、私界限只在几微念虑之间，一涉瞻徇，即为负国溺职；重则貽累功名事业，轻亦难免物议于己，毫无裨益。无如烛理不明者比比皆然，每争趋些少光荣，以图目前快志，遂置日后无限悔吝于不计也。”此谕亦使抚臣、两司观之，且谕群臣尽力屏除科甲因循萎靡沽誉诸陋习，虽司、道、府、厅亦有准其具折奏事者。仰见圣明虚怀集益，洞悉吏治利弊，知人善任，不拘定格，不主故常。

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一疏。其中论用人之道，

保举一端种种流弊，略曰：婪财纳贿，卖官鬻爵，其所恃结纳廷臣，年送规例。故穷奢极欲，毫无忌憚。至所用之人，大抵非门客帮闲，则光棍蠹吏，以至微极贱、寡廉鲜耻之徒。不行夤缘钻刺之路，尚有何事不可为！甚至道、厅与堂官结为兄弟，微员认为假子。是以卖官惟论管钱粮之多寡，以定价值之高低。且题补多系除帐，止须印领一纸补后方勾通开销，果能照领全楚，则为廉干之员，再有美缺复又题升。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顾品行者，不惟无人援引，率皆怀抱羞恶，奉身而退。又谓用人之道所关甚大，我皇上拔擢出于宸衷，揆斥裁于乾断，寸长不遗，匪材必黜，臣何敢置喙？然保举一端似宜详慎也。凡大臣举荐一官，纵不敢欺皇上，其如大臣之不能不受人欺何？臣以^⑨举大吏不徒论其操守，更当考其经猷；不徒贵乎意见之不徇，尤当求其执持之无偏。且封疆重任，有统兵守土之权，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备不修；有察吏安民之责，倘激扬失当，必致人心不服。即有好官，用非其地，不今，每细心阅历各属员，其庸碌无长、贪劣废弛者俱不足论。观其颇有声名，素称才能之员，一一考其实迹：有差委奔走之事，则长于办理，而抚字摧科无一可取者；有长于吏治，而疏于出纳，以致钱粮亏空者；有利口捷给，论事多中，而于职守事务全无实济者；又有一等巧于钻营，专工窥探上司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动气象无不体贴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机，一遇保举舍此而谁？岂知图得保举则从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锋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尽现，此又才用于诈伪，而其患尤烈者也。更有风厉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窦。凡此数等，皆以才名而多于地方有误。倘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塞责，鲜有不贻害者。臣请嗣后凡保举各官，必令注明所长，不必讳其所短。验过成效，确有实迹，以备简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也。既尽力任事，则非徒承办目下各项案件，遂为称职，当思培植地方元

气，作何未雨绸缪？整饬通省属员，作何宽严并济？务期上有益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凡用人理财，经画久远，化导积习，惩创愚顽，稍为皇上分劳宣力，方不愧于此心。且身为封疆大吏，必有经文纬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识，庶能不动声色，措置咸宜。

又鄂文端公疏曰：“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财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本诸絜矩，而财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为政在人，人存政举，归诸一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皆有其责，而一身之分量等级，庶政之兴废优劣，胥视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才，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也。”又云：“诸国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不独劫人烧寨视为泛常，杀兵伤官亦目为故事。而文、武专司，儒者托言羁縻，巧者熟筹利害，纵报知督、抚、提、镇，率皆互相隐讳以为妥协。间有建议征剿者，非以为好事即指为喜功。此数百年相延辘习，即近十余年来亦不无瞻顾者也。”

又史文靖公疏曰：“督、抚为特简之大员，信任专而委畀重，一切兴利除弊整纲肃纪之事，尤当不避嫌怨，不惮勤劳，不博长厚虚声，不踵因循陋习，事事凜遵训旨，实力奉行。庶几民可以安，吏可以察，政可以举，教可以兴，贪墨知惩，豪强敛迹，盗风止息，国赋阜盈，文武协和，兵民辑睦，方无忝节制之重任，方无负简畀之

殊恩。今试问心自揣，果能如此奉行尽善、经理咸宜乎？夫督、抚者，群吏之表率也。政治者，斯民之观化也。若大臣身任封疆，不能使地方日有起色，风俗日见淳熙，其何以膺节钺而无愧乎？故必行之一年则有一年之成效，行之数载又有数载之规模。而悠忽从事，苟且自安，皆当深戒也。虽才具或有短长，智虑或有深浅，而有志自励者无不可学习而至。试观今日督、抚，事事悉能仰遵圣训，而又克尽抚绥封疆之职，其吏治民风实有可观者，非仅行一文、张一示遂可为遵行不怠也，亦非举一吏、劾一官遂可为奉职无欺也。即不然，或奉谕旨勉行数事，凛皇上之天威，矫饰一时者，皆不可为。臣心已殚，臣力已尽也。大凡人臣事君，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不知有己，斯可以任封疆之重矣。盖心者身之主，此心既肯许国，自然公忠自矢至诚无欺，不必有意迎合，而办理之事协于至当不易之理，自能上契圣心矣。”

可见当时君明臣良，民康物阜，致治之隆非无故也。何西报尚谓我国君臣偏重科甲，用非所长，因循粉饰，不能虚心讲求吏治耶？然历观古今中外各国，无不有君子、小人。是在朝廷一秉至公，无分畛域，知人善任耳。今我皇太后、皇上圣哲天亶，明同日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纵有奸邪，终难掩饰。凡属臣工遭逢圣主，皆当共矢公忠，必须博古通今，讲求中外利弊。官无大小，事无巨细，同心协力，无怠无荒，思有以利益社稷，救济苍生。苟有一夫不得其所，一事一物偶有乖违，莫非我责。办理中外交涉案件，悉照公法和约，准情度理，秉公判断，虽百般恫喝，不为所摇。若蒙特达之知，列百僚之首，尤当公忠体国，至诚无私：兴大利，除大弊，为百姓图富教，为国家谋久长。毋瞻徇私情，毋拘泥资格，毋党同伐异，毋泥古昧今，毋钓誉沽名，毋模棱两可，毋舍本求末，毋畏难苟安，置身家性命功名富贵于度外，斯即所以善保其身家性命

功名富贵者矣。否则纵不遭斧钺于生前，亦岂能洗污名于青史？况先人一意贪吝，后嗣必百般挥霍，悖入悖出，天理循环。何如积福德以遗子孙，长绵世泽之为善耶？^①

^① 自“泰西日报尝谓我朝内外臣工”至“长绵世泽之为善耶”，是《吏治下》篇的附言。

典礼上

礼之兴也，其中古乎？当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涿鹿之间，方耀武功，未遑文教。及尧、舜继统，垂衣裳而天下治，于是乎礼文备具中天之世，号为文明。逮至周末文胜，威仪三百，礼仪三千。礼文之详备，莫过于周，是故夫子曰“周尚文”，而又有“郁郁乎”之叹也。然礼与其繁也宁简。至于今日，繁已极矣！返璞还醇，其在兹乎。溯自元黄剖判以来，始而衣皮饮血，其简陋无仪礼可知。及制衣裳，造宫室，作礼乐，而威仪品节次第毕备。自来踵事者必增华，变本者必加厉。万物之数，其始由简而日趋于繁，繁至于极无可加，则又一变而日趋于简，简亦必至于极而后乃复为繁。其气机之旋转，犹夫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若循环之无端，莫能穷之也。

夫五帝不相师，三王不相袭，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变而为春秋列国。列国又变为七国。七国并于秦，又变为郡县一统。凡周先王之衣冠、典制、文物、仪器，莫不荡然无存。盖周为文之

极繁，繁极而至秦乃一大变。中间复更数大变以至于今，则日趋于简，日还乎质之时也。何则？吾盖尝微窥乎历代变革之故而知之矣。衮冕也，一变而为通天冠矣；上衣下裳也，一变而为通袍矣；佩玉佩觿种种之修饰也，一变而若存若亡矣；广裾也，一变而为箭袖矣；束发也，一变而为修发矣。衣冠如此，礼节可知。礼节者，随衣冠制度而相为损益变通者也。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殷尚质，周尚文。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又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合数语以体察之，盖可知夫子之右质而左文也。夫质者朴也，有崇尚太璞之意；文者彰也，有粉饰虚华之意。公孙子阳坐据西蜀天府之国，而不能当汉兵一战者，亦以烦礼多仪失之也。刘景升当汉末之乱，方且招名士，标厨俊，駸駸乎讲求虚礼，曾何救于荆州之覆乎？善夫夫子之美仲雍也，曰：“雍也简，可使南面。”然则吾谓夫子之贵质，非虚语也。

夫自秦、汉以来，一代各有一代之典礼，由博返约，一言可断，即吾所谓由繁而趋于简也。今中国之制度礼节，盖已简于前代矣，抑犹未也，虽日趋于简，而犹未简至于极，则迁流正复无已。譬如立版走丸，丸不坠至于地，则流转正无一息之停，惟细心人乃能体会之耳。三代以上，揖让而已，今则有登降跪拜，且极至于九叩之烦文矣；三代以上，三公常坐而论道，今则由坐而立班列侍者，且变为长跽敷陈矣。然此犹曰尊君父之礼也。至于卑幼之于长上，属

僚之于上官，小民之于官长，僮仆之于主人，皆动辄跪拜，罕复答礼。夫不论其中藏诚敬之实意，而徒责其外貌卑抑之虚文，是相率而以伪接也。故上以此求，即下以此应：或面呈巧令，转背即肆讪谤；或外作足恭腹诽，甚于轻侮，则亦何益之有哉？

今如泰西各国通行之礼节盖亦简矣：臣下之见君上，不过三鞠躬而已，免冠握手而已，上下皆立见，无所谓一坐一跪也。古之时诸侯朝天子亦然，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是也。此即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也。至其僚属相见，友朋相晤，长幼官民之相接，皆不过一免冠一握手而已。说者谓：“中烦而外简，中礼难学，而外礼易为。”是亦不然。设纯尚虚文，而罕实意以将之，譬如作傀儡戏，其跪拜揖让，何尝不彬彬可观，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一无真意存其间，何以异是。若夫西礼虽脱略乎形迹，有类乎倨放，然去其虚文之伪，则必流露其真诚，苟徒曰礼也可以演习而貌为，殊不知心意一有怠傲，则声音笑貌立著，其非不可以虚文掩饰也。此吾所谓真难而伪易也。夫堂廉之交接，上下之会同，亲友之结纳，畴不欲其相待以诚，乃不求其中心之自然，而徒责其外貌之当然。自然者无有不简，所以然者之根也；所以然者亦无有不简，当然之本也。止求其当然，则枝叶盛而渐离本根，浸假而至于世风日漓，诈伪相寻，皆肇于此，非细故也。更如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亦恒喜耀其外观，有一不臻华美者，则歉然哗然，自尤而人非之，至于精意之存

亡，真诚之有无，乃相与置诸勿论。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亦可深长思矣。呜呼！此我中国上下四万万人群相见以伪，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与其悦典礼之繁，共成一伪，何如从典礼之简，犹得一真。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是可为今日主典礼者当头之棒喝也已！

典礼下

《传》曰：“礼，所以安国家，宣社稷。”《记》曰：“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古人之于礼也其重如此。古者礼从宜，事从俗，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先王之治民也，因其政不异其宜，齐其教不易其俗，是以有古礼，有今礼，有世俗所谓之礼。吉凶、军宾、嘉宴、享朝、会盟，皆国家之大礼也。古人于行礼之时，或有愆仪失节者，皆知其为咎征之先现，祸机之将发。如临食而叹，闻乐而忧，执玉之俯仰高卑，趋走之视流行速，皆是也。自后世礼教失传，礼意浸衰，徒见之于虚文外貌，而礼之本原不可得而知矣。呜呼！此礼之变也，非礼之常也。夫毋不敬之谓礼。今之胁肩谄笑，喜怒逢迎，以为智效一官，能效一职者，问犹敢有责难交儆，陈善闭邪于主上上司者耶？今之顺旨面谀，请托干谒，以图办一公事、讨一优差者，问犹

得有殫心竭虑，尽瘁鞠躬，以措办得宜者耶？夫弛弛之声音颜色，已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犹曰士相见也礼在则然；赫赫之喝道鸣驺，已辟人于咫尺之间，而犹曰官淑问也礼在则然。故自有此烦文，是以卑躬屈节以为礼，而抗直之士断不收；自有此末节，是以有厚贿重赂而谓礼，而刚介之夫断不取。国家社稷之危危在此，上下民志之散散在此！

夫礼者理也。行乎礼之真者，国之兴也不难；行乎礼之伪者，国之亡也亦易。高丽之属中国也，有虚名而无实利。中国为高丽而与日本战者，徒为虚名。虚名者即今之所谓礼也。是故明乎礼之真者，不慕虚名而忘实利，不残民命以作战功。晋不争继文之霸业而争狄土；秦不争东周之王号而争蜀疆；俄于近日不西争土耳其而东争高丽。皆此意也。所望我国崇实事，去浮文，除礼之伪而得礼之真。譬如为子者温清定省，其于父母也，问安无缺，而乃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滥交匪类，反贻父母之忧；何如勤工作，谨交游，而以至亲无文为孝也。如为臣者跪拜趋承，其于君上也仪注无失，而乃授之以事，则有旷职之讥，托之以财，则有欺蒙之弊；何如供厥职，慎厥操，而以至敬无词为忠也。忠、孝，礼之大端，其余可以推类矣。

泰西之官亦有品位之不同，大都任事者权尊，位高者望重，此亦与中国不相殊异。惟其出入起居，一切规模，往往乔野无文，简朴不饰，旁人见之不知其为官也。迨各事其事，各在其位，则出一令也，无不应之如响；创一举也，无不从之如流。至其衣冠服御，或者亦有区别，我辈异邦

人不能深知而详辨，然较之中国，则华实之间大相径庭。故泰西各官，其于民间之情形，民事之底蕴，皆莫不了然若观火，而无廉远堂高之虑。虽以一国之主，皆得与齐民相晤谈，初无赫声濯灵，难于一见，此其风气直与古人无异。自昔我中国何尝不如此，三代以上君与民近，天子犹一方之吏，茅茨之阶不以为陋，沾体涂足之伦，时接于目。其为君者，或遁于荒野，或学于儒臣，如商王武丁，谅阴不言，梦赉良弼，求傅说于版筑之间，而举之相位。说者谓其求贤之诚，感格苍昊，而不知其实由高宗遁荒之时，早知傅说之贤，特恐来自田间，举登于位，朝臣或有所疑，故托为应梦旁求之事耳。迨至秦、汉而后，此等异闻，犹或有之，然君之体则渐尊矣。至于官，则犹未若今日之倨贵也。夫人主一身，岂能综理庶务，势不得不委任臣下；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亲，亦不得不分任其责于属僚。内而宰相部臣，外而督、抚大员，皆其位尊而权重者也。惟其位尊，故其威仪礼节皆与人不同；惟其权重，故其下亦莫不尊之敬之。而体势之崇高，仪度之尊严，与人迥异。自是而大员之一出一入，仪制繁盛，随从众多，伺候其门者咸偃倮足恭，有不敢仰视者。一轿马也，绿呢绚烂，舁者少则四人多则八人。顶马跟马，前后拥护，肃静回避，除道清尘。今当道前后拥护，手举清道旗、肃静牌者，皆衣衫褴褛，形同乞丐，无论停足何处，即解衣扞虱，非但不能壮观瞻，反为西人诋笑。其体统有如此者。一舟车也，或乘轮船，或坐兵舰。舟中则不敢搭客，不敢装货，开轮系缆必升炮，隆隆然络

绎不绝。骡车套车，极其高大，前扈后从。其尊崇有如此者。夫体统尊崇至于如此，则凡民间有冤抑苦情，欲赴诉于前者。谁不有所畏缩？求其下情得以上达也，乌可得哉？且不独大员为然也，即州、县各官，亦莫不自张其威，一州一县彼独称尊，除见上司时不敢不致敬尽礼外，若在衙署，或下乡催科、踏勘相验等事，亦复扈从如云，威仪煊赫。以州、县亲民之官，且不能俯察下情，躬问疾苦，则封疆大员，更无论矣。即如各镇分司巡检，亦且夜郎自大，不肯纡尊降贵。中国之官，体制如此，则其异于西国者远矣。西国虽以将相大员握重权，掌兵柄，指挥如意，措置裕如，而其出入之间，坐不过马车轮船。而轮船除水师提督等官自有坐船外，往往附坐公司商家之船。即挈眷同行，亦与诸客杂坐。随行之人亦不甚众，护从之辈益复寥寥。即有德政及人，或当临行之时纷纷钱送者，亦初无中国之所谓万民衣伞，及一切匾额、衔牌之类，但以杯酒为酬，并致祝词而已。

前篇所论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恒喜耀其外观，尤未详官场之迎送、馈赠、供给诸事，为害非浅。夫衙门、营伍、公所之中，如阅公文，审狱犯，勘田亩，修刑政，勤操演，严监察，无一日得暇。今乃因迎送而各事俱废矣。查例：凡邻省督、抚及本省上司过境，擅动驿马，分投探报降二级；远迎远送降一级；乘便营求革职提问。是宜申明禁绝，庶不致以迎送误公矣。至如寿礼陋规杂款，例有明禁，今乃公分公宴，炭敬冰敬，以及赞敬乾修，不一而足。当官之所入几何，乃甘借债应酬，致人疑其营求；而上司亦实有因其厚礼，委以美缺优差者。惟一律禁止，庶不致以馈赠而招

疑谤矣。又如大员过境，办公馆，送筵席，与夫种种供应，地方官无从开支，非苛派民间，势必赔累。然律载：藉供应科敛百姓者，州、县革职提问；安设公馆，呈送下程者同；督、抚上司勒索及不拒绝者，亦革职提问。定律何等森严！此禁止供给，州、县可免赔累矣。凡此皆澄叙官方之要，较诸课吏馆、停捐纳，收效非尤速乎？

夫中国之官场，其繁重也如此；泰西之官场，其简捷也如彼。以此见中外之所由分，而中国之文有不如泰西之质者矣，中国之华有不如泰西之实者矣。

游 历

今之谈富强者，动曰军火宜备也，铁路宜开也，制造与工艺宜兴，矿产与商务宜振也。庸讵知居今之时，处今之势，所以为致富之本，自强之基者，莫如上下一心。方今朝廷创办一事，聚讼盈庭，非无深达时务之臣，而每建一言，辄多格于群议，诚如总署所谓同心少，异议多者。洋务之兴垂六十载矣，求其知彼知己，不随不激，能为国家立一可大可久之策者有几人哉？夫民心不一，则国势日衰。而交涉之难调，由于意向之不定；意向之不定，由于主议之无人。欲求主议得人，非王公大臣游历外洋不可。

夫游历之法，昉于中国古时辘轳使者遍历四方，问俗采风，详察民间疾苦。此实游历之权舆。孔子一车两马，历聘诸侯，遂成素王之业。战国时仪、秦之辈，朝秦暮楚，掉三寸不烂之舌，声动侯、王。当其周游各国，而山川之险易，政事之纯疵，兵力之孰弱、孰强，人情之何爱、何忌，无不揣摩简练，熟烂胸中。因得以审其机而投其间，虽纵横排阖，圣哲羞称，而其颠倒是非，运天下于掌上者，非

假游历亦何由自成其才也。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关山，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预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考二百年前，俄亦积弱之国。自其先君彼得见欧洲各国互长争雄，恐内治不修，外患将日亟，乃效赵武灵微服过秦之术，遍游诸国，访问利弊，延揽人才。归国后变通法治，振作工商，不二十年虎视一方，吞并弱小诸国，土地日大，兵备日强，卓然为欧西首国。游历之效如此。

比年，我中国亦知其益，故有派员游历之举。但闻每员薪水月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之繁，应酬之巨，安得敷用？亦只深居简出，翻译几种书籍，以期尽职而已，未能日向各处探访，时与土人咨询也。且承命而往者，皆微员末秩，回国以后即使确有所见，亦安能大展其才。中国体制所关，经费有限，纵不能如西例尽人皆可出游，莫如选择王公大臣 贝子贝勒及其子弟，通古今，识大体，晓西文，不晓

西文即先令其学习年少而未当国者，派往各国考求利弊，探访情形。丰其资装，宽其岁月，与我国使臣相助为理。夫今日之少年，皆他年老成谋国之良佐也。一旦躬膺重任，建议兴事，皆有真知灼见，自决从违，不致畏葸无能，亦不致拘牵债事矣。

抑更有说者，自设海军以来，所备大、小兵轮不下数十余艘，平日除会操载送官员外一无事事。何如派往各国游历，藉以保华民，张国势，周知外洋海港之曲折，岛屿之萦回，沙线之浅深，潮汛之长落，地势之要害，咽喉防务之布置疏密。并定以游历限期，或半年而瓜代，或一年而瓜代。既回国后，由当道面询外洋情形，并观其日记，实有心得，即照军营立功例奏奖。果如此讲求研练，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

公 法

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中国为五洲冠冕，开辟最先。唐、虞、三代，相承为封建之天下；秦并六国，改为郡县，历汉、唐以迄今，莫之或易。其间可得而变易者，宗子之封藩，疆域之分合也。其虽变而莫之或易者，概不得专礼乐征伐之权也。然均有相维相系之势，而统属于天子则一也。统属于天子一，故内外之辨，夷夏之防，亦不能不一。其名曰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知此乃可与言公法。

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可相维系者何？合性法例法言之谓。夫语言文字、政教风俗固难强同，而是非好恶之公不甚相远，故有通使之法，有通商之法，有合盟合会之法。俗有殊尚，非法不联。不能相统属者何？专主性法言之谓。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尔雅·

释训》云：法，常也，可常守也。《释名》曰：“法，逼也，逼之使有所限也。”列邦雄长，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有常法以范围之，其何以大小相维，永敦辑睦？彼遵此例以待我，亦望我守此例以待彼也。且以天下之公好恶为衡，而事之曲直登诸日报，载之史鉴，以褒贬为荣辱，亦拥护公法之干城。故曰：公法者，万国一大和约也。

今泰西各国兵日强，技日巧，争雄海陆，将环地球九万里，莫不有火轮舟车。我中国海禁大开，讲信修睦，使命往来，历有年所。又开同文馆，习西学，译公法，博考而切究之，如此详且备矣。然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闻鸦片在孟加拉每箱征银六十磅，中国税银十磅，中国出口茶税每箱仅征银百元之七五，不足一成，至英人入口所征不下四、五成。即茶与鸦片较之，其公道为何如？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今英、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而公法家犹大书特书曰：“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俄、美四国与中国立约，嗣后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又加注而申明之曰，谓得共享公法之利益。嘻，甚矣欺也！

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修

改，以图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饷则例，本由各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擅断之。宜明告各国曰：某约不便吾民，某税不合吾例，约期满时，应即停止重议。其不专为通商者，则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两两比较：同者彼此通行，异者各行其是，无庸越俎代谋。其介在异同之间者，则参稽互考，折衷至当。勒为通商条例，会立盟约，世世恪守，有渝此盟，各国同声其罪。视其悔祸之迟速，援赔偿兵费例，罚醵以分劳各国。若必怙恶不悛，然后共灭其国，存其祀，疆理其地，择贤者以嗣统焉。庶公法可以盛行，而和局亦可持久矣。

虽然，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则藉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太强者，如古之罗马，近之拿破仑第一，虽有成有败，而当其盛时，力足以囊括宇宙，震慑群雄，横肆鲸吞，显违公法，谁敢执其咎？太弱者，如今之琉球、印度、越南、缅甸，千年旧国，一旦见灭于强邻，诸大国咸抱不平，谁肯以局外代援公法，致启兵端？不特是也，法为德蹶，俄人遽改黑海之盟，法无如之何也。土被俄残，柏林不改瓜分之约，各国无如之何也。然则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者也。且公法所论，本亦游移两可。其条例有云：倘立约之一国，明犯约内一款，其所行者与和约之义大相悖谬，则约虽未废已有可废之势。然废与不废，惟在受屈者主之。倘不欲失和，其约仍在两国，当照常遵守，至所犯之事，或置而不论，或谅而概免，或执义讨索赔偿，均无不可。由是观

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噫！

通 使

昔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诚以出使之选，与将相并重，折冲樽俎，赞美皇华，胥于是乎赖。一不得人，则辱君命，损国威，所关非细故也。今中国与外洋各国通商立约，和谊日敦，设无使臣联络声气，则彼此之情终虞隔阂，虽有和约何足恃，虽有公法何足凭哉？使臣者，国家之耳目也，所驻之国，必知该国之情形。凡陆兵之数，水师之数，库款之所入所出，交涉之何亲何疏，商工船械如何精细讲求。按泰西公例：凡通商各国，必有公使以总其纲，有领事以分其任，又虑威权之不振，简兵舶往来游历，以资镇抚，而备缓急，事或未协，彼此悉心公议，或请各国官绅裁断，以期必协而后已。其慎重也如此。

迩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佣工者，年多一年，不可胜计。中国之人经营出洋者，为天下之至众，故钦差领事等官，比天下各国更宜加隆。顾中国未设钦差以前，外邦政府尚知爱护华民，多方招致；既设钦差领事之后，外邦设法竟抽华民身税，极力驱除。或疑中国到彼争食，今其见逐，情理使然。夫争食者，岂止华民，何

以不逐他国，而独逐中国？是其薄华民者乃所以薄钦差，薄钦差乃所以薄中国。薄钦差者何？为其不知西国之例，而动多可嗤也。薄中国者何？为其不行富强之法，而徒夸其大也。中国外部及出使各官，必须全用深通西学、深明西例之士，则庶乎其得矣。洋人每肆欺凌，无由伸理，乃仿西例，于各国设公使，于华民寄居之埠设领事：遇事往来照会，按公法以审其是非，援和约以判其曲直，保吾民，御外侮，维和局，伸国权，使臣之所系不綦重欤！夫通使者，中古邦交之道也。春秋时，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民情之向背，俗尚之好恶，国势之盛衰，探听各国军务消息人员，某国现用何样新式轮船、铁舰、炮台、枪炮？炮台形势如何？兵官才能如何？或探访不全，必能得其大概，虽糜费亦有所不惜。所派侦探之员，概须武员知兵事者，或随同公使前去，或另派游历，总之无处不有。平日洞知各国强弱盛衰之故，如有战事，则措施自中机宜矣。用能事大字小，各协其宜。今泰西数十国，叩关互市，聚族来居，此诚中国非常之变局，于此而犹不亟讲外交之道，遴公使之才，乌乎可哉！华民之出洋者，就南洋之西班牙、荷兰、英、美各属考之，岁输税银自一、二元至百数十元不等。暹罗本我旧属，乃亦仿西法，岁征我民身税，否则拘作苦工。虽有公使、领事，其如鞭长莫及何。

曩者，法、越多事，彭刚直公^①檄委潜赴越南、金边、暹罗、新加坡等处，侦探敌情，返粤后上书当道，略谓：法兰西侵占越南，其国危亡，已同朝露。然越南亡而暹罗、缅甸未即亡也。现在緬王暴虐，昆弟失和，英萌废立之心，緬

不自安，转倚法援，为英所忌，恐愈速其亡。向闻暹、缅二国素称恭顺，附近各岛如英、法、和、西等国之属土，华民流寓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亟宜简派公使驻扎南洋，所有南洋各国，如越南、缅甸、暹罗、小吕宋，及英、法各国属土之华民悉归统辖。即选各埠殷商，或已举为甲必丹中外信服者为领事，联络声气，力求自强。仍仿西人在华训练民团，以资保护，令各埠商民捐资购置一、二兵船，公使乘之出巡各埠，庶信息灵通，邦交益固。声威既壮，藩属不敢有外向之心。以兵卫民，即以民养兵，一举两得，无逾于此。

或疑各埠华人多借洋人以自重，董事亦各树党援，不肯受约束于华官，持节南行，动多掣肘，可奈何？此则兵力之不逮，而权势所由不行也。非有水师兵舰出洋巡缉，不能折外人陵侮之心，非有老成练达精明强干之才，难以胜公使、领事之任。夫各国广招华工，美国独限制华工前往。外人之虐待，应如何设法保全？与国之苛条，应如何峻词拒驳，是非使臣之责欤？

使臣简在帝心，朝廷用人自有权衡，固非危言所敢论。至若每届使臣持节奏调人员，如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官，尤当格外慎选。使臣、参赞、领事，识其国言语文字、律例，遇事可以立谈，情意必然相孚。盖参赞为使臣之副，凡交涉大事，彼之请于我者，或从或违，我之求于彼者，或可或否，皆赖参赞与使臣商定而行。使参赞毫无才猷，则使臣可者亦可之，使臣否者亦否之，亦安用此参赞为？故必

熟悉情形，洞明利弊，始能匡使臣之不逮，而措置不至失宜。翻译随员，则又使臣之喉舌手足也。凡事之大者，由使臣亲裁，小者必令其代理，或办署中案件，或与洋人周旋。至辩论公事，惟翻译是赖，曲直所关，轻重皆须得体。苟喉舌手足运掉不灵，必于全身有碍矣。若夫领事一官，关系尤重。华民百万，良莠不齐，小而钱债纷争，大而命盗案件，使臣之不暇兼顾者，调停审断，皆于领事是资。领事贤，则商民既安，邦交亦日睦；不肖，则矜情任性，不但流寓华民失其庇护，而且外人轻藐，口舌滋多，彼此往来必多扞格，难免不因此失和。所谓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尤当格外慎选者此也。

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滥徇情面，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就所取中明分甲乙，以定参赞、随员、领事之等差，不足乃旁加辟举，有余则储候续调。倘出洋多次，办事勤劳，允符人望者，即可由翻译、随员荐升领事，参赞备历各国，荐升公使。如有始勤终惰，或沾染洋习，措置乖方者，上则由公使特参，下则许同僚公揭，咨明总署，覆核得实，奏请除名。夫予以可进之阶，则群才思奋；课以难宽之罚，则不肖怀刑。庶外可为四国之羽仪，内可塞终南之捷径矣。自使臣以下各官，无论出洋久暂，务将所办各事，以及地方风土人情、国政、商务、工艺、土产，随笔登记，回国进呈，择要刊刻，以示天下。庶知彼知己，决胜无形。此三代询事考言之成法

也。戊子岁曾遣京曹分往各邦游历，惜非王公大臣，又不晓该国语言文字，虽略知中外利弊，著述等身，不能坐言起行，亦与翻译西书者无异耳。不负所举者亦间有人，闻见所资，编为著述，言中外情形者采焉。惜良法美意，未几中止，良可慨也。

抑更有进焉者。泰西各国，无论国之大小，公使皆以等第分班次。头等可随时入见，君主请茶会面商要事，不致隔膜。二等先期约定，止能接见外部，君主茶会势分不及。今土耳其、希腊、日本各小国，皆遣头等公使，分驻各邦，而中土堂堂大国，行走班次乃反居其后，于体统有关碍，于交涉亦动多掣肘。拟请嗣后驻割英、俄两国使臣，均以头等派充，增费无多，而收效甚远，国体亦因之而尊矣。凡吾国出使官员，亦宜酌增公费，使之足用。昔总署所定出洋各员薪水，数本不多，今复经屡次核减，则各员必有以简陋贻讥外国者，惜小失大，甚无谓也。一切车马服饰，皆不可过事寒俭，以壮观瞻，而尊国体。所驻之国，其官吏有应接见者，固宜交相拜访，询悉情形，其不应接见者，断不可率意往来，俾知使臣之尊贵，国制之严明。如是，则华洋之人见而敬服，专对有才，贤于十万师远矣。至如胆识兼优，声望夙著，当谏则谏，当从则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回积议如转环，化巨祸为细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汉之苏子卿、傅介子，唐之颜真卿，宋之富弼，炳炳诸贤，至今不朽。英风亮节，今岂无人，有志之士所为奋然而兴也。

传 教

嗟乎！中西和局之动多翻复者，其必阶于内地传教乎！何则？昔年各国立约，载在盟书者，通商、传教两端而已。通商为各洲通例，实关富强大局，而于贸易之法，不能讲求尽善，则其利必为外人所夺。苟能发愤为雄，如日本重订税则，振兴商务，仿西法，只准各国在外埠通商，不准入内地夺我民之利，何虑人心不服？惟传教士必入内地，内地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往往因此滋事。及至患成，彼以我中国不谙西例，酌议稍迟，动以兵力相胁。如曲从其请，则民之受屈愈多，衔恨愈甚，而教堂之案迭起矣。

案泰西基督之教，流派分而为三：一曰天主教，传自犹太，盛行于罗马，意大利、奥斯马加、比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从之。一曰耶稣教，日耳曼国之所分也，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丹麦、荷兰、瑞典及挪威、瑞士等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希腊为西人文字之祖，亦衍基督教之说，别树一帜，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等国从之。其教或分或合，有盛

有衰，名目不同，源流则一，皆本于向传之新、旧约两书。《新约》载耶稣降生为上帝子，以福罪之说劝人为善。是时泰西纷乱如战国，立教者深具苦心。而千百年来党同伐异，仇敌相寻，人民苦锋镝，原野厌膏血，别分门户，遂酿干戈，以至变本加厉，实非教主始念所及。十字架之役，俄土之战，其尤著者也。迨后道术修明，已异于古，故今耶稣教之在欧、美两洲者，英、美两主实称教中监督，为一会之领袖，尊为国教，未可厚非。盖人生于世，不能逸居无教。如有僻在遐方，礼教未行，犷獠未变者，耶稣教士遍至其地而化导之，地球各国现已一律相安。

自传入中国内地，未尝习见习闻，动辄齟齬，英、美、法等国合举国之权力以庇之，然而庇之愈甚，而冀传教之广播愈难。何则？传教先贵乎化导，化导在身心，不在乎势力也。在教中诸人，诚信教旨，恪遵教规，安分守业者，本不乏人。特莠民借入教为护符，每有作奸犯科，为种种不法事，其病在教士以招致人多为一己声名起见，遂至泾渭莫分，品类淆混。每有教士听教民一面之词，不能灼知其奸伪，专为护持彼教计，因此偏袒，以至紊我王章。在教士存心本亦公正，若能洞烛其奸，自不容其所为，且为彼教十条诫所见斥，应按籍除名。所惜者，地方有司鲜如此例，惟虑开边衅，先存畏惧之心，并不知西国律法，折服无从，光绪元年《新报》谓：中国既无治西人之律，何不仿照英于印度各族类通商之律，参酌行之^①。往往迁就定讞。平民受屈，申理末由，众怒滋深，群思报复。又有藐视教民，断案不

能平允，因此教士出为诉说，酿成其祸。是故拆教堂，辱教士，民教斗殴之案，层见叠出。平心而论，彼教士及华官，苟有自知之明，应同此愧悔，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

曾闻耶稣教士，有教案伤人不愿惩办，为体上帝好生之心者，惜难多得其人。夫教士以身卫道，虽死亦所甘心，即无端受辱，如耶稣所云：“披左颊，转右颊向之可也。”苟能含忍包容，人心自服，又何必力为较量？然余亦未之见也。至每遇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案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定案稍缓，彼即横生枝节。有司既经革职，复请惋惜之国书；首犯既已伏辜，重索赔偿之恤款。朝廷怀柔交至，优待有加；百姓闻见各殊，寻仇无已。于是儿童、妇女未能辨其种类，闻声相恶；加以匪徒煽惑，变故迭乘，果谁贻伊戚欤？

虽然，教士来华各循其教书之旨，传教济人，出自公心，费用捐自民间，非支国帑。如传教别存邪僻私见，各国先不能容，又何能流行一千八百余年而愈盛？明季利马窦东来，徐光启舍宅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实为华人入教之鼻祖，而明史称其清介，亦未因入教而受贬也。所惜者，传教于华人出于勉强者多，每与时人多所辨驳，与孔教较量多所毁斥，以自见其高大，以至忿争启衅，是亦不可以已乎。夫信从者，在乎心不在乎迹，苟有不信不从，置之可也。耶稣之书不云乎，苟有不接受尔者去之，日拂去足尘可也。保罗传教至一处，以人不之信，谓其时未至，转往他所。进华之教士如是以行，又何齟齬之有？今在亚洲

教民既多，权势亦大。其设义塾，施医药，育婴孩，著论说，无分畛域，一视同仁。救人之心不可谓不切。独是以救人之婆心，因容纳中国之莠民入教，遂启争端，动成大案，此诚天下有心人所共惋惜者也。

今欲民教相安，必须广求良法。与其补苴在后，不如筹度在先。先令华民入教者，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无过犯奸恶之人，方准收入。而又编清册以备查究，揭实情以释疑惑，明大义以肃观听，别各教以免蔓延。嗣后我国有司，凡遇教案秉公查办，勿延宕，勿推诿，勿畏葸，勿袒护。不必问其为民为教，必先辨其孰曲孰直，一以公平之心处之，斯远人无所藉口。其维持调护，实出苦心。再或会同驻京公使，剴切妥议，须保传教出入内地，各友必确守教规始准。为神甫有干预公事，挟权诈者，立请之公使，飭遣回国，以免贻害。如华官断案不公，亦即由各公使商请总署严查参革，藉昭平允，亦正本清源之一法也。有案则依西例，延律师到堂，约期互辩。大率以无故干犯教堂，有司官按例惩办，责成赔修。若与百姓为仇者，但照案情轻重处理，不得托。

交涉上

中外通商日久，交涉之案层见迭出，卒未有办理公平，能折彼族之心而伸吾民之气者，何也？以不得办理之法，未用度外之才也。

夫洋务交涉之事甚繁，约其大纲：君民两大端而已。如杀伤、斗殴、焚毁、抢劫、占产、拐贩、债务、辛工以及碰船、碰车诸案，皆事之小者，关华民生计者也；侵越疆界，偷漏税款，违例便己，辟埠通商，以及传教建堂，游历杀伤诸案，皆事之大者，关君国安危者也。西人舟车所至，每以语言互异，律法不同，利己损人，任情蔑理。入国不问禁例，入乡不知土俗，在租界外创办之事，亦不禀准当道而后行。惯以恫吓之词，势迫力成，否则勒赔巨款。是以猜嫌易启，动至激成巨案。我中国顾全大局，忌开边衅，官长多从迁就，士民谁敢抗衡？如吴淞铁路电线，四川彝陵轮船等案，虽然无理，尚赔巨款。洋船撞毁华船，反咎以不谙趋避，或诬其桅灯不明，改重就轻，含糊了结。马车碾伤华人，反谓不知让道，祸由自取，扭赴公堂亦仅薄罚。又如华人受雇洋行及充洋船水手，往往

借端扣减工资，甚或殴辱毙命。西人之狡黠者，更串通地棍拐贩乡愚，冤惨尤无天日。他若华商负欠洋商，一经控告，追封产业，扰及亲朋。西人负欠华债，虽饶私蓄，循例报穷，便自逍遥事外。外国税华货进口，务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务取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税，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北突南奔，绝无所费。我招商局“和众”轮船曩年开抵美国金山，关官执意重征船钞，冀不复来。美之商船至华，所征税额较诸英、法商船，无畸轻畸重，亦系一律征收。美国何得歧视？凡寓居新、旧金山之华工、华商，有回国后不准重到之例。查从前美国甚恶黑人，时时群议驱逐。自南北花旗之战，美廷立例：准黑人入籍，与操保举总统议绅地方官之权，遂无议驱逐者。然则华人之不容于美者，乃以不入美籍之故欤。英国、丹国均与美有准客民入籍之约。我国如与各国重订和约之时，亦宜仿行，以顾国体保护商民。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夫轮船飞驰于港汊，马车冲突于通衢，无事而带持军器，用人而刻扣工资，空盘倒帐，袒庇教民，包揽关捐，掠贩人口，凡此种种妄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所不容，只以中、西刑法不同，彼族反能趋避。遇有杀伤交涉事件，华官以华法治华人，抵命之外，更断偿银；西官以西法治西人，罚鍰之数且从轻减。如华官稍持公论，执公法条约以争，西官即回护故纵，并薄罚而不加。上海及各处租界之地，华人不能买。如要买，须出外国人之名。华人所住房屋，工部局估值租银，每百两岁捐十两，洋人所住房屋，每百两岁捐银八两。且准其在内地买地造屋，契虽写“永远出租”字样，仍与卖无异。所以有福州乌石山、九江庐山盗卖官地之案。日本国例不然，非土人或入籍者，不

准买其本国之地。中国宜仿行之。此尤事之大不平者也。

近有俄都书院生马尔丹著论云：“中英出入口货约值四千五百万磅。英国获利可知。然驻华英商犹时时播弄是非，屡请英廷力胁中国。幸执政者洞悉情形，顾全大局，凡遇不平之事，概行批驳，并禁止领事、武官非奉本国或公使之谕，不得擅调兵船。”云云。前英人额尔金奉使驻华，亦尝函致其妻云：“抵华后，日见英民在华地恣意横行，实出情理之外，皆因华民过于循顺，不敢抗拒，又过于愚蒙，不知控诉，以致时遭凌辱。”云云。不知华民纵极循顺，岂难抗拒西人，实因彼动挟全力以争，故我每曲法相就。华民之忍辱由于畏官长；官长之曲法，由于畏朝廷也。若公使能持平识大体，不肯偏袒己民，则我民伸诉有门，又谁肯横受其辱乎？曾文正言：“方今中国好言势者，专事羈縻，幸免开衅。然习于畏葸，难期振作。好言理者，又激于忠义，鲁莽从事。然操纵无术，决裂堪虞。皆非万全之策也。”旨哉斯言！诚老成谋国之笃论也。故洋务交涉非不可办，特患向之办交涉者，非畏葸即鲁莽。畏洋人而希图省事，即为多事之阶；愤洋人而务求取胜，反为取败之渐。间有熟读条约、稍谙公法者，又辄欲舞文弄墨，仗笔舌之小巧，以折其猛鸷凭凌之气，抑又可怜可笑，多见其徒劳而鲜功矣。且也鄙夷洋人，谓为“非我族类”，几欲不与之同日月，而于其制器精巧，作事实践，亦一概抹煞。是为愤时。愤时者不可以办交涉。重视洋人，炫其所长，平日誉之不容口，临事不加揣度，更欲借终南为捷径。是为趋时。趋时者不可以办交涉。

然则洋务交涉之事，竟无善法以处之耶？曰：何为其然也。是宜先储善办交涉之才，次定专办交涉之法。取才之法必察其人品诣端正，大节无亏，入教籍及沾染嗜好者万不可取。熟史书，谙政体，洞悉中外律例，而又经出洋周知彼国文字、政教、风俗，著论确有见地，存心公正，无抑中扬西之习，并无我中彼西之见者，则根柢既真，措施自当。南、北洋特辟一洋务馆以收储之。然后集群策群力，兼延西国著名状师，遍考中、西律例及条约公法诸书，据理持平，定为《中西交涉则例》一书。盖中西律例迥然不同：中国有斩罪，有杖罪，西国无此例；西国有纆首罪，罚作苦工罪，中国亦无此例。西例听讼有公堂费，不论原告、被告，案定后责由曲者出费，直者不需分文，中国亦无此例也。中国办理命案，误伤从轻，故杀从重；乃西人于故杀，亦有从轻者。如往岁英牢头哈金击伤中国细蕙，状师照轻打人例，罚鍰释放。夫击人至死尚谓轻罪，试问：以何者为重？而讼师受贿即为开脱，揆诸情理，岂得为平。此皆办理者不知西律，未能与争耳。是以西律诸书亟宜考订，择其通行者照会各国，商同外部，彼此盖印颁行，勒为通商交涉则例。凡有交涉案件，须委深通西律之员审办：合于律例者，立即办结，不必羈延，上下推诿，致滋口实，转启罚赔开埠之端；其不合乎律例者，彼公使、领事纵百计恃强要挟，官可罢，头可断，铁案终不可移。彼虽狡悍，其奈我何？且以西例治西人，则彼无可规避；以西例治华人，则我亦免偏枯。每届年终，将交涉各案如何起衅，如何定讞，

删繁就简，勒为全编，分送各国使臣及彼外部公览，兼发各省刑司，互相考证，庶枉直是非无能遁饰，洋人无故纵，中国亦少冤民矣！虽然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近各省偶有要案，疆吏据理而争，彼辄嗾其公使与总署为难，甚或百端恫吓。故必当轴者洞知外事，上下一心，操纵刚柔，曲中窍要，始克收政道刑齐之实效耳。

溯日本初与泰西通商，西人以其刑罚严酷，凡有词讼仍由驻日西官质讯科断。强邻压主，与中国同受其欺。乃近年日人深悟其非，痛革积习，更定刑章，仿行西例，遂改由日官审判，彼此均无枉纵，而邦交亦由此日亲。噫！今日亚细亚洲以中国为最大，堂堂大国顾犹不如日本焉！可耻孰甚！苟能毅然改图，一切与之更始，于治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大政破除成见，舍旧谋新：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执公法以制西人之狡，定则例以持讼狱之平，力矫不慎不公之弊，以服其心。有时争所必争，执以西国之法，不敢稍宽；让所应让，给以格外之恩，不必过泥。临时勿使我受其愚，事后勿使彼蓄其怨。庶大权不致旁落，而强邻弗敢覬觐。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我以为怀柔，彼以为尊奉也；我以为优容，彼以为畏缩也。交涉之事日益多，办交涉之法日益绌，能办交涉之人日益少，忍辱含垢，民气日靡，丛雀渊鱼，民心渐去，其流祸将有不忍言者。是所望于识时务之俊杰也。

交涉下

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之缺，实为洋务之枢纽，未可泛视，宜委道员与总领事品级相当又素有声望谙悉中西律例者，方可胜任。

查租界四至，因当年未划沟立界为限，致为外人侵占不少。如上海之新闻、老闸、虹口等处地方，曾闻本地人云：“昔年租界无如此之远，至前年始定界限，已被侵占不少矣。”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国例，一经勘定，即划沟为限，方可杜侵占滋事之虞。然与泰西通商数十年来，华人遇事隐忍，而洋人则遇事欺陵。非但上篇所论上海华人房租较洋人多二成，中国内地洋人可租九百九十九年，而租界之地华人反不能买等事而已。

尤有不平之事数端，今列于后：上海杨树浦、新闻及泥城外等处不入租界之地，亦归英工部局照其向章办理。地方官竟置之不辩，且遇有是处讼事反听领事判断。不平者一。洋人马车行只纳一总捐，而华人马车必须逐一纳捐领牌。如与洋人马车同行，不准赶在洋人马车之先，违则拘罚。不平者二。西人打猎，例有时候，违例者罚之。去冬有乡人不知西例，猎有山鸡、水鸭携至上海出售，被巡捕拘获，押至公堂，罚银四十元。有被累至倾家荡产者。不

平者三。西例猎地有税，猎狗、猎枪皆有税，中国一无所税，随处可猎。故寓华之西人往往好猎，虽华人禁猎之地，彼亦往猎，无所顾忌。纵然肇事，地方官只谓其不知俗例了事，无所谓罚也。不平者四。又冬间西人游戏于郊外，有一艺西名曰啤把亨，华名曰跑纸。其散纸于田中，随者百十成群，骑马追之，田中所种棉花皆为践踏。地方官畏事不理，乡人苦之，无从控诉，徒有赔补之名，无赔补之实。不平者五。西例巡捕出票拿人须随时稟请领事签字。如例不应拿而巡捕与原告请之甚坚，领事须令巡捕当堂发誓必无弊窦乃允签名出票。今会审公堂不能援照西例，所出空白拘人票百数十张交华捕与包探，任其随时填注拿人。故闻有藉此拘人私刑拷打之弊，勒索不遂，然后押至捕房，转解公堂。往往小民无辜受累、含冤怀怨而不敢言。不平者六。查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举有七人，皆西籍也，我国之人无一得预其列。所以华人吃亏被累，无一为之分辨者。按租界房租岁入之数华人十居其八，况华人房产多于西人，竟不使华商与闻其事，殊所未解！反不如香港、南洋各埠尚选华商为董事，或为议员，若伍秩庸、黄平甫、何沃生前后得举。虽盈廷之议，华人或唯诺成风，未能力为伸辩，而究之有胜于无。噫！此殆由西人藐视华人，因华人愚昧无知者多，各自为计，不知顾全大体，故易为西人所欺也。然西报尝论：“中国士大夫虚骄气重，不可以言理，只可以言势。历观交涉之事，地方官初时持之甚严，互相推诿，继以势挟持，即任我所求。”云云。可知^①我国情形已为彼窥

透，即与中国两次立约，皆得之于兵戎，而非得之于玉帛。年来交涉之案，动以兵船恫吓，要求非分，职此故耳。今因日本一役更为彼族所轻视。当轴者必能洞明时局，知屈伸进退之机，有负重致远之量。凡事筹之于先，使人由之而不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国家阴受其福。一己之祸在所勿计，况千秋自有公论也。

从来各国交涉之案，莫不视国势之强弱为损益。我国亟宜变法，破格用人，幸勿拘文牵义，顾虑繁多，驯至一筹莫展也。英国数十年来政治最得民心，且各国外部公使及各处商务局有心世道之正人君子不少，何不闻与译署大臣会议，妥订一中西交涉合用之律例，不偏不倚，遇事持平办理，庶毋尔虞我诈。而胥吏、差役、巡捕、包探皆无从舞弊，自能交欢于无间，弭衅于未萌矣！所有中、外教士，东、西商贾，均得安居乐业矣！若动以势力服人，非理陵铄，势必至逼迫愈甚，而华民之私愤愈深，恐他日群起而攻，酿成巨祸。斯时玉石不分，贤愚莫辨，祸起仓卒，地方官亦救御无及。语云：“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中、西士夫不乏忧深虑远之君子，曷弗详思而善处之也耶？

条 约

各国初订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鞠之权，则应委派实授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请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

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畏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兢兢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恃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抵制之税，防他国之税损吾民之利。如他国重征我国土产入口之税，则土产无所销，而产于天者失其利，成于人者失其业，则我国亦必以重税报之，使不致独擅利权。

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为之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

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腴我而肥彼也。今各国薄待我中国者，如人则抽税、货则重征之类，可援例争之。或谓：“强国之于入口税，议加、议禁，他国不敢置喙。”而不知非也。日弱于法，何以加法货入口之税；墨弱于美，何以加美货入口之税；欧洲小国多禁鸦片入口者，非强于英也。盖税则者，国之内政，议加、议禁固可以自主焉。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歉歎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本国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劬瘁、励精图治，亦末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

后，而苟安于目前。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为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馀万两。而美之麦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极重。中国入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鸦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

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

大臣通飭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罣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①

^① 自“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至”利权不可为矣”，系《条约》篇的附言。

人 籍

地球九万里，日月所照，畛域无分，凡有道之君莫不体上天公溥无私之意以为心，乐得人民而抚有之。所谓王者有分土，无分民也。我朝怀柔远人，无论入籍与否，均有宾至如归之乐。

查各国皆准华人入籍，有准其随时入籍者，有要常居其属地若干年方可入籍者，有须生长其地乃准入籍者。美国定例亦有准各国人入籍之条，自埃利士人入籍日多，遂订新例不准华人入籍。

英国民籍最重，外国、本国各有分别。父母为英国之人，其子生于他国者仍可隶入本籍，即其母为他国之人，而父为英国之人，仍可隶入英籍。惟英人之赴他邦大有分别。倘为军流犯罪出外，则所生之子不能仍作英人。其余出外为商、为官，皆在收回之例。然外产虽可收回，只作平人看视，不能在本国作官及为议员，且更不能承本国人所有基业，亦不能以基业授本国之人，但可自创成家，将基业传其亲子。其欲与英人一律沾恩者，当于回国时为国家办

公三年，或当兵，或作工，三年期满方准真为英人，与本国所生者无异。

上古风气未开，各国闭关自守。罗马国例：每见外来之人视若眼中之刺，以为外邦之人非窥伺国家，即来牟利，于是多方嫉妒，必下逐客之令而后快。元泰定二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二十五年英人犹仇视外人，不令留踪境内，迨至元元年即西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始垂禁令，不准将外人嫉害，且有延请外人在本国教习工艺者，如外国优待本国之人，而本国人亦推情相待。虽然英国近时政令较前宽大，惟于外生之人，虽父母隶籍于英，而其子归来终与生长英邦者有间。此例相沿已久，未能易辙改弦。

独荷兰国则广被怀柔，一洗各邦陋习：凡本为他国之人来入本籍，或本籍之人生子在外，其子重回本国，可以承产，可以作官，并无歧视之意。

今四处通商，无远弗届，各国怀柔之道迥非昔比，独我华人流寓外国，为人所欺。其故初因不愿入籍，我水师又不足以卫商；继苦于不能入籍，而通商条约又未论及入籍之人。

或谓：“中国刑律太严，必无外人入中国籍，况其所获利益更胜于中国之人，亟宜设法维持，庶免为丛驱爵。现在已准外人在苏、杭内地纺织，继必借端要求准其买地开矿、设厂、耕植，由渐而进，握我利权，非但于地丁钱粮有损，犹恐民生计绌，势致主客不和，变故愈多。否则借此挹注，固结民心，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关系尤非浅鲜。”

鄙见：外国人须入中国籍者，方准其在内地买地建屋，庶免滋事。如不入籍，除租界外概不准在内地置产。闻日本例如此或有借游内地为名，或藉传教为说，买地置产，购货屯货，建造一切者，所置之业既在内地，即与入我籍之民相同，准其落户，惟必须归我地方官管辖，不得再远藉领事为词。如不愿入籍受辖治者，则可任其自去，不得购置产业。传教者自教堂住屋外，亦不得借名教堂广置产业牟利，兼并民地，致损碍于中国地方丁赋。此系我国家本有自主之权，当详载和约，布告天下，庶彼族无从置喙，而各国有道之君亦咸当体上天覆载无私之心，一视同仁，准人入籍也可。

书 吏

天下人之所断断而争者，名利而已矣。名重于利者，奉公而守法；利重于名者，舞弊而营私。今各署书吏既无名之可言，则不得不专趋于利，徒欲以法惧之，盖亦难矣。故朱子襄曰：欲作廉吏，勿靠书吏。必先熟律，方不为其蒙蔽。胡文忠办理鄂省军务所设厘局，悉屏书吏而任官绅，寄以腹心臂指，用赖以足，兵赖以强。伊昔名贤未有不畏书吏，而慎防书吏者。今日书吏之权已属积重难返，内而六部衙门，外而督、抚、司、道，下而府、厅、州、县，以及盐务、税关皆有缺主。每缺或万余金，或数千金不等，营私卖缺，与本官无须见面，署中惟觅一办事者潜通声气，朋比为奸。同一律也，有律中之例；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案。其间影射百端，瞬息千变。犹是一事，有贿者从，无贿者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惟所欲为，莫之能制。即使上司觉察，按法严惩，亦只能革署中办事之奸胥，不能斥外间把持之缺主。而官之接任视事，多则四、五年，少则一、二年，其于治内之利弊，俗尚之美恶，或未及周知，即已

更调而去。若书吏则世代相传，专门学习，兵、农、刑、礼各有专司。官有升迁，吏无更换，况既授以事权，又复限以资格，虽有才艺，荐达无由，而月得工食纸张之费，为数甚微，若洁己奉公亦实无以自给。

考泰西有大、小律师，无书吏之弊。律师者曾在大书院读律例，取列一等，国家给以凭照，准其为民诉冤代官诘问。凡正、副臬司，必由律师出身。审案时两造皆延律师驳诘。公选廉正绅士陪听，首曰公民，余曰议长。如案中人与绅士有一不合，尽可指名更调。律师互相论驳，以词穷者负。官得其情遂告公民，曰：“此案本官已审得应犯某律，尔等秉公定之。”公民退议，各书其罪申覆，所见皆同即为判断；否则再审，以尽其辞。凡陪审、人证，皆先誓不左袒而后入，两造俱服则有司申送上院定讞。所有案词，岁刊成书，引以为例，嗣后皆可据以为断。

今为中国筹变通之法，请将律例专设一科，每年一考，列前茅者仍须察其品行，然后准充书吏，锡以虚衔，厚其薪资。倘有颡顽不堪任事者，立予斥革；若其办事勤能持躬廉谨，则期满之日，本官加结保举，然后录用；若服官后有贪赃不法者，保举者坐罪。各予以出身之路，庶咸知自爱，不敢弄弊舞文。书吏之权既轻，本官之职乃举，似亦正本清源之道也。今书吏五年期满，例有考试，列一等者用府经、县丞，二等者用从九、未入，以文通字佳者为优，鲜不倩枪顶替入场，所取既非真才，服官更难期清正矣。

恭读仁宗睿皇帝谕曰：“君临天下，敕政治民，仔肩至重，奚能独任？我朝特设内阁总理枢机，六卿分职，各司其属，即古之四岳九官，辅弼匡襄之职也。朕德薄才疏，寅承大统，惟求天下乂安，兆民蒙福，孜孜图治，不敢暇逸。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是甘于旅进旅退，忘职思其居之义。诸臣自为计则可矣，何以报皇考数十年之恩遇乎？自大学士、尚书、侍郎及百司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令是从。今吏部京兆相争一事，任书吏之颠例是非，变幻例案，各堂官受其愚弄，冥然罔觉。所争之情节与所为之弊窦毫无干涉，良可慨叹！一部如此，推而至于五部，若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肆，国事尚可问乎？经朕训谕之后，尚不知悔改，是激朕之怒，必欲朕受薄待大臣之名。朕宁受此名，曷敢废法？必挽回乃止。其无悔。钦此！”仰见我仁宗立法剔弊，谆谆告诫之至意，宜如何敬谨遵守。

乃今日各部书吏，其舞弊较外间尤甚，其弄权较外间尤专。如欲设法挽回，除考试选充外，并宜夺其权。夺之奈何？曰：此其道在乎使司员熟悉律例。盖司员不熟公事，书吏遂得上下其手，因缘为奸。诚使严定章程，凡司员到部候补时皆令轮班入值，熟读例案。一俟有缺，由堂官面考，择其律例精通、档案熟习、有为有守者尽先即补。然

后一司之员必熟一司之例。遇书吏呈办案件，严加覆核，合则呈诸堂官，不合则是书吏故意播弄，即行斥革，不准再充，则鬼蜮伎俩必无所施矣。下自州、县，上至督、抚，旁及海关、房科、胥差皆以重资承充，与本地劣绅、痞棍串通作弊，恐吓乡愚，勒索无辜，被累者竟致无门可诉。其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吾粤劫风甚炽，多有不敢报案者。因报案亦不能破，徒为胥差勒索禀费验费故也。况司员既熟律例，一旦外迁亦能洞悉情形，不至为书吏、蒙蔽。至于外官督、抚、司、道、府、厅、州、县衙门，既予以甄别之条，官又熟于律例，如此内外合力办理，自可杜无穷之弊也。愿与当世贤豪借箸筹之，取怨于若辈弗遑恤矣。

阉宦

今中国有一极弊之政，为合地球所共无者。其法虽传之往古，然其所以用法之意，则非若后世之所为。师其法而不原其立法之始，意积久而愈失，弊变本而加厉。于是百患丛生，寸效无闻，为宇内所同笑，则中国之阉宦是也。

阉宦肇于古，五刑中淫刑用宫。其人既绝生育，屏室家，将无以为养，故收而纳诸宫廷，备扫除之役。然则入宫之举，实为恤刑余而开其生路，非概取不犯淫刑之人，而残其人道，以供我给事也。故春秋之世，竖刁、开方寺人披辈偶见记载。可知阉人犹不伙，而败国乱法作奸致祸已往往闻矣。暴秦灭六国而一统，用赵高为中车令，遂杀扶苏，弑望夷，而墟秦社。汉则家法坏自高祖：病不见大臣，独枕一宦者卧。厥后子孙效法，至呼宦者为阿父。桓、灵之际，遂有十常侍之乱。操贼奸凶亦起于阉腾余孽，尤可叹惜而痛恨者也。六朝重女乐、声伎，宦官不甚假权，故寂然无闻。唐自元宗信任高力士，遂启祸窠，至子孙不免于阉人之手。有宋家法稍严，初亦静谧。至徽宗宠高俅、王

童贯，而北宋亡矣。明太祖深恫前辙，不许宦者衣綢帛，不许宦者干朝政。宫中至立铁碑以垂训。乃子孙不能绳祖武，始刘瑾，继王振，数传而至魏忠贤，屠剑天下忠臣义士，若割犬豕，致罹天厌，猝覆其邦。虽思宗之英武，不能挽朱明之末运。此后世所为流涕三叹。而推原祸水，实由数阉人剥其元气耳。

国朝惩明鉴重，以圣祖仁皇帝之英明神武，遂尽削中官之权：不得干预外事，章服不得逾四品。立法超迈前古矣。而近时法戒稍宽：除例准贫民多子之家自幼净身报名内务府外，往往有中途自阉，投入官名下，希图富贵。剥天地之元气，绝祖宗之系统，诚非细故。夫刑余之人，实为不祥。仅供廷苑扫除，已乖太和之气，况趋走御前，伺近禁蹕！此五大洲各国所无也。即日本近在东邻，同文二千余祀，其国政教往往效法中华，而独于阉宦一事，则绝不趋步。其宫廷禁门以内，皆用女官承职，例取世家子年十六以上，入宫承值，有月禄之给。年二十以上则出而嫁之。禁门以外则用侍卫、羽林，类皆良家子承充，职同下士。故历久无宦寺之祸，此其立法之善，未容以外邦而轻视之也。他如安南、暹罗、缅甸，亚洲各小国，虽皆有宦官，然其人不多，其名不著，权不属，而祸不彰。至若高丽之宦者，亦犹日本之宫女，而数复寥寥。

窃以为上天之大德曰好生，人情之所重曰后嗣。今既全革肉刑，奈何无罪之人，反听其绝人道，灭天纪，受蚕室之苦，为刀锯之余！是犹草木未甲而坼之，昆虫方蟄而

杀之，毋乃为盛世之累耶？纵彼自愿净身，非官司程迫，然应此役者多畿辅之民，类于十一、二岁之时，愚顽父母贪他日之富贵，不惜一子，忍情为之。童子何知，而谓其心所甘欤？若夫中年自行净身者，虽似出于中忱之所愿，然此辈多非良善。或以淫毒残形，或以盗贼漏网，或犯命案而希图免死，或有仇衅而隐思报复，故忍痛奏刀。其心之险毒凶狠已不可问，而可任其入厕掖廷，引为心膂耶？

是故古今异势，治乱异法，古虽有之，今亦宜绝。况古为未绝肉刑而设，今肉刑悉绝，而独留此惨酷之端，取四海五洲之笑，亦何必墨守而不变更哉？倘能举数千年痼疾弊政一旦廓清，如幽都之忽睹日月，如旱苗之忽逢时雨，天下苍生咸俯首而上圣神之颂，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亦弥征其绵延无疆矣！

廉 俸

管子有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天下之人未有饥寒切体内顾增忧，而能致其身为国家用者。

西国定制，人非本籍不能为官。选举之权操于议院。一县之中，有知县，有律司，有管库，有考帐，有查街，有捕头，执事人役除优给俸钱外，复有公费以给应酬，事无陋规，物无官价。即巡捕、下役每月工资亦数十金，余可概见。倘有玩忽章程，贻误政事，徇情受贿，越理取财，一经讦发，从严查办。其人多羞忿伏罪自裁，否亦为国人所不齿。故贪污坐赃之风，不禁自绝。惟其有司养廉之款则较中国为倍优，国家课吏之条亦较中国为倍肃，是以俸薪外一介不取，而簠簋不饬之患寂尔无闻。

我朝建官设禄，正俸之外，加以恩俸，常支而外，复给养廉，体恤臣工，无微不至。无如俗尚奢靡，物价腾踊，京外各官之廉俸入不敷出，数本无多，而又以丁耗划为军

^① 《管子》卷一《牧民第一》原文是：“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漕，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无几。其能洁己奉公，见利思义者贤人也。否则上焉者或借夤缘馈赠节礼堂规，克减军饷，侵蚀钱粮为津贴；下焉者或藉窝家坐赃娼赌私规，诈索乡民，欺蒙长官为得计。探其原，实由支用不给，极其弊遂至流毒无穷。恐非古圣王重禄劝士，庶人在官者禄足代耕之本意矣。

今欲整饬吏治，軫念民艰，当自京外各官加廉俸始。《新政论议》云“宜下令国中，自今以往，在内为相臣者年俸三万两，所属递趋递降，以是为差。在外为总督者年俸二万两，提督、将军年俸各一万五千两，所属递趋递降，各以是为差。至兵丁、水手月俸八两至十两，月终颁俸，分毫不得扣减。衙门公役以及各官住所费用由公项给发。历官十年而归田者，恩俸视其所食禄给若干成数，以其仕二十年、三十年者递加之。终于王事者，功大则以其恩俸之数酌给其孙终身，功小则给其子之成人而止。文员、武员有受民间一钱、一物，或擅支国库一毫、一厘者，立行革职，永不再用，恩俸尽削。如此而贿赂之风未有不絶者也。或嫌此议不无过重。我纵不与，彼亦必取，与其私取而败公，曷若公与而杜私？重禄所以劝士，古之大、小臣工身名俱泰，无他，此法行耳。”所有文、武廉俸必照旧额倍给，并分别酌给办公之费，使无支绌之虞。若复有罔上营私，受贿枉法者，按法重绳之。一切陋规悉为裁撤，或相沿已久、碍难骤革者，全数充公。如此，则民困纾而官方肃矣。或疑国用未足，一旦遽增巨款，费无所筹。则莫如裁汰冗官，将其额禄并归必不可少之员，则廉俸裕而操守自端，积习除而国帑自足。尸位既少，循吏必多；循吏既多，民生必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何虑

官谤之或速，经费之不敷哉？若更能通堂廉之分际，祛隔膜之偷风，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唐虞三代之风不难复见于今日矣！

限 仕

《礼》：“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示优礼老臣也。古之人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强仕，六十而老，七十而悬车，三代以还之通例也。四十曰壮，学问既成，阅历既深，故可以出而任事。七十曰耄，精力就衰，艰巨难胜，恐有时因而误事，故奉身以退，避贤路、戒素餐也。汉世二疏，止足告归，形诸歌咏，传为美谈，此足为士夫法式者也。后世此风稍不逮古，洎至恋栈者多，悬车者少。伏查乾隆二十二年定部员五十五岁宜详加甄别。三十三年又改定六十五岁，但实力行之，毋少瞻徇。夫甄别者，即恐其衰耄不能任事而罢之，故有予告之条，有原品休致之例，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也。高庙之治隆媿唐、虞道固若是欤！中兴以来，保举之途杂而渐滥，捐例既开，仕进之门路愈多而且歧，比至今日，有积薪之势焉。虽内、外臣工屡有疏通之奏，而究无疏通之良法，未力行疏通之实政，则疏通之实效亦终不可睹也。

然则良法维何？仍不外乎斟酌限年之典，恪遵祖宗详

甄别、戒瞻徇之圣训，而以实力奉行之斯可已。四十始仕，三代下殆未可拘。顾亭林尝有“二十应试，三十服官”之议。是说也，酌中无弊，颇可参行。今之仕进本不仅应试一途，窃以为应试之年可以二十为准，则服官之岁要当以三十为定衡。其保举、捐纳两途亦当酌定於三十、四十之中，以三十五为服官之准。其列保之岁与夫捐纳之年，亦必以二十为限。保捐之后加以十余年阅历，而后任之以事，庶可有功。至致仕之年，当钦遵高宗定法以六十五岁为度。其不及限者，当于任满之日甄别去留。国朝定制；甄别岁行，比及三年，则又有内而京察，外而大计。所在慎名器、戒窃位者既已至详至严，特患奉行故事未能认真办理耳。今请详致仕之条，除世爵、宗亲不计外，其有成大勋、据高位者，年至七十则当奏请致仕，朝廷赐金赏荫，准为预告老臣。或给全俸家居，岁时奉朝，请备顾问。若有军国大事，亦可酌量垂问，准其与闻参议，余事概不必劳其身，所以示国家养老尊贤之意也。下此则六部、卿、寺及内阁部属等官，及岁限则罢之。外而疆臣、司、道及府、厅、州、县各亲民之官，责任烦剧，尤不宜以衰暮之年为乾没之计。夜行不休，古人深戒，亦当定从严限。督、抚以年七十为度，赐金趣休。司、道以下亲民之吏，则当以六十五为限。及限不告退者，则请罢之，准其原品家居，或退为乡三老之类，稍给津贴以示体恤。其文理优长者或聘长书院，或提调书局，投闲置散，斯无不宜。夫士人少而家修，壮而廷献，既无致君泽民之伟抱宏才，则非朝廷必不可少之臣

工，即非地方必不可去之官吏。抚心自问：窃位苟禄，徒为子孙之计；印官衙署，非养老院堂也。乃如之人固安之乎？然而竟有巍然安之，而举世莫相非，亲友不相劝者，则由于仕途之滥，庸吏之多，恒产之乏也。

夫古昔之官或起自田间，或升自学校，或举自货殖。其人皆有故乡游钓之所，生产之计，罢官而归；林泉养望，不失为耆民硕望也。今也不然。幸进多门，以仕代贾，出本无山，归则壁立，积弊至以官为家，群相尤效，而仕途始不堪问矣！矧国朝用人，首重资格，绝少破格超迁之举，故宦成显达，强半在老大之时。彼以积劳有年，甫得循资登进，宁有不自视其位甚重者！重之，则欲退之心减，欲进之心盛矣。又其人初居下位，奔走艰辛，迟之又久，一旦得膺高爵，亲故阿谀，百僚趋奉，苞苴日进于门，声色竞起于后，宁有不自顾甚乐而辗转贪恋其权势者！贪之，斯患得之念重，而患失之念愈重矣。此所以二疏之高风，竟成千古绝调也。虽然，其人之自为计，则诚工矣、得矣。

若夫国家之仰望臣邻百职，固欲与此贤士大夫共治域中者也，今乃以敕绶之荣为斯人娱老之具。任官惟贤之谓何！则莫如定年限，严甄别。官人既自昧廉耻，国家要不得不全其廉耻，及年而罢，满任而归，示与屏黜不同。非予之以难堪，斯受之者无愧色。虽门堪罗雀，迟暮可伤，要亦无足惜耳。

若夫武员，无论水师、陆军，其将领年过五十者概须退职归田。军士年届五十者亦罢遣不用。此泰西之通例，实

军政之要图，我所急宜整顿者。

更有出使一途，向来赋皇华之选者颇多，景逼桑榆，纵令精神尚形矍铄，然数万里重洋之风涛，瘴雨蛮烟之水土，残年风烛岂能堪之？故往往有归即乞休者。况长征三载，甫得洞明洋务，而日暮途远，亦难再矢驰驱，国家仍不能得其大用，则何如加慎于选派之初也。

汰 冗

今日度支告绌，库藏空虚，欲减糜费而归撙节，必自汰冗员始。夫内、外各员，其所谓枝官备位、闲曹冷署者，屈指数之，实繁有徒。国家设官分职，原所以治民保国，使各有所职，而百事具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自捐纳一开，而冗员愈众，候补拥挤，大员调剂维艰，势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廩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僨国是之人。夫今之冗员，非犹古之散秩已也。所谓汰者，非必举高爵厚禄而尽行裁改也，亦使幸位之流、素餐之辈，无所托足耳。不然，徒耗俸糈，无所短长。朝廷安赖此人以累民病国哉！

冯氏^①曰：今冗员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什百。请得而备言之：

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仅三百余万石耳，曩年行

① 冯氏即冯桂芬。

漕运之时，所有漕米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皆可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三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而自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漕标除盐城、海州东海二营应酌留镇标外，余皆可裁，岁省廉俸、兵饷、工食约银数十万两。粮道一官不过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吓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又验仓收米者亦数百人。如天庾正供招商承办，则海运委员均可裁撤，省费尤巨。

一、河务。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驯谨者，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其实，非抢险不使一钱。窃以为不如归并地方，俾专责成。河兵饱食而嬉，办工仍调民夫，毫无所用。运河既安挑浚，所设闸官、闸夫纵不全撤，亦可裁减大半。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所办责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监督税课更少，不如尽裁关差，归并地方官兼理。各海关道事颇清简，亦可裁撤，而以深识中外文字，长于

榷算道府班为正税务司，与洋人税务司分司其事，既可省费，又免漏卮。

一、盐务。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意。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出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主簿、巡检驻劄兼理盐事，但存运同一员为运使属官，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官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亦皆可省。考总督、巡抚昉自前明，因事设官，事定则罢，中叶始为定额。国朝因之，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惟督、抚权位相埒，和衷固不乏人，而同城者议论意见每多不协。同一事也，或此是而彼非；同一人也，或此好而彼恶。两姑之间难为妇，属吏亦几无所适从。应请将湖北、广东、福建、云南四巡抚裁并，而各以总督兼之，以一事权。盖大省则督兼抚，小省则抚兼督，岁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算。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酌中之法以三、四府设一员，所司之事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各员必宜量裁者也。

京官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应行裁减者。如东宫不设，安用官属？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

耳目之官，今设员八十，不为不多，然半皆仗马寒蝉，曾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以内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许其言事，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始非拾遗、补阙、询事、考言之一助也。他若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当大减。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事为两得。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至于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官亦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设督抚，官愈大则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

儒学一官，大县设教谕，小县设训导足矣。何必正、副兼设，府学诸生仍归诸县，府学教授可裁也。

迩来自厘局一开，所有捐班候补人员，悉举而纳之其中。故刘峴帅甫莅两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无实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领薪水，通计每年省费约三十余万金。今之局务可裁者尚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而论，皆理财之类，应归藩司所管。今则采办有局，支应有局，转运、牙厘又有局。即云藩司事繁责重，不暇兼顾，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至于保甲、清讼、巡防，本臬司之专责，郡、县相与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县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之

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门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班馆等事，每次至少十余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须分任于众人，不过捐员日众，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闲员。虽然为闲员，计则得矣，其如库款日绌何？要宜力加整顿，可裁则裁，可并则并，非特可省经费，并杜幸进之阶。

至于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禄。堂官则每署四员，而兼差者尤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极其繁琐。至于鬻爵竟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

今请首停捐纳，乃改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升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通改授。知县以下分设功曹、刑曹、户曹，而亦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吏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裁老弱之兵以加饷，汰闲冗之员以加俸，何莫非节用之大端乎哉？

夫国家之囊中饱而已矣！冗员愈众，侵蚀愈多。一盐

务计养闲员数百。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甚至持一荐书，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数十金。以一省计之，所费已属不资；以二十一行省计，所费愈觉无穷。应令各督、抚查有此等人员，毋徇情面，一概屏黜。且闻各省台、局，实在坐办者无须多员。事务减少者归并兼办，凡挂名及差遣者均应裁撤，以除酬应、虚糜之费。其余京内、外各衙门丁书，亦宜一概逐去，另雇诚谨有余者专给奔走，不得与闻公事。如是则中饱之风自绝。且也，大官多则取之于民也愈厚，国家当鼎盛之时，物力丰盈，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剝者，节费尚其小焉者也！

革 弊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与弊如影之随形。惟善用者则弊亦利，不善用者虽利亦弊。所谓为政贵在得人，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者，此也。慨自礼教衰微，人心陷溺，上下、内外、大小一切往来惟利是尚。有事至公庭，未有不索贿赂行苞苴者。诚如冯氏《抗议》曰：今天下利而已矣！百弊丛生皆由于此。

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庠序，宜守卧碑。乃幸得一衿，即尔作横乡曲，鱼肉良善，抗粮不完，结党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与差役朋比为奸。差役恃为护符，张其牙爪，联作腹心。有利则瓜分，藉以讹诈乡愚。聚赌抽头，视为常事。浸假而为举人焉，浸假而为进士焉，所作所为亦复如是。名分愈高，声势愈大，贪吻亦愈张。动恃其律例之熟，笔锋之利，颠倒是非。士为四民之表率，今若是又奚赖焉？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革之之道奈何？以一字概之，曰：“杀”而已矣。非过严也，当此纲纪宽弛，非用重典不足以儆众。杀一以儆百，士风庶几稍肃乎，士习

庶几稍正乎。其次则褫其衣领，永不许登诸士籍。

一、官员之弊。今之大、小官员，其出身而登仕版也，岂为朝廷乎？只为一己耳。每得一官，惟量缺分之肥瘠，计班资之崇卑，每岁可获利若干。抚字则拙，催科则勤，明目张胆以号于人曰：“好官不过多得钱耳！”甚至与丁书、胥役互相狼狈，倚为耳目，托为股肱、心膂。为上者且如此，为下之势更肆矣！民其聊生乎？何法以处之？亦惟轻者斥，重得黜而已矣。

一、吏胥之弊。贱等于奴隶，而权驾乎公卿，流品甚杂，心术最坏，良由积习使然，莫之能返也。江苏州、县、漕书闾人得持其短长，所设关书徒以供侵蚀。其缺可纳资为之，传之子孙。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权势之盛莫盛于今日。衣冠中无耻之徒且与之往来要结。每有事，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推而上之，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犹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权直出于宰臣大臣之上。究其所谓可不可者为索取部费地耳。上下其手，生死系乎一字。利之所在，其弊如此。今计每部不下数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疾驰旁午，鞶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计吏、兵、户、工四部，岁不下千数百万。

其次则曰差役之弊。差役素无工食，专倚讼事以为生。一县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数百人。有十总，有六十总。

魁其党者曰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此外所有图甲庄书，皆适以迫呼扰民。今计外省衙门人数之众莫可究诘，婪赃更多，不啻千万。究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杀者一而养之者百；则惟有永易其人。内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与闻政事；外官可并其事于幕，名之曰幕职；可以为入仕之途，重其责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贪墨败名。夫吏之得以弄权，其弊皆由于则例之繁，用以上下其手。惟吏挟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循至于天下大乱。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而其流弊之极至于如此。其例条目繁多，细如牛毛，徒足为吏胥舞弊之具。选人万不得已，一切以欺应之。国家设例本以防欺，今乃适以导欺，甚且逼之使出于欺。惟胥吏则以为大利之所在，例愈繁弊愈甚，徒足为吏胥浚其利源而已。今欲革其弊，莫如悉付之祖龙一炬，但取简要明易者数万言足矣！旧例既废，重颁新例。凡事以简驭之。一事两可者，大官断之以理足矣。必约束以无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颠孰甚焉。

一、杜漕粮浮收之弊。今之《赋役全书》款项繁多，名目猥琐，分合杂糅，莫悉其每亩征税之数。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主于大目通晓。吏即欲舞弊，已自无权。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揭之大堂，俾众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征信录》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有不符，许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绝风清

者，未之有也！

一、杜賦稅不均之弊。賦稅不均，由于經界不正。欲正經界，須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吳田一畝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謂“南方田畝狹于北方”者，此也。今擬先繪圖，然後明定畝數。以一縣之丈地敷一縣之糧科，按畝均收，自泯偏頗，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額。如是則豪強无欺隱，良儒无貽累矣。

一、徭役差費之弊。內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歷經督、撫奏疏言之矣。海疆各省差役之費駭人听闻：不論有理无理，原告被告，做稟有費，代書有費，入稟有費，差役有費，甚至被劫者投稟被押，候批准勘驗而後釋放，復索勘驗夫馬費。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許多費用，鮮有破案人贓并獲者。故廣東被劫之家，多不稟追。劫盜之風益熾。聞廣州府各縣劫案歲有數百起，殊可慨也。查歐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无費，惟大案有公堂費，歸輸者出，如輸者无力，歸勝者墊。无中國衙門費用之多，鮮有因訟傾家蕩產，賣妻鬻子者。宜參酌除之。

一曰州、縣亏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貢物勒索之弊宜蠲也。天下之害大抵上、下兩損，而歸于中飽，以至于蠹國而病民。凡事一經官吏之手，无不浮開價值，橫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虽洋关办事之認真，亦有弊：各商謂輪船碼頭驗貨，洋人杆子手与秤手通同作弊。如有請驗之貨，有賄即放行，无賄必为留難阻滯。洋关之听差与报关行亦通同作弊。报关者短报斤

两，少付水脚，轮船行欲吊卷查看，皆为听差所攔，或埋没也。西报谓：中国弊政颇多，莫甚于八股取士，鬻人作宦，女子裹足，为各国所无，至今未除，甚以为奇。即一极琐屑事，亦必欺罔贿赂，无所不至，则大者远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问乎！今莫若亟为变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岂不幸甚！

建 都

有客问于杞忧生曰：“自海疆有事以来，议战者有人，议和者有人，议守者有人，独不闻有议迁都者，何也？”

杞忧生曰：“我朝定鼎燕京，而长白一山，地居民维扶輿钟毓之灵，笃生圣哲，龙兴胜地，距京师千里，据上游而馭六合，天下全势如在掌中，所以奠亿万年有道之基，而世世守之者也。安土重迁，谁敢轻议及此？藉曰有之，亦必枢密嘉谋，草野恶得而妄参耶！”

客曰：“世变靡常，今昔异势。燕京自辽、金、元、明以迄本朝，建都旧地，西、南、北面三垂高山，东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势天然，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而中国自开海禁，尽撤藩篱。法国侵占越南，与云南之蒙自、开化，广西之镇安、左江，处处毗连。英国据五印度，由暹罗、缅甸以入滇，由前藏旁连青海以入蜀、入陇。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其南鄙包络黑龙江、蒙古、新疆以至西藏，袤延三万里，皆与中国接壤。此外海国番舶出没于东南七省，自奉天金州、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沿海设防

亦一万四千余里。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急于水者缓于陆。今则水陆交迫，防不胜防。而燕京距海仅三百里，中国都会距海最近者莫若京师。前代虽有海防，未闻海战。今日轮舟、电线绝迹飞行，即此一端已相判天壤。况俄人鲸吞蚕食，战兵数万，距吉林才隔一山，战船泊于东洋，互为声援者又数十号，近复与日本同谋，结约吞并朝鲜，逼处凭陵，有日辟百里之势，与各国意主通商者迥不相侔。万一卷甲长驱，径趋东省，势或不敌，必且震动神京，而宿卫雄师又不必皆能出奇制胜。庚申之变且北狩以避其锋，兹则卧榻之旁先已有人鼾睡。前车是鉴，覆辙岂可循哉！”

杞忧生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敌国外患，何代蔑有？惟当内修政事，外固封圻，亟择蒙古王公中之智略者，秣马厉兵于关外要口，严为戒备，以纾北顾之忧。而于直隶、山东、河南、山、陕等省，简派知兵重臣练兵屯营，与京师声势联络，以为犄角之势。敌人虽强，亦不敢扣关而牧马矣！若遽望风怯敌，而惟迁都是谋，历观自古以来，畏敌偷安未有能复振者。无已，则以亲王监国，留守燕京，而用成王营洛、盘庚迁殷、唐建东都、元立上京故事，另辟一地以维根本大计。或以为行宫如前代之有南京、北京、东京、西京之设，遇有外警即入内地巡幸，敌人不注意于北京，则动辄要挟恫喝之事鲜矣。欲求今日之地势，可以居中驭外、雄长天下者，其惟关中乎？英人戈登于法人之役献策傅相，曾主迁陕。楚南王子寿比部曾主迁晋。关中形胜，沃野千里，沟渠四达，耕、渔、畜牧可以广事屯田。又有河东花马盐池以为民利。天

府陆海，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诸国舟楫不通，即陆路之铁路、火车亦未能遽到。重重关键，以守则固，自可深闭而固拒，长驾而远馭，气毓真王，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自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虽时会使然，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方今四郊多垒，而天下人心固结，未有闻海氛而动摇者。朝廷正宜示以镇静，多购坚船利炮，令四海倍道勤王。俟他日无事之时，别筹专款，宅镐卜洛，建设陪都，为进战退守之至计。果能君臣同德，上下一心，立政任人，励精图治，坚忍十数年，无难转弱为强，易贫而富，不战而自服，不守而自安，不言和而海外诸邦无不怀德畏威，同风向化。迁都何为哉？”

客闻之唯唯而退。

户 口

圣贤论政，首重民数，曰：“有人此有土。”又曰：“得众则得国。”诚以民为邦本。邦者民之所积也，故抚民而不知其数，则一切政事无从藉手。譬如一家之中，为父兄者，子弟之多寡尚不能了然于胸，安问优劣。然则居今日而谈变法，其必自清查户口始乎？夫知县、知府之官，顾名思义：官为知县应知一县之事，官为知府应知一府之事。租税营业事虽至曠，莫非出于户口，则户口之数更应知之。乃问今之府、县，其所辖之境户口多少，类皆瞠目而不知。非不悬保甲之牌，非不造鱼鳞之册。乃户非其户，丁非其丁，生者不增，死者不减，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来，上下胥视为具文，牌册有名而无实。

查东、西各国均以户口为重，有生死婚姻注册官，无丁税、徭役。汉武时有人税，贫者子多溺毙。况此时衣食价昂，如抽丁税，人民必减。东、西各国不抽人税，所抽者客民，恐夺其土人工业耳。有征进款多者，亦有抽丁练兵者，由地方有司或饬警察署即巡捕房总巡，逐户稽查、编立号数。日本章程首

将烟户编号，次及资产有无、衣食丰歉。自城镇以至乡村，其户主家族、姓名、阶级、职业、生计、年貌、行状、男女老幼、生死出入，与夫同居、寄寓、乡贯、往来，莫不部分而籍记之，随时阅视。而于家无恒产，以及娼馆、旅店，巡视加密。若博徒、刑余、私窠子等类，则尤平常加意察其举动。所以无赖之徒，既不得朋比为奸，又苦于避匿无地，改过自新比比皆是。遂能以三岛之地，雄视五洲。顾其章程亦与中国初无大异，何于彼则效，于此则否乎？无他，彼践其实，责成巡捕逐日稽查；此存其名，但凭文告，终年不问耳。

中国自丁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非若前代之丁口有赋，隐漏有罚，因此而户口之数视为无足重轻。大吏之考核，牧令之报最，胥不在此。其申报督、抚，咨达户部者，不过虚应故事耳。

今宜设生死注册官，并仿照日本警察之法，招募壮丁以为巡捕。城镇各设警察署。一、二百户之乡村各设巡捕房。畸零村户就近编附。地方官会同警察署，将辖境之内男女若干，出仕者几何，充兵者几何，为农者几何，为工者几何，为商者几何，谁为家主，谁为佣人，谁为土著，谁为寄寓，年貌老幼，逐一详记。其有产无产，有业无业，亦载册中。每月、日有生死婚嫁、产业卖买、远路往返、人口增减，责令屋主告知。所司登记于册。其渔舟埠船则用部勒之法，编号给牌；客栈旅馆则用循环之簿，详细注明。至于乞丐另为编册，酌给庙宇或公所，责令丐甲查点。日

间任其行乞，夜必一律归宿。如不归宿，即行驱逐。丐甲不察，有事连坐。以上分为稽核，而总其成于警察署。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或按月，或按季递申疆吏，而达之政府。

岁时由政府或疆吏轻车简从，亲自抽查，以期于事核实，于民不扰。抽查无定期，亦无定处，庶不敢如保甲牌鱼鳞册之随意编造。如是则若网在网，有条不紊，然后征兵、劝学诸政可以次第施行。天下虽大，不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当此群雄环伺中国，沿海口岸及边徼之地与各国属土犬牙相错者，时虑为人侵占。若能自治其民，则百废可兴，庶政可举，而一切皆自户口清厘始。愿为当轴者借箸筹之。

教 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然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藁莽之世也。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穡、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宫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

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古未远，遗风尚在，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犹能自教自养也。暴秦崛起，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则弱。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美国之民无不读书，宜其富强如是之速。阿洲之民未闻读书，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

势以强也。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推广。市无游民，靡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癯残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此教养有道，而英、德、法、美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芜，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凌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谚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倘仍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詎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于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

校，广植人材，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学校者人才之本，格致者学问之本。中国士子于诗文小楷而外，罕所讲求。一旦得中科甲，遂目空一切，其实不知国家利弊如何，格致工夫如何，徒有虚骄之气：贱视工商，鄙视武夫，傲视西人。纵见西人教养善法心悦诚服，亦不肯悉心仿办，必改头换面，以为因地制宜。其实吝惜小费，或经办从中渔利，以致所授不全，所学不精也！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不然，则天生斯民而托以教养之责，不独不能行，反暴敛以困之，势利以诱之，而犹欲以空名自跻于三代之隆，则吾谁欺？

训 俗

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非生而恶也，生长乡间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俯仰无资，饥寒所驱，铤而走险矣。承平之日，上下断断然日惧以桁杨刀锯，而陷于死亡者累累然相续也。其或上失其道，则揭竿斩木，弄兵潢池之中。幸而将帅得人，士卒选练，萃群策群力，不分首从，草薶而禽猕之。而此伏尸流血绝胫陷脰者，皆国家不教之愚民也，反之仁爱之天心，忍乎不忍？

古者悬书读法，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者，皆有实心实政以诱掖斯民，所由俗美化行，而乱萌潜杜。秦、汉以还，以文法治天下，欲尽愚黔首，以惟所欲为，古意荡然一无存者！是故士农工商，教失宗旨，风俗日偷。我有民而不能自教，彼佛、老二氏乃得恃其天堂、地狱、修斋、忏悔之说乘隙而入之。其本意固亦劝人为善也，而愚民靡然归之若流水。二千年来之君若相，亦自以国家之教化未足以遍及斯民，姑听客所为，

而淫祀之兴遂盈于天下。自有明万历以后，彼天主耶稣之教亦得以势胁利诱，肆其簧鼓而眇我空虚。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教亡人之国，阴谋诡计，四海皆知。既已诱致南交，取越南如反掌矣！中国之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为丛驱雀，听外人取而教之，恐祸患之乘，更有非意料所及者。然则有民而不能自教，其病之中于内者，推原祸本，则粤、捻诸乱所由生。此前事之不可不愆也。昔年发逆、外夷之祸，皆起自东南。今广东赌博之盛，盗贼之多，甲于天下。若无教化，甚为杞忧。其忧之伏于外者，环顾中区，则俄、法诸邦所同覬。此后患之不可不虑也。夫内江外侮之源，由于民心不固；民心不固，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由于教化不敷。士无真实之学，农乏耕植之能，工鲜精巧之艺，商昧懋迁之机。当道无奖励之方，而有剥削之政。无怪民生日偷，国势日蹙矣。

我朝圣圣相承，追踪三古，特颁《圣谕广训》，令官吏岁时宣讲，以劝化愚民。今上复颁雍正时钦定《劝善要言》一书，用扶世而翼教，所以为斯民计者，周且挚矣。惟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阁，则考察未及，经费未筹之所致也。今各州、县教官几同赘瘤，似宜责成教官三八宣讲，而府、县就近稽查。仍筹经费，听讲者款以饗飧。劝化若干，记以簿籍，岁由学政综核其成。著有成效者，保升知县。此城邑宣讲之法也。各乡各镇在三百家以上者，由教官遴选公平之生监绅耆，亦筹经费置立公所，按期宣讲，听讲者授以餐。劝化若干，籍而记之，以申于教官，转详学政，移咨吏部，三年有效，量予出身。此乡镇宣讲之法

也。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务求有当于人心。行之二十年，而天下风俗有不焕然丕变者未之有也。我国朔望讲乡约、讲圣谕于矮屋之下，或庙宇檐前，何如西人按七日一聚会于大庙堂中，列椅而坐，肃然静听。讲经者皆饱学宿儒，非华人之讲乡约者仅识十六条圣训而已。我国无知者多，宜飭各省教谕认真宣讲圣训。尤望官绅集资，请黉门秀士科甲人员，如泰西之牧师，于各州、县按旬宣讲圣教于学宫，或庙宇客堂之中。不论士、农、工、商皆可入听，以正人心。大抵人心不正，由于风俗不善；风俗不善，由于教化未敷耳。

至于海外贸易工作之商民不下数千百万，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赌杀凶殴之案层见叠出。其性情良懦者则入天主耶稣之教，夏而尽变于夷。蚩蚩者氓莫非天朝之赤子，愬然竟置之度外，岂圣仁怙冒之心？今既于通商各埠专设领事以抚驭华民矣，似宜就地筹捐，建立书院，以教聪颖子弟。仍广筹经费置备公所，按时宣讲《圣谕广训》、《劝善要言》，或由领事延聘达人，或由领事自莅，每逢朔望及礼拜日期，逐条宣讲。听讲者亦记以籍、授以餐。岁申出使大臣稽其功过：勤者优奖，违者扣除，并于摺内声叙。

至中外宣讲之人固须品学端粹，亦必辩才无碍，始足动人听闻。有一华人入西教充牧师，在教堂宣讲，听者甚众。嗣因与其师不合，出堂下乡宣讲孔孟之教，听者益众。可知口给之所关为至巨也。彼佛、老浮游之论，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果得认真经理，他日太阳首出，燭火皆消；洪钟一鸣，万声皆

寂。万姓既改恶从善，永无犯上作乱之萌，万邦亦一道同风，咸知学圣尊王之义，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者，此其权舆要领矣！高见远识之君子慎勿以为迂也！

刑 法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有其人，然后有法；有其法，尤贵有人。中、西律例不同，必深知其意者，始能参用其法而无弊。惟西国之法犹能法古人明慎之心，苟能参酌而行之，实可以恤刑狱而致太平。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衰世，犹有哀矜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使不返本寻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盛世之休风耶？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秦西有《律学大同》一书，为欧、美二洲各国素所遵行，近数十年来又概从轻减，所以各有不同。日本维新后刑律大旨改宗于法，而参以英、德、凡重刑九：曰死刑，以铤杀之；曰无期流刑；曰有期流刑；曰无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重惩役，入狱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惩役，但服役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曰重禁狱，不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禁狱，收禁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轻刑二：曰

重禁锢，收入狱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谓也；曰轻禁锢，但收禁十一日以上，而不做工之谓也。加刑六：曰削去权柄；曰削去官位；曰停止权柄；曰禁止治产；曰监视收禁；以后再以人管束之之谓也；曰充公入官。此外尚有罚刑，自数十元至数元不等。惟我国尚守成法，有重无轻，故西人谓各国刑罚之惨，无有过于中国者。如不改革，与外国一律，则终不得列于教化之邦，为守礼之国，不能入万国公法，凡寓华西人不允归我国管理云。

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鞠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讼之为字从言从公，谓言于公庭，使众共闻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则问时要无打法。善夫何沃生律正之言云：两造之中，必有曲直。曲者宜罚，多此一打是谓滥刑；直者求伸，被此一打，是谓枉法。使曲者不畏打，而故逞其凶，不挠之状，其情有似乎直；使直者畏打，而甘受其屈，战栗之状，其情有似乎曲。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则冤抑愈加；讼所以剖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则是非转昧。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则决乎不可。今夫言由心发者，情也；言多遁饰者，伪也。问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则谓之直可也。问官以公明断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则谓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无罪，用刑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

不招，是谓刑非其罪。此理易明，人所同晓。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问官也。夫不信问官，岂独中国为然，即外国亦然。乃中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图塞责。而自此冤狱多矣。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而于是真情出矣。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问可对青天，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不询于众也，况健讼之流谤张为幻，狱成之后，虽问官亦不无自疑。则何如询谋佥同、輿情允洽之为愈也。

今宜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每遇重案，轮班赴署。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以及律师之辩驳。审毕，审官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视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以定从违。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即西国公举议员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即西国陪员议判之意也。若夫人非险狠，则公堂对质每多啜嚅；人若奸顽，则虽三尺当前，犹能诡辩。使无律师以代伸委曲，则审官每为所愚。中国之问官，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娴，而所用之刑名幕友，又于律学不轻传授。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稍有依违，则官司之前程难保；若无贿赂，则在讼之受屈必多。律之深文，例

之繁重，皆胥吏所以便于上下其手也。非破其趋避之巧及舞弄之奸不可！案情百变，申详之成格牢不可破，以罪就律例，非按律例以定罪犯也。故谓律必改简明，例必废成格。则何如明张其词，按律辩论之为得也。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代为剖折，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至若刑者类夫秋之肃，犹赏者类夫春之温。故刑者治天下之所不能无，然而中国繁刑严法，未免失之于酷。特以刑莫重乎死，缢首与斩首均死也，而肢体之全缺判焉。刑莫辱于撻，挥鞭与施杖均撻也，而受辱之轩轻攸分矣。故知弼教端在明刑。今欲明刑，须除苟法。试将刑之制约而计之：缢首致死，系狱苦工，监作官奴，罚缓赎罪，鞭捶示辱，充发出境。之数者，足以治轻重之罪而有余矣，毋或滥也。

至于通商交涉之件，则宜全依西例。今海禁大开，外国之人无处不至，凡属口岸无不通商，交涉之案无日无之。若仍执中国律例，则中外异法，必致齟齬。不如改用外国刑律，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且日本东瀛一小国耳，改用西法，西人亦归其审理，此时和约已有成言，非其明验耶！去岁特设新例，凡为官者必须通晓英文，凡外国人俱准游历内地。其独重英文，是志在推广商务；其许入内地，则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何中国犹远不及日本哉？往者中国不肯改用西法，嫌其宽待狱囚耳。乃遇交涉之案，为外人则照外国之例而从宽，为华人反依中国之例而从猛。是华人之生于中国，反不及洋人之来自外邦也。然中外一体，为政无事偏私，但执公平，则无思

不服。是故以德报怨，圣人不与；伤己徇物，贤哲所讥。况生于其地者，又有土著之利权，非外来者所能攫夺也。泰西国内都会必由刑部派臬司以司鞠事。中国亦宜于中外通商之地，专设刑司以主中、外上控之案。此其人必须深明中、外律例，经考超等而多所历练者，方膺是选。其审案俱以陪员主判。如外国人有久居中国行事和平者，可与中国人一律得选为陪员。遇交涉之案令其厕名主判，则外国人心必无不服。怀柔之道其在斯乎！

狱 囚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痛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流入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斩、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

近闻各直省州、县多设有自新所，以处轻犯，法诚善矣。倘更能参用西法以推广之，使军、流以下皆得自新自赎，则保全必多，办理亦易。全政体而广积阴功，当亦仁人所深许也。

以西例较之中国，虽法有轻重，律有宽严，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今日刑书之阙。考西国罪犯工作亦有数等：有狱中之工，有狱外之工。狱外之工，男则制造百货，女则纺织、刺绣等事。凡一犯入狱皆须习学一业。素有业者即于狱中执其本业。所获工资半给犯人私用，半归狱中公用。其有禁拘暗室，独作无用之苦工者，

则罪情重大，务以劳苦之而已。狱外之工，如建炮台、筑监狱、开荒地，皆可由狱官监督而为之。如汉时城旦鬼薪之类，古意之未尽亡也，实本于《周礼》，而推究其原，周礼以圜土聚教罢民。圜土狱城也，有罪者入之，令其工作，俟其能改而舍之。夫莠民犯法，半迫饥寒，拘禁而生理益穷，释放而依然赤手，欲须臾缓死，必故态复萌。若不预为代筹，罪满仍无生路。故西人之治狱也，谋杀叛逆则缢杀之，余多罚缓。无力罚缴则系于狱，与凡已定军、流等犯，依律所限年份，稽其工作，如捆屨织席等事。其有素习工艺者，使各理旧业；顽蠢罪重者，则充一切卑贱劳苦之役，如除秽、砌路、修桥、筑垒之类。皆酌给辛工，派董经理，所食每日足敷糊口，留其所余，于罚满发放日，按名计数发给，俾得谋生。始治以应得之罪，终予以迁善之资。谁无天良？能不激励？至于牢狱拘禁之所，葺其房屋，勤其扫除，不使湿蒸破漏，以免受病而便作工。更设有浴室、病馆，使医士掌之，地方清洁，饮食适口，其曲体人情若此。

或谓：“中国罪犯险诈，监狱辽阔，严为防范，尚虑脱逃，安能仿行西法乎？”不知泰西犯人在内执业，仍高其墉垣，严其约束；即在外为工者，亦伍耦有数，出入有节，稽查督责，健役相随。但于法外施仁，原不因仁废法，正无庸颺颺过虑也。

更有一法可以上下交益者，如令罪犯修治道途是已。今中国道途崎岖破碎，多未兴修。就近者言之，则一邑有一邑应修之路，一郡有一郡应修之路。就远者言之，则津、京

一带为南、北孔道通衢，官宦绅商士庶必由之路，乃或凸或凹，或窄或斜，平日两马一车已极迟缓，一遇霖雨则道途泞滑，时有倾覆之虞。诚谕令地方官各按所辖地段，遣令流徒各犯兴修，酌给微资，代为收存，俟罪满之时发给，俾日后得以作本谋生。则必不致恣意妄为，复罹法网，而从此周道坦坦，履险如夷矣。惟修路宜仿西法，西人修路下皆平铺石块为基，或立或侧，或阔或狭，再以碎石及泥土平敷其上，用人、马、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压之愈重，则路愈坚平。其路中高旁低可免积水，广阔以五尺为率，而城市繁庶之处则有阔至二、三丈，四、五丈者。要皆平整坚固，所用之石以文理细密、质刚性韧者为佳。中国可用砂石、花刚石、青石，质虽不硬而性粘，其屑末著水与灰同功，用以铺路亦为合用。所铺之石厚至六寸或一尺，极重之车悉可通行无阻。

今果仿其法而行之，不惟无反无侧，正直荡平，并使各处狱囚练其筋力，调其气血，励其精神，不致常处覆盆，易生疾病，岂非一举而两得者耶！

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凡被人控告无钱清还者，虽贵如总统，亦可将其存欠帐目呈官报穷，摊数了结。如其所报帐目不符，查确有钱银寄顿别处实据者，即治以棍骗人财之罪。若不报穷，论欠数之多寡，定监期之短长。大抵至多监禁一年而已。其伙食银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狱。倘逾期一日不送，狱官即将监禁者释放。或有不愿食监中之伙食者，准其在外自办，早晚送入。

凡犯钱债案者皆同居一处，与犯别罪之人不得同处。其屋宇宽

敞，楼窗高朗。每人铁床一张，毡褥、被单、棉枕，无不洁净齐整。按七日一换，任人互相过谈，看书、写字、作文，惟不许高声大叫耳。正、副司狱必每日到处一巡，如有地方不洁等物，当飭洗刷，若有病即飭送官医调理。病人各寓一室。按月，官、绅士数人随同正、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有巡丁勒索等情，准其告诉绅士，交狱官审办也。

我国如重商务，钱债与别案，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①

^① 自“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至“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是《狱囚》篇的附言。

巡 捕

上古之世民风敦朴，浑浑噩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后世则生齿日繁，品类不一，非有诘奸之善法，缉暴之良规，不能安善良而除莠恶。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巡捕之设也。考西法通都大邑，俱设巡捕房，分别日班、夜班，派巡捕站立街道，按段稽查。遇有形迹可疑及斗殴、拐骗、盗劫等情，立即拘往捕房，送官究办。故流氓不敢滋事，宵小无隙生心。即有睚眦小忿，口舌纷争，一见巡捕当前，亦各释忿罢争，不致酿成命案。而其禁止犯法，保护居民，实于地方民生大有裨益，诚泰西善政之一端也。

我中国自通商以来，渐知西法之善，独巡捕之设从无人创议施行。岂以祖宗成法具在，不可一旦而更欤？抑以声明文物之邦，不屑行西国政治欤？虽天津设有看街巡丁，然似是而非，名实不符，有其外观无其实效也。今中国各省奸民布满市廛，或名青皮，或名光棍，或名混混，或名流氓，总而言之皆莠民也。此辈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游手好闲，毫无恒业，挟其欺诈伎俩，横行市肆之间，遇事

生风，无恶不作，不啻以拆梢为秘诀，以敲诈为薪传，皆因内地城乡无巡捕往来弹压，故敢肆无忌惮，愍不畏法。又甚者为哥老会匪，其党羽众多，布满长江一带，肆其肘腋之能，而犯案者绝少。盖不肖绅士往往为之庇护，差役更勾通一气，坐地分赃，或以局赌为生，或以扒拐为事。语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粤匪之肇乱可为殷鉴，当轴者犹蹈习故常，不思除其根本，后患尚可言哉！除根之道莫要于仿照西法，设立巡捕。何则？从来国家所以御外侮者，在乎水师之精，陆军之勇；而所以遏内乱者，在乎巡差之密，捕役之勤。乃中国南、北水师，内、外陆军，训练不精，老弱不汰。敌至则望风先溃，固已有名无实。而于巡差、捕役竟至绝无其人。迨有盗劫等案，先事不能预防，事后但悬赏格出花红。耗费既多，仍难破案。盖所恃以缉犯者，专在差役，而差役之弊积重难返，民受其害，官被所蒙，举世如一丘之貉。平日欺压良懦，倚势作威，一切窃盗莠民反与之同声相应。所以地方不靖，败类日多。若一旦衅起萧墙，揭竿为乱，必须征兵剿捕，纵能殄灭，伤害已多。则何如广设巡捕于平时，藉以防患于未然，杜乱于无形也。

今宜照何君沃生所言，变通办理。每县设一总巡捕官，每一墟场、市镇、村乡、河泊俱设巡查帮办，少者一人，多者二、三人。每一帮办所统巡捕，皆以地方大小为定：小则十人，大则三、四十人，县城内、外则须五、六十人，方敷按段梭巡。其巡捕听命于帮办，帮办听命于总巡，总巡

之署宜设于县署之侧。各帮办驻扎之处，必设电线或德律风以达总巡官署，俾消息之传递灵通，不难随机应变也。地方无事则帮办督令巡捕巡查街道，遇有违法犯禁扰及地方者，则谆谆劝谕，使民有所趋避；如固执不听，乃拘获究办。遇有整顿地方之事，可会同县官照理预先告诫详明，使民知所趋向，如古之司市、司隄等职是也。若地方有变，如劫掠、斗殴之事，巡捕须严密查拿，设法弹压，以免酿成事端。如不能止，则帮办以电报达诸总巡，总巡则一面申报县官，一面发电附近各处帮办，督同协助，必使安靖而后已。若不幸有匪徒倡乱，非一、二帮办巡捕所能弹压，则总巡可尽调合邑巡捕，仍申请县官联衔飞请近处军营调兵协助。如此，则揭竿之变，乌合之徒，未有不立地肃清者也。

独是平日约束巡捕，宜严而不宜宽。盖舞弊营私乃胥役之长技，非大惩小戒、雷厉风行，不能绝欺蔽之端，而收振作之效。是当严定条规，每日应行事件必有一定时刻，违者必罚。巡捕未到差之前，须由总巡或帮办逐一点名，然后分派各处地方，认真办事，专为保护良民，查拿痞、棍。其有性情凶暴，办事怠惰，以及私受贿赂，勒索平民，窝盗庇赌等弊，许民间据实指控，查明有据，立予重惩。庶几戢其狐威，穷其鬻技，防闲既密，弊窦可除也。然既有严罚以儆其心，尤当设重赏以励其志。巡捕如能奉公守法，不惮勤劳，由总巡随时记功。凡记功三次者削除差籍，赏给功牌。如果益加奋勉，不至始勤终怠，记功至于六次，作

为异常劳绩，立即升迁帮办。其或终身当差，无功而亦无过，歿后察核事绩亦准削去差籍，其子孙应试、捐官与平民一体，藉资激劝。若帮办有功，则升总巡；总巡有功，则升州、县。如此赏罚严明，不难收得人之效矣。

难者曰：“中国幅员孔长，如是举办，需费浩繁，款将何出？”则应之曰：是无难也。筹款之法有二：一曰用罚款。凡州、县衙门遇有案件，无关风化者，如田产、斗殴等案，一概准其赎罪。视犯罪之重、轻，定罚鍰之多寡，均充开销巡捕等费。每至月杪，将收赎之数，支销之数，按款列明，登诸报章，以昭信实。倘有不敷之处，则就钱粮税钞项内稍资津贴，自能绰绰有余。或以罚鍰之法西国盛行，我中国步武后尘，不免有伤国体。不知“金作赎刑”，《虞书》早垂明训。我乃以今复古，并非用夷变夏也。何容颺焉而过虑哉？

球游地球客述：美国纽约巡捕房共三十五处，二千三百人。每处九十二人，分二班，内副总巡四人。时交子正换班之际，总巡点名，排班而出，各人须将夜间见闻，次早报名登簿。见数人正获犯至，或饮酒滋事，或小窃。总巡询姓名、住址，另登一册，收入班房，分别男、女。四壁皆石，门为铁栅。本日获到六十人，内有幼年妇女七、八人，貌美衣华，共处一室对泣。询为赤身演戏，坏人心术，故在拿办之例。次早解赴公堂，罚鍰具结而释。公堂审案处，亦有监房，分男、女、幼童三等，以处巡捕获解者。

公堂有台高三尺，有暖阁设公案，坐问官三人，各具纸笔，随问随录。旁一桌坐三、四人，为报馆记事者。案前立一人为传审吏。左设一椅坐原告或证人。犯人立栅外，案上左角置教书一本。犯人

先取书置口边吻稍动，仍置原处。此即设誓无虚言之意。台下长桌椅五、六张，坐二、三十人，皆讼师、证人。堂下绅民数百人，任其观听。问官由绅民公举。每日必有数十案；或释放，或罚醵取保，或定罪后转送各衙门核定，或未了结，分别暂押监房，次日再讯。纽约城共有六处，规制井然。按泰西刑律应讯之案，多由刑官会同陪审十二人共同定讞，盖集思广益，不令刑曹独擅其权也。惜陪审者向于百姓中除职官教习及卑贱罪废外，自二十一岁至七十岁皆得书名拈阄，案牍向未练习，识见未尽通明，遇事秉命于刑曹，不能有所匡救耳。

各处所设巡捕，实于地方大有裨益。如中国仿而行之，何致有教堂滋事、两乡械斗、小窃劫案如此之多乎？〔八卷本增：考古之虞人、周官之条狼民，秦、汉之游徼，即今巡捕之谓也。晋、宋而后改为弓兵、差役，于是亲民治事之官皆倚若辈为耳目、爪牙之用。有差役则无好官，有干役则无良民。差役之害，指不胜屈。此西人所以改用巡捕也。

中国通商各埠巡捕：宁波、福建全用华人；上海、汉口什九华人，籍以数西人，数十印度人。上海一埠每一街口立一巡捕，车马繁盛之处酌量加增。一日夜分六班，每班管二时许。人携一角、一灯、一木棍，遇有盗贼，力所不能制者，角声一响，相率应援，巨盗凶匪立时擒获。凡巡捕应办之事一百三十余条。必觅保方能充捕，充捕后必熟读禁令章程。充捕三年无过，则充暗捕，工资极优，故人乐为用也。

乃今之华捕则大不然。向之以木棍卫身者，今则有不肖巡捕辄用打人；向之必读熟禁令章程者，今则多不识字之人；向之下班无事必归捕房者，今则游手好闲，多不归捕房；向之循谨当差者，今则辄在公堂挟制官长；向之不准入弄内者，今则间或串入弄内，与

流妓调笑。闻此等人多系不肖。包探又多系巡捕房门差之私人。人言不一，总之规矩懈弛不合章程，则人多同词矣。若夫包探之弊则更多：一包探多用数伙计，其人不过流氓之余党，无赖之萌芽，用以侦访酒楼、茶肆之间，敲诈拆梢，不一而足，得钱则不解报，不得钱则诬累之。及酿出事端，则伙计逃遁，而包探则推为此人吾早不用，与吾无涉也。种种弊端，闻者太息。

欲去其弊，宜重申禁令：一、凡包探宜令自行侦访。即用伙计亦宜将名姓宣出，庶不致人冒为。一、凡巡补充后，宜令无事之时熟读一百数十余条章程。日本参酌西法，刊有《警察新法》一书。所用巡捕宜加慎选，戒其行为不肖，又戒其无故打人。工部局之在租界善政极多，而巡捕一端实远胜中国胥役。惟法久则渐坏，事久则弊生。附录于此，为总巡者告，有以警其后也。

今中国通商之区类为西人侵削，有明失其地；有暗失其地；有地未失，而已为西人管辖，与失地无异；有地未失，亦不为西人管辖，而巡防归于西人，亦与失地无异。

或谓：“华官筹办巡防，捐款难集。”嗟乎！西人之办巡防，亦岂有异术哉？何以抽捐过于华官而人不怨？章程严于华官而人不怒？一言蔽之曰：办事核实而已。西人收一方之捐，即利一方之民；华官收一方之捐，一方之民不沾其利。此所以西人之捐项易筹，而华人之捐项难集也！

上海租界巡捕亦有为邻县拿获大盗，赃物完全者。可见捕房公事认真，章程亦善。若在中国地方，各绅商、差役，虽知有邻县、邻乡大盗逃匿到此，亦不敢露风首告，以防拖累无穷，又防该贼党报复，其赃物岂能不私不没乎？^①

^① 自“环游地球客述”之后的文字，均为“巡捕”篇的附言。

罚 赎

《吕刑》一篇，论者以为穆王巡游无度，财匱民劳，为此权宜之术以敛民财。今读其书，千载下犹见其哀矜惻怛之意。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所以示万世之治法也，存《吕刑》于训、诰、典、谟之后，独非诏后王哉。蒙窃谓虽行之百世而无害也。秦、汉以还，议刑名者或增、或减，代有更革。“金作赎刑”，其废也盖已久矣。太史公当被宫刑，以家贫不能自赎。是汉世犹有此风。后此斯少见矣。圣清因明律而损益之，实不外《唐律》十二篇之准则。五刑有赎，仁至义尽之规也，而罚鍰之法乃未闻敷诸奏议，见诸施行者，或恐纵富人之恶，长贿赂之奸，而屈抑小民贫乏者之冤狱故也。

今西人杂处中华，刑法此重彼轻，罚鍰此无彼有，宽刻相形，轻重悬绝，未免易生下民咨怨之心，而交涉案件亦每失其平准。老[庄]子曰：“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盱衡中外，似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也。况踵其法而行之有清讼源之道焉。进一解以参之，又得澄叙官方之道焉。

夫天生烝民，资财以生，故相依若性命。词讼之兴，发端于财者十有八、九，若详定罚醵一章，于五刑准赎而外，讼而虚者议罚若干。其半入官帑，半归讼直之人。则始也以财肇讼，终反以讼伤财。稍知顾忌者，有敢轻蹈法网，健讼不休者乎？即梗顽之辈，既知有议罚之条，或亦重命惜财而弗敢轻肆其刁诈。且越礼藐法、欺压良善者多在巨室富豪，今罚减曲者之富，以济直者之贫，则均平之道得也。矧人之爱货财往往重于惜名命：刑辱之不耻，笞撻之不畏，而独至令其解贪囊舍阿堵，则较之剜肉断脰，弥深痛惜追悔。是罚款之严，尤甚于桁杨刀锯之猛也。而顾必谓其有抑冤长恶之患，蒙殊不信其然也。

或者难曰：“吏治之坏，于今斯极。罚醵之法诚妙，恐适以饱贪黠之私囊，富者更易邀幸免。”不知朝廷立法，百官奉行，枉法贪贿亦自有三尺法在。是又贵能察吏耳。若吏不奉法，即无罚醵明条，富厚者亦何尝不屡以贿免也。今请更进一解焉，讼曲罚醵，讼直分醵固矣。若官吏上下其手，以直为曲、枉实为虚者，则准令含冤受罚者，得以赴控上官，遣良吏能员详查复审，询诸公论，断以輿评。若审明原审官贪贿枉法，即用其屈罚人者而什百其倍以罚之，除给还屈罚款外，余尽入官。其富户行贿者，则亦照其贿赂之数而什百倍罚之，悉数入官。有司之爱钱重于惜名命，亦何莫非富人类也：斥逐之不羞，除名之不惧者，至一旦迫发其私囊，将欲遗子孙、购姬妾、起园亭、为娱老资者，俄顷化为乌有，其痛恨悔惜之情，将有不可胜言。或因而

有沟渎自裁者。是大计参劾之严，断不敌破吝惩贪之术妙也。摘录镜存子《治标庸言》曰：“际此国用窘迫，岂无输忱报效者？如光绪三年，前署两广总督刘坤一于兼署粤海关监督后，自陈居官岁久，请以廉俸所余捐交银十五万两。奉旨：‘刘坤一捐输巨款，为储养人才之用，定能公而忘私，力顾大局，殊堪嘉尚。’光绪九年，前大学士文煜明白回奏：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奉旨：‘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又曾带勇之记名提督刘维楨，于三数年间报效海防军饷及鄂省购设机器、制造、枪炮局厂等经费银四十万两。近年顺直水灾，亦有司、道、府、县捐银万两者不一其人。以各直省现任暨优游在籍者，咸如刘坤一、刘维楨，则众擎易举，千百万巨款不待呼助，争相报效，理固宜然。”夫孰敢轻置此网哉？故曰进一解焉，又默寓澄叙官方之微意也。然则罚醵是矣。

罚醵之条目将何如？则拟请飭下廷官、大理、三法司，会同妥议，参以周官束矢、钧金之例。除人命必抵外，刊布定章，示罚于无讼之始，谕罚于方讼之初。献定之后，曲者、虚者，户婚之罚几何？田土之罚几何？斗殴之罚几何？诈骗之罚几何？奸情之罚几何？拐窃之罚几何？债务之罚几何？一切不应为而为杂犯之罚又几何？无资可罚者，即照篇中前论充当苦工。准事犯之轻重，制罚款之差等。毋或偏，毋或贷，上控复审仍虚曲者倍罚之。

州、县之罚案，月造报册上之藩、臬两司。臬司专主勘核案情，藩司则每季按册征提罚款存库。另款存储，以为教养民生、兴举各善政经费。取之于民者，仍还于吾民。国家与官吏莫之或私。且教养诸善政具举后，受罚者亦与

蒙其美利焉！斯补偏救弊之方，即大公无我之治也。何病之有？

至如败军失律之将领，贪墨被劾之大僚，与寻常罪犯有别，是又宜斟酌轻重，分别惩办者。我国家自有权衡，非草茅所敢妄拟也。

医 道

医之道，通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讲明切究，以导一世于和平，登斯民于仁寿者也。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藉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古法徒存，无能变通。此所以谚有“不药为中医”之说也。夫人当疾痛惨怛萃于其身，凡有血气之伦，孰不求生而恶死？乃世无和缓，竟以性命死生之重，付托于轻率庸妄之夫。一方试病，妙谓青囊，三指杀人，怨深白刃。言念及此，忍以医术一门列为方技，而小道视之欤！

考《周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疾医掌医万民之病，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考医之法，古制綦严，所以重民命也。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

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亦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已！各国医学皆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由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查西国医生，皆由医学堂出身，非医学极优考取一等不准给予文凭。即药院中制造膏、丹、丸、散及药水者，亦须由医学堂出身方准，不然该院药水无人买也！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中国之官吏能如是之认真考验乎？此不若西医者一也。

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老人院，癲狂、聋哑等院，遇有死者，许医局剖析肢体，穷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原，以教后学，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考中国神农以至华、扁，实为西医剖割之祖。如论脏腑之部位，即可知有割腹验看之事，特其学失传耳。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若西医者二也。

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而脑有气筋无数，散布于五官百骸。何处脑气筋坏，即何处有病；衰迈之人脑气不足，遂有麻木、昏聩之病；幼小之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而心之为用，专司乎血。心脉一跃，血行一度。验心脉之迟疾，知病体之轻重。中

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血犹水也，脉络犹百川也。潮血来回无不震动，即无不有脉。夫血发源于心，运行百体，嘘吸生气，由肺复返于心，日夜周流运行不息。若按脉推求，决无是理。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总管而出，散布于百体四肢，岂可以两手寸许之管强分寸关尺，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且剖验两手脉位，其管大如鸡翎之管，循臂而上，渐上渐大，上至颈项即于颈中脉管通连，直达至心而止，并不与他脏相属。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且直通一管，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则可；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可。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此不若西医者三也。

治病之法：中医则曰木克土，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克金，治肺者，先泻心；水克火，治心者，先降肾。或曰三焦皆空虚之处，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而尤以保脑筋、养肠胃为主。用药之法：中国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国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且无论汤、丸、膏、散皆属医生自配，较之买自药铺，品味掺杂，炮制不精，自行煎熬，不谙火候者，功用固殊矣！此不若西医者四也。

西医论略病症纷繁，内外诸症不下二千种。审察疗治医者之职，大要不外体质、功用二端。盖人之皮肉、筋骨合而成形，实之以脏腑，贯之以血脉，所谓体质也。一物

有一物之用，无虚设，无假借，所谓功用也。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体认，方能施治。其外症有刺割也，扎绑也，敷治也，洗涤也。事必躬亲，非心灵手敏而器具又极精良，不能尝试。如自开钳、血管钳、曲铰剪、直铰剪。刀则曰钩，曰割；针则曰探，曰坑；以及手钳、银丹筒，皆精巧利用，故于外症尤著奇功。其内症更持机器于腕中，以辨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且有医家报章，何人何病何法医痊必登诸报，以告后世。若遇疑难大症，亦皆登报以告高明。或七日一纸，或期月一纸。业此者购归观玩，互相质证，以尽所长。日本素学中医，今亦参用西法，活人无算，其明证已。此不及西医者五也。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谓宜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内证主以中法，外证参以西医。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先将《灵枢》、《素问》、《内经》、《难经》熟读，博览仲景、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参以西国

之图器剖割之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有能治疑难大证，卓著神效者，报明医院，颁发银牌、匾额，递加虚衔、顶带，以旌其功；并将治法、病由登之医学日报，年终汇集刊刻成书。庶庸妄者不致滥竽，高明者有以自立。医之一道可与良相同功矣！

善 举

古者鰥、寡、孤、独谓之穷民，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四者。《周礼》睦姻任恤，当日必有规制法度，厘然井然足以传之后世者。而惜乎书缺有间也。

中国生齿日繁，生机日蹙，或平民失业，或乞丐行凶，戒游手逗留，或流民滋事。近虽设有栖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诸善举，然大抵经理不善，款项不充，致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市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揆其所自，实迫饥寒。亟宜设法扩充，官绅合力，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广为收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所有款项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岁刻征信录。多置田产，藉供馔粥，广葺厦屋，俾免风霜。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增赋税。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此也。

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闻英人密尔登云：英国有富家妇，夫亡遗资甚多，其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及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之地，共费银一千五百万磅。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而其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

即以养病院言之：屋宇宽广，洁净无尘，病人到院就医，医药、饮食之需悉出诸医院，医生不惮烦劳，役人不避秽恶，曲加体恤，以愈为期。

育婴堂以美国纽约为最善：房屋百余间，男女自初生以至七、八岁，常有数百人，多或至三千人。每楼十六榻，二榻相并，一卧婴儿，一卧乳媪，衣服精洁。男女四、五岁即使识字读书，教作小玩物，以开其智慧，六岁至八岁女师教以歌诗，舒和血气。俟及岁时，量材荐事。每岁经费约二十六万元，半出公家，半出善士。俄国育婴堂，抚养之道揣摩体恤，无微不至。常有富贵之家，患家中自养无术，出资相助，兼以自托者。

义学堂则贫家童子自五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塾，兼习工商之事，不学则罪其父母，旷学则其师督责之，至再、至三，仍或不悛，则拘诸改过学堂使之省过。更有富人自制一船，招致贫民供其衣食，设监督之人，令其学习水师，限

两年技成，分派兵船充当水手。

英之养老院，伦敦都城凡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妇之老而无告者。月抽其乡租为经费。日给三饭：晨给一馒头、一茶、一牛脂、一粥，午加肉，晚加羹。血气衰者，医士谓宜酒则酒之。男外服黑呢，内服白布，女服什色衣裙，无异充裕之家，每礼拜一易，敝则改造。寝所宽舒，男女异处，夫妇偕则共一室。妇女未衰老者，令缝纫而货之，界以十之一。有不愿居于内者，饭时乃集。有仅投一宿予一饭者，则别为一所。国主时一临视，或遣子女代查，以昭慎重。

老儒会，则读书寒士虑其就食为耻，继粟继肉，遣人致诸其居。

绣花会，则世家妇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聚之深邃堂室，供给饮饌，使之纺绣而货之，禁男子不得擅入。

童艺院创于瑞典，继于丹马，后德国亦效之。每年两次令地方查明无业子弟，选其聪慧者，教以雕刻、订书等浅近之艺，限六礼拜学成。考验有效，集资以奖其师，而荐其徒于各工厂，俾谋衣食。

又有保良会，由妇女集金创设。凡有女子之飘流失所、沦入下贱者，设法保护之，或捐资以赎之。

疯人院：或因半生蹭蹬，一意贪痴，以致痰迷心窍，入院之后投其所好，以破其迷。如欲贵则奉以冠裳，欲富则聚以金宝，或择林园以优游之，置钓弋以消遣之，积久生悟，其病自除。每年院中或数十人，或十数人，时有出入，

颇著成效。

训哑院及训聋瞽院：有残疾者能令其识字知书，就其所能教以工艺，补天有术，施惠有方，用心亦良苦矣。

法国京畿内善会五区：一为施医院，一为济贫所，一为养老所，一为育婴堂，一为疯癲院。所用上下执役人等六、七千名，每年所需经费约一百万磅。其费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其一分则由工部局拨给。司其事者皆平日笃行好善之教士充之。

美国有劝世会、义学会、戒烟会、抚孤会、养老会、恤疯会、化罪会、防恶会、劝和会、恤贫会、劝农会、虞后会，经费或筹诸国帑，或捐诸民间，莫不经纬详明，实心经理。有保险公司，凡水火、盗贼、房屋、宝物无不可保，人之死、生、寿、夭，亦可出资以保之。

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保险之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贍。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费略加撙节，幸而此身无恙，即可周济同人；不幸自罹灾厄，则一身既延残喘，妻孥亦免饥寒。利己利人莫善于此。而水火、盗贼诸险，可由此而推矣。

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迹其意美法良，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

今中国各省或未及举行，或办理不善，堂堂大国，穷

民塞途，黑索赭衣，为海外远人所窃笑，抑独何哉？或曰：“如款项无所出何？”而不然也。夫中国各镇、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莪独乎？

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复得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谁不如我？风行草偃，谊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穷民绝迹于道路矣！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独奈何畏难苟安，自私自利者，颯然人上，充塞两间，竟疾视斯民之流离死亡，而漠然无所动也！

僧 道

二氏者，佛、老之名也。学佛者僧之徒，学老者道之徒。佛自汉明帝时始由天竺入中国。于时九重敬礼，公卿膜拜，流俗见而荣之。乃有求奉佛教者，明帝准其披剃，给度牒为沙门；女僧亦同，名曰尼。此僧徒之肇端也。老则中国所自有，相传始于老子，关尹子、河上公、魏伯阳皆其高足，由来尚矣。然徒虽代传，而实无道士之名，至秦初犹曰方士而已。其许民人出家度为道士者，亦始自汉，晋而盛之。唐妇女皆得入道，曰女道士。唐时多有以宫主、县君之尊而为之者。此道徒之极轨也。

夫二氏之教忽焉昌炽者，皆由于圣道之衰，儒术之蔽。自东周息迹，明王不兴，孔孟淒皇，世主莫能宗尚，于是泰山頽、梁木坏、麟笔绝、明辩穷。至吕秦之暴，燔诗书百家，坑儒者，延卢生、徐福之徒，其机已兆。降及汉武，侈然泰然，求神仙作宣室，极仙掌露台之奉，而文成、五利等辈风发而蜂起，乘势利为炫诱；及下诏轮台，途穷知悔，方士之风始少熄焉。

夫仙道贵长生，佛法贵无生。彼其世主始以一念之贪，欲永享万世之奉，故学仙求长生；及长生不可得致，而犹有畏死之一念者存，则佛法之皈依回向解罪释厄，又其所希慕为功德者，于是金人入梦，白马驮经，佛、老并峙，竟与吾儒之教鼎足而三矣。

历代以还，二氏互有盛衰。清时亦尝有沙汰僧道之诏，而卒至多方扞格，良法美意终不行天下，亦遂习与相处视为固然，虽宋儒极力辟之，亦靡见廓清之效，抑又何也？

独不思僧者何？凡以求学佛者也。道者何？凡以求学仙者也。而试推求佛、仙命名之旨，则佛者弗人也，绝类离群，不与凡人侔也。仙者山人也。隐遁空山，超人世而独立者也。考佛祖释迦当日舍一国之富、世子之尊而不为，而决然舍父母、背妻子，趺坐灵山。六载成道。老子当周衰，弃柱下史官，舍中国而不居，骑青牛出函谷，远辞人境而隐。其独善其身，视举世繁华富贵、声色货利莫可挽焉者仙、佛悉同，不可谓非希世之畸人，猛烈之丈夫也。故佛号大雄，仙称大觉，良有以矣。

间尝博览二藏，穷究丹经，则见夫佛之宗旨以绝欲出尘为始基，以忍辱受苦为功行，积久而能明心见性为入门。百尺竿头再须进步，则又以粉碎虚空、真如妙有为般若波罗密多，译云：“大自在也。至此乃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必至六尘、六识灭尽不生，始能直超彼岸，立见如来，名曰脱离垢境。向上犹有精进不已之功。功德圆满乃能成佛，未易悉数也。仙之宗旨大同小异，亦有顿渐之

分，三乘之别。其要旨亦以绝欲离尘为始基，积德累行为功果，以通关筑基、炼已纯熟、长生不死为入门，向上力追大乘，以结丹还丹，结胎脱胎，出神直返，到胞中浑沌之天，为七还九返。更进而益上，面壁还虚，自有入无，无无亦无，始能与天合体，历劫不磨，其功程之次第，无一非大难事也。

要之仙、佛同源，佛法详言性，而略言命，然《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则已微露其端。《道经》详言命，而略言性，然《关尹子》及《清净经》、《心印经》、《悟真外编》亦颇略阐其妙。总此二家，胥不离心、性二字。彼夫巢由之高远，渊明、宏景辈之旷达，庶乎近之。若琐琐焉屑屑焉，谋衣食、求安逸、骄气多欲、贪色淫志之徒，其去此不啻天渊之隔，譬之染缁求白，搏沙作饭而已。

虽然，仙、佛尚矣，后世之求学仙、佛者，自必酷慕乎仙、佛之超卓，希追随乎仙、佛之高躅，如是斯不愧其徒也。顾何以今之学仙、佛者，则又有大谬不然者何耶？其名则是，其实则非。名曰我明心见性也，而实则利欲熏心，豺狼成性。名曰我修真炼性也，而实则疏懒为真，色食为性。失志则打包云水，乞食江湖；得志则登坛说法，聚众焚修。于是逞其才智，募化十方，轮奂而居，重裯而坐，膏粱而食，锦绣而衣。其善者则结纳名流，怡情诗画；其不善者则附托权门，夤缘当路，通声气，市权利，或且聚狂徒，逞邪说，窝盗寇，干法令，与夫奸淫邪盗，凡乡党自好之流所断断兮不忍为者，而一切身犯之。犹哆哆曰：“吾

体佛法慈悲广大法门也。吾得神丹秘诀普度群生也。”此所以弥勒、白莲、金丹诸教匪因风吹火、乘势蜂兴而未已也。是直以害世为劝世，杀人为生人也，谓觉人迷而一己之迷转甚，谓解人罪而一身之罪谁怜，即以二氏之宗旨治之，亦所必屏诸门外者矣。尚何学佛、老之有？尚何得称为佛、老之徒哉？

况僧道两门所聚徒众不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男妇混杂，老少不伦，此其中愚若鹿豕，毒比蛇蝎者居多。而谓此辈乃能见发光地之焰慧，炼三花聚顶之阳神，与夫一切穷究阴阳造化之机，脱离生死轮回之秘，是则上智犹难一二觐，而固谓此辈蠢顽尽能晰兹妙谛耶？且其中雏尼、少僧、道童、侍者，类皆买自贫家，或为愚父母所舍弃。襁褓才离，缁羽已著，三乘莫窥其渊源，九等奚识其渊源？人世之趣靡所弗贪，二氏宗门悉其厌苦，削足受履其何以行？剜方就圆其何能器？是聚数十万旷夫怨女，而为盛世之灾疠也。借使由此极其旷怨，决裂堤防，垢秽坛场，滓污净地，是又为治世之妖孽也。即皆不然，无故聚此数十万、数百万有用之人，而习此一无所用之业，安居而逸处，男不秉锄犁，女不治丝布，能文字者不列士林，工会计者不操商贾，而衣食宫室百物之取给，皆不能上叩之天，下资之地，是仍以有业之民为其外府而已，供其腹削而已。吁嘻！此后世王政之所以不能复兴者，良有由也。

且夫数十万、数百万之游民而无衣食，窃傍二氏之门户为生活者，非尽游民无生计，实乃惰民而不勤生计者也。

其中真肯苦行希仙学佛者，百不得一，千不得百。又其中工文字者有书可读，习田事者有力可耕，习书算者有商贾之业可操，或有习拳勇能技击者有兵额之可补，行伍之可归，女冠及尼习女工者有蚕可丝，有布可织，就而拣汰之，三去其一矣。择其真心求仙、佛，确有所得，不肯再蹈尘境者，深山穴居，茅棚独处，任其高遁。今之僧道只知建醮超幽，敛人财物，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稣、天主教士设学校以教人，创医院以治疾者。即使独善其身，自修其性，亦当布衣素食，栖隐山林，何必于市朝酬应也哉！其年老力衰、多病残疾，幼弱未成丁者，改各州、邑大寺为恤贫院以处之，三去其二矣。所余一者，劝之不改，汰之不去，则不外昌黎之言：“人其人”，“庐其居”，革其衣冠，配其男女，少长必均。即以布施之庄田，为计亩授耕之用，宫观之园圃，为种菜、种树、蚕桑之区，设员督监，勤则赏以诱之，荒惰则刑以儆之，蔑不济矣。

然后明颁教令，使至今以后，有学仙、佛者，除其独身隐遁，岩居穴处，与木石居、无关王化外，其余四民家居，喜奉其教，读其书，茹素潜修者亦听。惟断不得创宫、观、寺、院，召徒众，募布施，蓄财货，登台说法，衣冠岐异，以惑斯民之视听。诚如是，则惰者不能独逸，黠者不能独智，愚者不致犯法，强者不致干令。僧皆授室，尼尽宜家，无怨女亦无旷夫。王化之行，郅治之隆，端自兹始。

独不见夫回教乎！彼族虽奉其教，诵其经，而人伦执

业不异四民，日用衣冠悉遵王制，惟不食猪肉等事，彼教自伸其私禁。故在上者亦安之而已。安见处二氏者独不可以如是治之耶？世有通人留心治术者，当不河汉斯言。

税 则

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于五两。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迨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厘捐最旺时，岁收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五百万，取于商者甚微，益于国者甚大，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订子税之说。查初办厘捐时，洋人之货亦在各子口征课，尚无异说。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始定洋货、土货一次纳税，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半税单为凭，无论运往何地，他子口不得再征。其无半税单者，逢关过卡照例纳税抽厘。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论厘捐之轻重，纳报费之多少。托其出名认为己货，如洋人亏空，凡代华商报关之货不能控追，及代华人出名在租界所买之地，亦弄假成

真矣。洋商坐收其利。有代华商领子口半税单者，有洋商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无厘捐；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手则无厘捐，在华人手则纳厘捐，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独诱张为幻，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利权，于国体亦大有关碍也。查香港、澳门无征收厘捐之例，商贾多乐出其途。

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所借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或虑西人不允，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准其随时自行更变，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况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说甚明。其二节云：“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历考泰西各税额，各国之税无不随时变通：大约本国所必需之物，其税必轻，或免税，以招徕之。夺本国土产之利者，其税必重，所以保本国之利。凡无益于日用之物者，其税必重，以其糜费于无用之地，欲民间恶而绝之。凡物有害于民生，如鸦片之类，不准入口。至于税则随各国自定，而他国不能置议，欲增则增之，欲禁则禁之，以其货为内政而不妨由己订也。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亦有全不征税者，

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中国通商章程第二段：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搀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烛、烟丝、烟叶、酒、家用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各物进口皆准免税。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日本税关皆用土人。凡船用家用烟、酒等物照例纳税。往时出口税重，进口税轻，出口货少，进口货多，今则反是。凡所需外来之物皆仿西法自行制造，且免税或减税出口，使商务日旺，进款日多。我国无业者众，更宜设法仿行。又查日本来往货物必须尽由海关码头上栈，验税后方可放行，不准另设码头。内地凡租界巡捕房亦归日本人经理，其猎狗、猎枪、猎地仿外国例皆有税纳云。各口已无洋船来往，严禁鸦片，不准入口，租界巡捕房、各国书信俱归日人经理云。

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珠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虽加数倍亦不为过。查旱烟、水烟、皮丝、净丝、黄条、青条，各种岁销数十万箱，亦可谓巨矣！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最妙莫如出口全行免税，进口则加重，庶己货可以畅行而来货自形壅滞，然恐一时难于办到，则加重入口税、减轻出口税似宜并行者也。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

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查出口茶虽至粗者每百斤价值十两，亦须纳

正半税关秤银三两七钱五分，连所抽厘捐，是值十抽五矣！进口货至贵者，例不过每百抽五，有失利权，大损国体。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国君须保百姓利权，不为外人所夺，庶免生计日绌。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也。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

当日海禁初开，华人不谙商务，一切船只之进出，货物之稽征，皆委洋人经理，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前上海英领事麦华陀云：今之赫总税司虽不负中朝之任使，第信之过深，于征税之余，复令经画沿海之灯塔、炮台，赛会事宜亦责其派人总理。在赫德感深知遇，原无挟持之隐、侵蚀之私，而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材可兼人，事难兼任，以赫德勾当杂事则可，以总税司分承他务则不可。何则？赫德不能不死，替人岂必尽如赫德，维持国计者必切深远之虑，斯立长久之规。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榷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扞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启、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多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或谓：“华人诚实者少，

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窦”。不知税则既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观瞻所系，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虽有奸胥，安能舞弊？

应请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权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厘捐

厘卡之设，由于发逆之乱军饷不继，征及毫芒，原属朝廷不得已之举，故议曰：“军务敕平，即行裁撤。”屈计发、捻肃清垂三十余年，屡经奉旨裁并。无如疆臣总以安置冗员为事，初则藉口于善后，继则借名于海防。广东有海防捐、筹防捐、台炮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捐、筹防捐。上海因有筹防捐，凡华商报关者须照洋关税纳半，所以华商之货概托洋人代报，免抽筹防捐，所谓为丛驱爵耳。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虽损于民而犹利于国。无如厘抽十文，国家不过得其二、三，余则半饱私囊，半归浮费，国家何贪此区区之利而纵若辈殃民乎？

近来内地局、卡林立，往往数十里之遥，其间多至数卡。或谓：“商贾走私，见某处有卡则思偷漏，闻某处有捐则将绕越，此防而彼窜，东堵而西行，以致走漏日多，收捐日绌，故不得不多设卡以防之也。”然而，既设卡以防走漏，不得因防走漏而复加捐。今乃过一卡有一卡之费，经一卡抽一卡之厘，此何为乎？

欲纾商困则宜示限制。凡商贾过冲要之卡，既完厘后即给以凭单，所经分卡一体查验放行，不得重捐。倘前卡未及完厘，准在后卡补完，以示体恤。将无关紧要之卡一律裁撤，既可便民亦可省费焉。所以论者谓，病民之端莫甚于厘卡。然而落地之有捐犹微也，莫患乎不肖委员从中勒索；照章之科罚犹浅也，莫甚于司事、巡役故意为难。此皆积弊之宜除者也。

迩来趋巧商人多有陋规之献，委员得其费则任意放行，否则必多方挑剔，司事、巡丁更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商船之过卡者，每月赠以银钱若干，则查舱时便潦草从事，所载货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厘者；其有不先纳贿者，则视之如寇仇，待之如奴婢，措留刁索，无恶不为。

杨然青云：间尝参究厘金盈虚损益情形，而知其故有五：厘局委员大则太守，小则县令，似不致贪黷致玷官箴。詎知候补人员皆视厘局为利藪，钻营者有之，奔竞者有之，甚至贿赂公行，苞苴迭进，差一到手便以为此乃生财之地，机会不可失也。于是以多报少，百计弥缝，而司事、差役又层层克扣，其实数上解者大约不过十之三、四耳。于库款曾何裨乎？其故一。

西人传教以来，民教动至齟齬，匪徒又从而煽惑之，往往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事定后则须赔款，或数千金，或数万金，至芜湖一案，多至十一万金。以有限之财，补无穷之累，虽抽厘日盛，其如耗费之过巨何？其故二。

商务旺则厘金多，商务衰则厘金少，此自然之理也。今

中国商务尽为洋人所夺。查光绪十三年，进口货计一垓零二兆二亿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九两。十四年，计一垓二京四兆七亿八万二千八百九十三两。十五年，计一垓一京零八亿八万四千三百五十五两。十六年，计一垓二京七兆零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一两。观乎此可知洋货日盛一日。夫西人货物多入中国一分，即中国商务多为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增，库款不能日裕者，职是故也。其故三。

自讲求制造以来，需铁甚巨，需煤更繁，即以日本、英吉利、奥斯的亚三国而计，前年售煤至中国计二十六万八千吨，值银二百余万元。余如军械等类为数更多。夫以库款之所入止有此数，而耗之者正无穷，虽欲不绌也得乎？其故四。

郑州决口而后河患频仍，前后费帑不下数千万金，而又继之以灾荒，如山、陕之大旱，江、浙之淫雨，朝廷蠲免钱粮，拨款赈济，为数颇非小可，且大荒之后十室九空，物力既衰，厘金必减，是亦库款致绌之一端也。其故五。

有此五故，此所以厘金虽抽，终无裨于库款，何如酌量减免^①反可惠彼商民。

寓沪各商贾金谓害商病民者有十：土产之物逢卡纳税，运之远方甚有税款视成本反巨者，土物不能远流。其害一。

凡货以速为贵，以鲜为美，凡遇关、卡必须俟其逐件盘查然后放行，过一乡越一城，逢卡三、四处者，则盘查之候已将一日，不惟时不速，而且货经其三掀四覆已鲜色全无矣，又将焉售？其害二。

丝、茶上市，则派扞手多人，如遇行人之有铺盖箱笼者，必伤之停车，翻箱倒篋，行同劫盗。其搜捕情形，有令人不堪者，致行旅为之裹足。其害三。

分卡棋布星罗，凡有肩挑负贩之流，断断焉必纳税，如有绕越则必指为逃捐，重索苛罚，甚有弃业而他徙者。其害四。

土货无捐，洋货有捐，有土酒盛于洋玻璃瓶者，即指玻璃瓶为洋货，拟罚。其害五。

又自行携带手巾一、二条为卡丁所执，指为货样先行出卖，预为走私地步，亦拟罚。其害六。

有渡船搭客，报关之货斤两不符，不但该货被罚，更要全船充公。所以粤东佛山昔年有罢市之事。其害七。

有随带高丽参一、二枝，或零星自用之物，皆以为私，或插赃诬害执以苛罚。其害八。

菱湖各丝行与捐局议定，凡丝止税出不税入，盖乡人携丝至镇，卖不卖未定，断无先捐之理。有卡中司事，见乡人载丝赴镇，因其老实指为漏税，罚银数元，以后视为利孔，老丝客有不允捐纳者，该卡司事持竹片向丝客乱驱，几致身无完肤，事载今年闰月初七日《沪报》。其害九。

有客自远方返里，携带行李辘重，不知捐例，因被执罚，然倾箱倒篋为匪类所窥，中途被劫。其害十。

其余无故留难，得贿私纵，因苛罚而致商贾罢市者，不胜枚举。虽饮食日用之微，西人带入中国尚不纳分毫之税，况民间琐屑之物，顾可一一抽厘乎？

尝闻某处厘卡，凡食物及箕帚无不加捐，虽一、二件亦必措阻，不捐即强携以去。有内地设落地捐局，民间抱布入市，每匹抽厘八文，向章五匹起捐，少则不捐，今则一匹亦捐。有设海防捐者，一巾、一扇、一鞋、一袜亦捐，民皆苦之。试思大商巨贾资本重盈，稍稍捐取尚不致大害，独此肩挑小贩资本能有几何？亦任意苛求，毫无顾忌，或携其物，或取其钱。

是以鄂抚谭敬帅出示免抽杂厘并定章程数条：一为鲜鱼、鲜虾担，一为鸡、鸭担，一为鸡蛋、鸭蛋担，一为青菜、葱韭担，一为柴薪、稻草担，一为果品、食物担，一为抱布匹求售者。凡估值五串以内皆准免捐，实为法良意美。拟请各处厘卡均照此行，无论何种琐屑之物，凡值五串以内，一概不准抽厘，则小民受惠良多，而于库款仍无损。盖琐屑物件捐与不捐原与国课无关轻重也。

更闻不肖司巡，更巧立各色名目剥削商民，如饭食等名色不一而足，无非为营私之计。即与辩论，彼且藉口于定章如是，并非格外索取，是使商民于正项厘捐外又多几许私派。谓商力能不日艰乎？嗟彼商民，何以堪此！为今之计，尤须严除积弊。除弊之法，首在选诚正委员。示之以赏罚，严之以考成。委员得其人自能严以驭下，而司事、巡丁亦不敢作弊。其有愿充巡丁、司事者，须纳银为质，并觅妥实保人，倘有不法事情，除罚去质银惟保人是问外，即行斥革，严加治罪，庶几罚一儆百，或不至鱼肉乡民也。

总之，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莫若将所有厘卡一

律裁撤，并归洋关。鄙见于土货出产之处，加抽落地捐，及至出口时，再抽一洋关税后，则任其所之，绝不再征，以免洋人取巧。东洋人改造土货出口，西洋人用三联票出口，均为可免厘金之故。

至各处盐务，即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谓之盐赋，如田地之有赋税，由州、县官按亩征收。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则节省耗费甚巨。

或仿外洋之例，出售印花，盖税饷，印花大小不一，小者如外洋书信馆之印花，俗呼为公仔头者。凡寄货物，提单、汇票论税之轻重，即粘印花之多少于货物之上，而无巡丁、委员勒索等费。

方今圣明在上，固已兴利除弊，泽溥苍生，矧兹理财之要图，可不速加整顿以纾吾民之积困乎？

子潜氏曰：厘金之弊罄竹难书。按厘捐之设，原为不得已之举。当夫粤、捻倡乱需款孔殷，国家用以济饷，能使削平大憝、重奠河山者，未始不藉商民之力也。原议军事救平即行停止，不谓承平已三十年，而局、卡林立未见撤裁。加以各省办理不善，倚势肆法，任意抽收，以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负贩肩挑苛索不免，物价日昂，民生日蹙。

其实资军饷者十之二、三，饱私橐者十之七、八，是以候补人员百计钻营视为利藪，而大宪亦藉以此项差使调剂属员，几若有其举之莫敢废焉矣。况多设一局即有一局之开销，多立一卡即有一卡之费用，上至总办、委员下至司事、巡丁，一切薪水、工食，其果取诸厘乎抑不取诸厘乎？此中耗费不问可知。

迩来叠奉谕旨将局、卡删并。在封疆大吏岂不欲仰体皇仁，恤商艰而纾物力，无如军饷所出，若将局、卡悉行裁撤，则各省善后经费何从措置？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也。惟是厘捐一日不撤，商困一日不苏。

欲救此弊，莫如以厘金并入关税，一次抽收。查通商定例：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每值百两皆抽银五两，为进出口正税。土货转运别口，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别口，在三十六个月内给发免单，逾期照完正税。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皆每百两抽银二两五钱，为内地半税。乃查泰西各国税额，大抵以值百抽二十、四十为多。亦有值百抽百者，更有两国有衅多至值百抽二百者，皆视其事之损益以定税之轻重，从未有值百抽五者。今设一例，华商、洋商一律以值百抽二十为断。凡洋货进口，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土货出口，纳税于第一子口，悉照新章完纳，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而遂将厘卡概行裁撤，是举从前积弊一扫而清之也。在国家可省无穷之耗，在商民可免到处之征，实于公私两便。

所虑者，洋商或从中阻挠耳。然洋货纳税后转运别口，在三十六个月外必复完正税。洋商运洋货及入内地购土货，又有内地半税，今以一次完纳，虽若稍重而仍可加诸售价内以取偿于华民。且关税交纳后运入内地无守候验货之劳，无逐卡停留之苦，行运既速，成本亦轻，各国洋商亦未必不从也。^①

① 自“子潜氏曰”以后的文字，是《厘捐》篇的附言。

捐 纳

捐纳一途昉于汉之纳粟得官，本衰世之政，而行之于今几视为终南捷径。窃以为此必须改革者也。

何则？官所以维持公道，若私心不绝，则必公道不明。捐纳者仕版未登，债台先筑，势必剥民偿欠、蠹国肥家。其或称饶富、号素封者，而以钱买官，亦复同于垄断，纵使清廉自矢，亦不能取信于人。夫鬻爵卖官乃弊政之尤，此盖古昔权臣乘便营私，借是以窃朝纲而收物望，所谓拜爵公朝、受恩私室也。今之捐纳几同市道，明相授受固无虑此。且捐班中正多奇士，明白世事或胜于科甲之人。今欲一旦骤行废之，天下怀才求仕者，得毋因此而舛望？不知吾正欲使天下之人，人人皆可以为官，天下之士，人人皆可以从政。惟必先废乎此，乃能兴乎彼耳。

且夫捐纳之中，亦有数等。抱理烦治剧之长而屡试不售，怀御侮折冲之略而资格不符，捐纳不行则其人何以表见？矧与其奔竞权门、夤缘窃爵，孰若输资国帑得遂明扬？此捐纳之实情也。今吾将于数等之中，为取才之方而公之

以选举。若存捐纳之一途，则才将以无所鼓励而自废。以废才而授之政，非所以重名器也。官者出与民间办一切公事者也，其人而有能，则人必乐其为官。是官无求于人，而人有求于官。夫至人求而后为官，名器之重则真重矣，其能副乎民望可知也，其能善于从政可知也。以是治民，民必蒙其福。盖其人地与民相近，情与民相亲，必能视民事为已事，而于职自无废弛，民自日征其悦服矣。官民一气，而世或不治者，未之有也。而非先废捐纳不可。

夫取才者视其法之真伪，以真法取才，则真才出，而伪才去矣。以伪法取才，则伪才进，而真才亡矣。今当振奋之初，事求实效必自官场始。而官尚清廉，必自废捐纳始。官之大患曰贪，捐纳者输资于国而欲取偿于民，求其不贪，安可得乎？夫国家不患有谋利之人，而特患其谋利之不善。盖利赖不兴则民生不遂，民生不遂则国势必衰。则何不令捐官之人转为商贾，作商得财，人皆仰之。作官得财，人皆鄙之。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自辨矣。

中国民殷物阜，世之席丰履厚者最喜于邀爵秩以为荣。捐纳若设，则国家亦有所资。捐纳者当给以虚衔，而不畀以实官，是或一道也。至于豪商大贾、巨室富家，或乐善好施，或急公奉上，亦宜宠之以簪纓，荣之以衣顶，以励庸流，用知劝勉，亦为情理兼尽，惟不可使之身临民事。

夫捐纳之弊，其害已至于不可问。即使旅进旅退无所短长，而捐纳之例存，则为官失治平之本领，捐纳之例废，则从政得称职之真才。张弛之机，实系乎此。

盖捐纳既停，则凡人一技之长、一艺之擅皆可以为官，而有志于技艺者无不见其专长独擅，凡一法之善、一事之能皆可以入政，而留心者愈众。孰得而掩其所善、没其所能？如是，又何俟乎捐纳也哉。且天下之才有以鼓励之则无限量，吾将以无限量者收才，才皆入吾夹袋之中，是无才非吾才矣。盖捐纳留则才隘而私，捐纳废则才广而公，必然之势也。

民既不捐官而为商，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如利藪可兴、办有成效者，国家给以称颂功牌。若生意不前折阅负累者，国家许其报穷免究。如此而商务不振者未之有也。今华商之善贾，虽西人亦自愧弗如。捐纳一废，则善攻心计之流皆转而为斗智投时之举，而国家之阴受其利者多矣。

且夫人之所重惟利与名，使为贾者不得为官，则人或以商务为浊流而鄙夷不屑，乃为官者正不嫌其为贾，则人将以商务为正路而黽勉以图。商贾中如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况官由众举而来，磊落光明，此捐纳者之婢膝奴颜声价百倍矣。

故捐纳行虽欲求好官决不能得，捐纳废虽不欲求官，而官将辞之不得矣。且也捐纳废而后好官出，好官出而后公道明，公道明而后民志畅，民志畅而后国运昌。我国家宜知所务矣。

停 漕

三代以上有贡道，而无漕运。禹贡纳桎、纳秸、纳粟米不出五百里外。春秋之世，未闻转侯国之粟以贍王畿。秦攻匈奴，飞刍挽粟，率三十钟致一石。武帝灭朝鲜，转运甚远，率十余钟致一石。此漕务因军务而起也。初未闻官俸民食概仰给于遐方也。古之良法，一州之米即以供一州之食，求转输于数千里之外，迂矣！唐初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藉以养兵。元行海运，无甚劳费。明永乐九年，会通河成，遂废海而用河，劳民伤财几竭天下之全力。

国朝仍沿明制，二百四十余年帑项之耗耗于漕与河者不可数计。其设官也，有漕督，有中军副将以下各弁，有漕标兵，有各省督粮道，有仓场总督，有坐粮厅，有巡漕御史，有卫守备四十人，千总六十人，运丁数万，运河官、闸官四十一人，闸夫数千。其给漕费也，运丁各授屯田使耕，每船给田千亩，少亦数百亩。其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拆造，皆给例价。头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粮，运丁有行粮诸费。凡运米百石，例给耗米五石，银

十两，以不敷用，州县给以免费，积渐至七、八百两。民力竭矣。各衙有千总领运，漕督又岁委帮押官，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丞倅为总运。沿途有地方官催趲。又有漕委、河委、督抚委，自瓜州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员越多费越广。一总运费二、三万金，一重运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趲，费皆逾千金。至淮安盘粮，则有漕督之弁兵；通州上仓，则有仓督之经纪。加以黄河口额设官驳船，山东、直隶、通州、武清皆有之，合算不下三千艘。以及浚河建闸、筑坝。通盘筹算，非四十金不能运米一石入京仓。此漕运所以为无底之壑也。

究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定于天亦定于地也。米至京仓，岂能尽归实用哉？查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仅十之一。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转买杂粮。约南米一石仅合银一两有奇，官俸亦然，四品以上尚多赴领，其余领票转卖于米铺，石亦一两有奇。夫南漕自催科征调，督运验收，经时五、六月，行路数千里，竭万姓无数之脂膏，聚吏胥无数之蠹贼，耗国家无数之开销，险阻艰难，仅而得达京仓，每石之值约需四十两，或二十两，或十八两不等。而及其归宿，乃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实绝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饱。相沿不改，此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推原其故，朝廷深思远虑，以为岁无南漕二百万石流通，则一切杂粮必牵掣而骤贵，兵民必有受其饥者，故不惜繁费而为此。然自轮船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

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中有米局，官中有米局，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

应请通飭各省改征折色，其耗费一概带征，并归藩库起解。至旗丁京官应领俸米，或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或按照市价，则每石折银亦不过二两有奇。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一切漕河之工程，海运之经费，漕督粮道以下之员弁、兵丁，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之胥吏、差役，皆可一律裁汰蠲除。是国家开销岁省奚啻千万，而反多数百万盈羨，官兵两项所领实银且较增于从前领票转卖之值。公私两途一举而均得大利，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亦何惮而不为哉！

即使虑及岁饥乏食，则每年提出盈余银数十万两，在津兑买南米，存储通仓，新陈互易，以为有备无患之计。其事亦轻而易举。如虑海疆有事，外人得以持其短长，恐将来官商两病，殆有甚焉，盖名为官米，则敌船可以捕拿，名为商米，虽仇国亦不能阻截。公法具在，有例可援。况米石可不在接济之列，是可不必要多方顾虑也。

夫运漕之法，惟期事速费省，今漕河既塞，铁路未兴，惟恃海运以济京师，或以海氛不靖，运道不无阻绝之忧，议以陆运为代。然劳费百倍，且所雇粮车时有沿途载逃之患，非计之得也。或曰：“海运行之数十年有效，盍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耗折百端。虽简于河运，而所费仍复不资，约需二千

数百万两，两湖、江、安尤巨。虽所耗在民者多，而国家所损亦不下千万。乃其归宿，石米易银一两。何苦令万家膏血掷之虚牝耶！

当今筹款万难之际，理财者何惜一举手之劳，改为折成库银，汇交户部耶？惟折银价值，宜随时划一，不得加多勒索，以致困民，方为尽善。惟当轴者所为颺颺焉顾虑者，岂以漕务人员、夫役无所仰食，难免滋事，故不敢发此难端欤？不知此实无足虑也。将来铁路既成，道途开辟，如开矿、垦土、筑路，地利迭兴，需人甚众，又何虑难以安置耶？且拔大疽者，不顾小痛。以或然之虑，废经国之方，岂智也哉！况漕运废，则淮安农田不致因蓄水济运之故，乏水插秧，有“不荒于天而荒于人”之叹。淮安农田五月初栽秧，取水悉资运河，故江、安粮船例于二月过淮，四月过竣。如迟至六月过竣，漕督飭属闭闸蓄水，济漕上驶，淮地插秧无水顿成荒年。乎，其虑之可保绝无也。

今河道北徙，漕运不复，海运亦非善策。惟折色纳官，实为利国便民。观前中允冯桂芬所著《折南漕议》，查咸丰十一年奏奉谕旨，裁撤河督、河道并文武各官一百五十余员，汰除老弱弁兵。今河运未复已四十余年，与昔年南河各缺虚费饷需情事相同，而今时库藏支绌倍难于昔。其为应裁已无疑义矣。吾望当轴者尚亟亟焉以行之哉！

度 支

度支者国家预算出入之数也。泰西各国每岁出入度支皆有定额，不能逾限。如明岁出款若干，进款若干，两抵之外尚欠若干，户部即于今岁预为之备。若有军务急需，则辟院集议另筹。所有进出各款，岁终刊列清帐，布告天下，以示大公。故外国税重，百姓不怨。且朝廷所征大都烟酒及贵重之物，得自富家，无损小民。

惟中国尚无度支清帐颁示国中。闻本年五月户部奏称：常年进项七千余万。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出。今筹办海防，购船置炮须款甚巨，非借洋款不足以应急需。

当仿泰西国例，议定一国岁用度支之数。先举其大纲，次列其条目：畴为必需，畴为可省，畴属无益，畴尚缺乏，滥者节之，乏者增之，必需者补之，无益者削之，合京省内外而通计之，则常经之出数可得也。次则核查行省二十一部：每岁田赋所入者几何，地丁所入者几何，洋关税所入者几何，常关税所入者几何，厘捐所入者几何，盐政所入者几何，沙田捐、房屋捐、海防捐、筹防台炮捐所入者

几何，油捐、茶税、丝税及一切行帖、典帖、契尾杂款所入者又几何。每省分立一清册，核定入款，详列其条目，刊布天下。镜存子云：“向例由各省官办飞金、铜、铅、木植、丝、布、纸、蜡、颜料等类，先饬查有无相沿商民津贴，分别改饬商办。比较历届开支之多寡，兼知各省物力之艰难，又派交各监督、盐政、织造办运常例备赏之件，宜加查核：有无节年库储，量为减数。此为节省各项杂支。至整顿各关常税、木税，惟有悉照洋关办法：须将各路货物名目亦均分别登载价值，每届岁首由各省达部，于税课盈绌、贸易通滞，系以总分叙论，列以任卸衔名，汇刊总册，发坊广售。掩饰无计，积弊或除。”使官绅百姓家喻而户晓，了然于国家之所取于民者固有一定之数。

举所谓加摊、火耗、部费、平余一切浮费而悉空之。明定为制钱之数，或定为自铸银钱之数。而后商民不用加纳，胥吏不得上下其手，官司不得中饱其囊橐，部书无由驳沮其报销矣！则常经之入数亦可得也。

凡一出一入编立清册，综核比较为赋财出入表。出有逾则节之，不可任其渐亏也。入有余则储之，不可供其虚耗也。此合国内各省为通盘理财之法也。

更令各官岁呈简明清册一本，实记一关之出入盈虚，关册汇齐乃会合而详核之。要知中国之财流出外洋者若干，外洋之财入我中国者若干，两两核较，而其出入之大数可得知也。出入惟均则姑任之。出浮于入者则必详究其所以失之故，当兴何项商务以补救之。入加于出者亦必详究其所以得之故，当若何悬赏以鼓励之。此合中外各国为通盘理

财之法也。

观泰西各国之筹国用，盖无论土地之大小，人民之众寡，未有不如此者。此特言其大略耳。此而不知，何足以言理财？亦何可冀阜财乎哉？然而财活物也，未定所生之数，必先定所用之数。定之奈何？欲明养廉之原，请先自定官禄始。官禄丰足以养其妻孥，而后贪酷之风可革也。欲官不朘削民财，必先自定君用始。君用俭，内府无所中饱，而后深宫不萌侈泰之私，上下一德，内外同风，而小民之急公奉上，弥心悦而诚服矣。安见中国有财匱之足患哉！

国 债

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其国虽为别人所得，仍须照还。故各国兴大役、出大军，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动辄数千百万。或每年给息，或按年拔本。君民上下，缓急相济，有无相通，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

当法、越有事之时，粤东筹办海防，需饷孔亟。余曾条陈当道，请仿西人之法筹借民款，准由各海关银号出票，按年清利。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数目无折扣，成色无高低。借款至百万之家，有司宜优加礼待，善为保护，不得借端勒捐，以示体恤，则民间必踊跃乐从。

昔英国政府因库帑充溢，欲将国债全数归清，而英之富民咸谓：“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不乐收领，再三稟请，愿将利息减轻而后已。法之国债每年交息银六千万两，可谓巨矣。而民间尚肯贷之者，则以政府尚信，足以取信于民，而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较之他处为稳也。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法几为德灭矣。若宗社为墟，国债将谁索乎？不知万国公法，国之债

贷于民，还债之项出于地，债与地合而为一，其地为谁有，则其债应谁偿，此民之所稔知，所以无虑也。

夫财犹水也，惟患其壅塞，不患其流通。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苟能示以大公，持以大信，试借民债以给度支，成一时济变之良规，即以葆万世无疆之盛业。较前日之开捐例以鬻爵，借洋债以损国，设厘卡以病民，其利弊得失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万一贷之己民而缺仍有不足，始可酌以微息，转贷邻封。考英、法、德、美诸国，借贷行息三厘，多不过四、五厘而止。若土耳其、波斯等国，则因欠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授于他人，国势浸形微弱。中国幅员之广，矿产之饶，远胜泰西，人所共悉。入款甚多而借款甚少，无须重息可贷多金。前此洋债行息至七、八厘以上者，非经手侵渔，即洋行扣折耳。闻中国借券之股份，中外人争购之，每股九十五磅有涨至一百零四、五磅者。外国之债股分单时有涨跌，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由是观之，中国虽少出子金，仍能应手。

闻我驻英某大臣曰：“嗣后筹借洋款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此两行专与各国挪借银钱，素有名望，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借巨资。他处银行万不能及。洋人尝言：刻中国借银百万，必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所借之数，所给之息，指明某某口关税备偿，本利分作若干结，按结支付，限年还清。银行应允借款，收存文契，即将银如数兑交。此向来筹借洋款之情形也。该银行如果自

有巨款，此法尚属可行。无如仅能担承，实非殷实。中国既与该行议定，该行即出具百两券票一万张，从一至万。买股者或买一张，或买百张，多寡不等。迨头结还款到期，何人之银先收，何人之银后付，不可预知。其故何也？盖券票之涨跌无定，券票跌则本钱恐缺，人思速还；券票涨则利息依期，人思久借。爰创拮据之法定还债之期，免疑该行有偏袒之弊。此等办法虽极公平，然股多之人本钱必有亏损。盖收回全数，或收回半数，非到拮据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料理于先，收回本钱复入股份大为不便。倘将来再筹借款，须设法补救此失，始易通融。必将放债诸人不便之事代为通盘筹画，若稍有妨碍，势必增长利息，益受其亏。欲策万全，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银限定年月，一次全还。一曰按结归款，先于券内载明：第一结归还若干，第二结、第三结归还若干，俾得早为料理。彼放债者亦乐闻。某国借债建造铁路、电线、开矿、治河一切富国之政，利息大而券票强，甚不愿出资借人，妄作耗财无益之事。尤恶借债用兵，将银钱变作火药、弹丸，万一亡国破家，则借款将成画饼，不但失去利息而已。”驻英大臣之言如此，可深思其故矣。

我国家量入为出，本有常经，前时借债外洋，权应一时之用。金磅高下既受巨亏，嗣后洋债一端自应永行停止。况目前所借并非外洋真正殷实商家，仍由银行担承后，每股百金听中外商民购买。该行董事转得上下其手，坐收利权。中国廿一行省殷实商民为数不少，但使由户部及各藩

库仿西法出给股票，每股百金，定期归还，按年行息，收放出入诚信无欺，安见中外商民之信户部者必不如其信银行，信中国者必不如其信外国乎？即万不得已而再借洋债，亦须统筹全局，审慎周详，不必再托在中国诸银行经手，以免辗转扣折，亏累无穷。但饬驻英使臣径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行息不过四、五厘。

中国屡借巨资，素守信义，欧西各国共见共闻，大可与其本国国债之息银低昂相等。苟还本之期定以一、二十载，则彼民之有资出借者亦可作为产业，踊跃集资，盖贪利之心中西无异。利可图矣，虑其不可恃以致失利；利可恃矣，又虑忽借忽还不能久享其利，亦中外具有同情也。且也，贷债既多，则中外之交欢愈固，而国本愈坚，几有休戚相关之势，亦情理之出于自然者也。若借资以筑铁路，可径向外国名厂如德之克鹿伯、法之科鲁苏、英之塞斐尔，与之订约：凡铁道所需轮机、轨辙照市作价，俟工竣后按年拨还，则称贷之款可减，转折之耗亦省矣。今中国息借洋款以海关作抵，其诚其信为天下万国所无，乃以此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而甘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此所以洋款一事遂为通商以来一绝大漏卮。而泰西各国识之士且啞啞然窃笑于其后也。则不知彼己之情者，决不足筹交涉收利权也。

国债借自英、俄、法，不如借自美利坚。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借镑数不如借银数，盖英、俄、法属地与中国毗连，时有交涉

之事，恐一有齟齬，为彼挟制要求。若借自美国，则无此虑。借百数十亿，利息须四厘至六、七厘。如借数百亿，利息不过三厘。闻有人肯借三百兆，利息三厘，且系借银数，准分三、四十年清还。中国何不允商借以清还各国重利之款，又得此巨款，可以百废俱兴。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庶可藉收速效。借镑数不如借银数，因镑价已昂，似有跌无涨之势，不如借银还银，免再蹈前辙镑价吃亏也。^①

^① 自“国债借自英、俄、法”以后的文字，是《国债》篇的附言。

商战上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誓乎。而彼族乃啞啞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之易觉，商之掎克敌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

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篋、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是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之，大宗亦有二：曰丝，曰茶。计其盛时，丝价值四千余万两，今则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茶价值三千五百余万两，今仅一千万两。杂货约计共值二千九百万两。罄所得丝、茶全价，尚不能敌鸦片、洋布全数，况今日茶有印度、锡兰、日本之争，丝有意大利、法兰西、东洋之抵，衰竭可立待乎？次则北直之草帽辫、驼毛、羊皮、灰鼠，南中之大黄、麝香、药料、宁绸、杭缎及旧磁器，彼族零星贩去，饰为玩好而已。更赖出洋佣工暗收利权少许，然亦万千中之十百耳，近且为其摈绝，进退路穷。

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又如此。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何怪乎中国之日愈哉。

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行市瞬变又遭明折。似此层层剥削，节节欺给，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罄，遂成羸痿癯病之夫，纵有坚甲利兵，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特设商部大臣总其成，兼理工艺事宜，务取其平日公忠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念者方胜厥任。并通飭各省督、抚，札谕各府、州、县官绅及各处领事，仿西法由各艺各商中公举殷商及巧工设为董事，予以体面，不准地方官借此要求。凡有商务、工务应办之事，可随时禀报商务大臣。或商务大臣不公，有循私自利之心，准各省商务局绅董禀呈军机转奏，庶下情上达，不至为一人壅蔽也。

古语云：“独任生奸，偏听成乱。”可不戒欤！既设商

务局以考其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其精进，赏牌匾以奖其技能。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布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来百工之条。是商贾之学具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与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酿酒制糖，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纱，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六在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七在广制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整顿磁器厂务，以景德之细窑，摹洋磁之款式，工绘五彩，运销欧洲，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宁之机法，仿织外国绉绸，料坚致而价廉平，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更有无上妙著，则莫如各关鼓铸金、银钱也，分两成色，悉与外来逼肖无二，铸成分布，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各色银锭，概令赴局销毁，按成补水，给还金、银钱币，行之市间，既无各色锭银，自不得不通用钱币。我

既能办理一律，彼诿能势不从同，则又可战彼洋钱，而与之工力悉敌者十也。

或曰：“如此兴作诚善，奈经费之难筹何？”则应之曰：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所耗海防之经费，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值，岁计几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财战不以力战，则胜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乐，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刀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廩饩以优奖之，赏赐牌匾以宠异之，或具图说请造作则藉官本以兴创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贵人贱己，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然后更视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贵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

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

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所出绒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并能影射洋货而来售于我。查通商综核表，计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余万元。从前光绪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进出相抵，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前后相殊如此，商战之明效可见矣。彼又能悉除出口之征，增入口之税，以故西商生计日歉，至者日稀。邻之厚，我之薄也。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纵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商战下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

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形战者何？以为彼有枪炮，我亦有枪炮；彼有兵舰，我亦有兵舰，是亦足相抵制矣。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盖利器为形，利用为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则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于人？故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

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

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所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是故国家首贵知人善任，尤要洞识时局。如我力量不足，当忍辱负重，相与羈縻，待力量既足，权操必胜，有机可乘之时，则将平日所立和约，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均可删改。如彼重税我出口货者，我亦重税彼进口货以报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今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之要端，只知征商以媚上，凡有所需，非以势勒，即以术取。如广东往来内河轮船，每船已报效银若干，尚为各关、卡留难阻滞，而卡员、差役往来附载皆不出舟资。若挂洋旗之船，虽载货闯关，亦惟瞠目视之，无敢勒索。华商之货逢卡纳厘，多遭搜括，时日耽延，不如洋人三联票子口税之便，安得不纳费洋人，假洋人之名以图利益欤？所以代报关之洋行日见其多，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耳。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况乎言富国者必断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而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自然国富兵强，何虑慢藏海盗？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之明效也欤！

商务一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圆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招商暹罗逐緬寇而主偏陲。美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微服赴邻邦，考求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泰西各国凡拥厚资之商贾，辄目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亦邀国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课税必权其轻重。昔罗马尼亚有贾于俄者，富甲一国，俄王与结昆弟，有女遣嫁，遣使往贺。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孰谓闾閻中竟无人豪，顾可一例目为市侩哉？西俗呼为市侩者，如德国官典章程：每物估价给三分之二，每马克月利三分，凡六月为满，其私押则当值少而利重。此等虽系典商，最为官绅所鄙。其官督民开者以十三个月为期，息五厘而已。质

物者必以购物质票为凭，否则以住屋租纸呈验，或令房东作保，违者不纳。

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俱当代为熟筹。”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蜜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辘轳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腴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庶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

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官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什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

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緘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就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总局则令各处行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务之绅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日本业已效法泰西，虽一介商民，有运土货出售外洋者，欲见某官，商务局董即赐函交其面呈使臣，为通介绍，毫无费用。中国能如是乎？如有要务，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而后商情自不壅于上闻矣！夫如是，则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

至今日而策富强，倘不如是，内不足以孚信于商民，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夺。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值。颠倒错紊，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倘有贤能督、抚大吏，洞明利害本原，奏请将厘金概

行豁免：在江海巨埠者并归洋关，在内地口岸者改归坐厘，或由商务局妥筹别款，弥缝厘金之缺，何至华商受其害，而洋商独收其利也哉！

商务二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中国袭崇本抑末之旧说，从古无商政专书。但知利权外溢，而不究其所以外溢之故，但知西法之美，而不究西法之本原。虽日日经营商务，而商务总不能兴。凡大、小学堂只知教习举业，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故读书不能出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岂知西人读书各专一艺，如算学、化学、光学、电学、矿学、医学、农学、律学及一切制造各务，皆足以荣身富国乎？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当取法泰西。

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监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出入之多寡，销数之畅滞，月有稽，岁有考。虑其不专，则

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则悬金牌以鼓励之。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或虞过重，则轻出口税扶植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各国每埠皆设有商会，京都设商务总会，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与议院相抗，如有屈抑，许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恃以无恐。

昔年英吉利僻处一隅，闭关自守，曾不百年，其兴勃焉！则以极力讲求商政故也。京都皆开商务学堂，教习通商规例，以便贸易远方。时有精于商务之人特著一书，谓商学之要有五：曰地学、金石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物学。书分四册，首言货物来源，次言工艺制造，三言古今商务兴衰、沿革、更变，四言近今商务。凡欧洲通商之地，植物、生物、金石内所得各物，所生材质，皆分门别类，言之綦详，以教本国学生，并教导他处商人，获益非浅。

或谓：“商贾之事，只须略知贸易情形，即可逐蝇头之利。”岂知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欲知此道，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近人思得新法，先视本国土，宜上占天时，下穷地力，究货产之盈亏：何物最饶？何产最良？或注意一种，或若干种，宜制何器？意有专属，其业始精，能使乍见者必生欣爱，欣爱者必须购用，庶得其道矣！如各种货物增出愈多，则新法更为繁琐。盖懋迁有无之事，匪独一家之利钝，并关一国之盈虚。

古者交易但贵布、帛、菽、粟，后世工艺大半弓、冶、箕、裘。此其中但有工于会计，识见过人者，则获利较优。

故知市面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此格致之学言商务者不可不知也。外国新植一物，新得一法，必笔之于书，以俟考究。据英商云：同治十一年，有英国医士在新加坡游玩，见土人手持一斧，其柄非木非皮，不知何物。遂询之土人，略知出处，即购此柄寄回英国，由博学士考求，知为橡树所制，其质柔脆可以伸缩自如。于是用橡树所制之器甚多。印度格克得海口有油铺主，一日见油盆之外，盆有树根丝缕缕明晰，主人大奇之。适制绳工匠某亦来同视，皆以为见所未见，遂将此物寄呈英国考究。知此根丝可以织布作袋制衣，倘与蚕丝拼合同制，乍见者竟莫辨其为真丝、为根丝也。嗣后日益讲求，采根丝组织布疋，通行国中。今北鄙苏格兰一带，根丝一项亦为入款大宗。一百年前美国有贩木棉赴英者，其时尚不能将棉花制物，后有艺术之士明制造之法，乃能以棉纺纱，以纱织布，于是制布分棉，成功极易。棉花销数极多，英国织布之业独胜他国，商务又为之一新。近年西人不独购中国鸡毛、羊毛、骆驼毛，且购猪鬃毛、黄麻、乱丝头、柏油、五倍子等物运至外国，用机器制成绒毯、台布、窗帘、缎布、蜡烛、洋墨水，出售中国者甚多。我国如就地制造，以省运费，获利必厚。且闻四川有煤油井，有沙石，可以自制玻璃。当道者欲辟利源，胡不令商民仿而行之？

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腴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洞识通商利害，谓：祛其害，得其利，则国富兵强；失其利，受其害，则民穷国困。究其避害受利之故，在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而已。是以仿行西法，特设商部，通饬各处设立商务局，集思广益，精益求精。日本自设商务局后，如有洋商买卖不公，即告知商务局，集众联盟，不与交易。华商人心涣散，各自怀私挟诈，致使外人乘瑕蹈隙，坐收渔利。若茶价跌，则说货不对样，非退则大割价，所磅斤两吃亏尤多。凡华商买洋商之货，无不先银后货；洋商买华商之货，则先货后银。竟有延至日久不清者。商务种种吃亏，皆由人心不齐，亦地方官无以鼓励之所致也。事无大小，情同一辙。不独仿造中国土货，更仿造西洋各货，贩运外洋，价廉工巧，人争购之。如有亏折，商部大臣设法为之协助，闻昔年日商仿西法制造之货亏耗过重，不能销者，官为之拍卖，或运售他处。拍卖者，西法也，授意拍卖之人先登告白，订期招人，当众出价，以价最高者得之。俾再营运，无令中道气沮而业废。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竟以富商者增国帑，而其捐资报效之多，固无论焉。

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邦商船源源而来；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船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

前顺德黎召民方伯曾集股创设肇兴公司，开庄伦敦，卖买货物，举余出洋总办，并请郑玉轩京卿、邓小赤方伯相劝。余答曰：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可行。若预先买货待涨，非熟悉该处市情消长，货色盈虚不可。似宜先往外洋设一茶叶磁器行号，兼代买卖丝、茶，或附搭殷实可靠之行。俟开办三年，熟悉该处贸易情形，然后大举。倘能奏请朝廷，所有各省军械悉归我行承办，聘一素精枪炮、轮船、机器之人考究，止收经手用费，不致洋行浮冒，以旧充新，则必两有裨益。况承办军械洋行，上海计有数家，岁须缴费二、三万金，其利之厚可知。闻中日之战，天津信义洋行承办军械，该行买办尚分得二十余万。其获利之厚，更信而有征矣。我公司得此利息，亦可赖以维持。奈方伯急于开办，谓所议难行，茶叶磁器生意过小。乃大张旗鼓，请刘述庭观察、梁鹤巢司马开办，名肇兴公司，不及三年已停闭矣。由此观之，可知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先立于不败之地，逐渐推广，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务广而荒，必至一蹶不振。然则名曰通商，于通之一字，总未能实践力行也。

近日朝廷虽有通饬各省督、抚振兴商务，及各制造局准招商承办之谕，惟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纵使官吏精明，愿为保护，恐继之者贤否莫卜，或有要求不遂，更速其祸。孰肯以自有之利权，反为官长所执？故殷商大贾更事多者，明知有利，亦趑趄而不敢应召；即有应之者，恐其假托殷商认办某事，实则别有所图。十余年来，时有

劣员串同奸商，或稟请当道承领某行捐费，广东各业炮台捐费，皆招商承办。或仿西法创办一事，托词业已集股若干，奉札到手，始设局招股，以公济私，既非殷实，亦无长技，事终难成，而为其所累者已不鲜矣。

按西例：由官设立者谓之局，由商民设立者谓之公司。总理公司之人即由股商中推选，才干练达股份最多者为总办。初未尝假于官，官特为之保护耳。今中国稟请大宪开办之公司，皆商民集股者，亦谓之局，其总办或由股份人公举，或由大宪札飭。凡大宪札飭者，无论有股无股，熟识商务与否，只求品级高，合大宪之意者。皆二、三品大员，颁给关防，要以札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位卑而权轻者，相率而听命。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试问外洋公司有此办法乎？且历观商务由官专办者终鲜获利。闻近年中国商情，惟棉纱匹头大占利益。上海纺纱局获利甚厚，而湖北织布局仍虞折阅。其故何哉？窃恐各委员不免仍拘官场积习，非但不知商务利弊，不通权变而已也。

故欲整顿商务，必先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以所苦而从其所乐，而后能推行尽利。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或谓内地商务所以不振者，其弊有三：一、厘卡日增，商贩成本加重。二、卡丁、差吏额外需索。三、商伙任意

舞弊，甚至拐骗、盗劫，不得申诉严惩。欲祛三弊，必须痛除积习，妥定新章。既仿西法创设商部，并通飭各府、州、县及各处领事，劝谕各设商务局，群策群力，同德同心。尤宜设商务学堂、博物院、赛珍会，以为考究之所。凡物产工艺不如人者，商务大臣与各商务局随时随地极力讲求，务探精意，分条剖晰，普告众商。或有多财善贾，奇才异能，创办制造、机器、矿务、轮船、电报等局，或博闻强记，著书立说，均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当奏请朝廷给予匾额，以示鼓励。诚若此，则商贾中人材辈出，将见国无闲人，地无弃物，自然商务振兴，而闾閻日有起色矣！

商务三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我中国自军兴而后，厘金洋税收数溢于地丁，中外度支仰给于此。夫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无商何有税？然中外司会计之臣，苟不留心商务，设法维持，他日必致税商交困而后已。四海困穷，民贫财尽，斯历代之所由衰乱也。

查英国设商部专理其事，于商务讲求最精，故收效亦最巨。派驻各国领事，岁将该国商务现在一切情形，详报商务大臣。余译有《泰西商务》一书已详言之矣。法、美踵其迹，而亦步亦趋，均致富强。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贸易，并立博物院罗致各国货物，以藉资效法而广见闻，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兴。奥国近亦讲求，分为三类：一则银行典质货物暨保险各事。二则制造各法及销售运货脚价。三陆地转运之法，并邮政电报各事。是以泰西各国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然各国工力悉敌，出入损益，厥势维均，则不得不以亚洲各国为取财之地，牟利之场，此亦必然之势也。

夫亚洲各国贫弱者无论矣，其最大者惟中国，次则日本。故挟全力而俱东，争开口岸，勒订条约。设领事以资保护，屯兵船以壮声威。或勒免关卡税厘，或侵占小民生计。取求无厌，要挟多端，必遂其欲而后已。日本初亦受其朘削，至大藏省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王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

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日本自平萨岷马乱后，至今积银赢四千万。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大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

夫以日本之小，且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羸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封雇商船，强令承役，只图自利，罔恤民生。私囊虽充，利源已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

欲求利国，先祛二弊；欲祛二弊，先自上始。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昔英国思兴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颁恐不便于商务，于是下令：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次环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于是在朝之士俱由商务而来，而商务遂甲于天下。我中国苟欲振兴商务，推广利源，曷取英国成法，仿行而变通之，以尽祛前弊乎！南、北洋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如种茶树棉，养蚕缫丝，织布纺纱，制造毡毯诸事；倡立鸦片、煤、铁、磁器、火油诸公司。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

者，皆可运售。而又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此其权之在上，而必大为变通者也。

至于下则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再由各府、州、县札饬各工商设立商务公所。须如王君紫诠所云：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商民工匠见诸官绅，皆缄口不言，恐犯当道之怒，祸生不测云。当听工商仿西法投筒自举商董。所举商董或一月一会，或一月两会。会日洞启重门，同业咸集，藉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勿作浮谈，勿挟私意，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以类相从，各抒己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一存会所，一存商务局。每年每季仿外国商务工艺报刊印成编，分遗同业户各一本，俾考市廛之大局，知趋避之所宜。夫而后百货通，百废举矣。商务局凡有所见，咨禀于南、北洋通商大臣。倘遏抑不通，即径达商部，一年一次汇禀情形。商部统计盈虚，上达天听。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

更有说者，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查泰西各国，轮船通商只准径到一埠，其余沿海、沿江各

处，乃该国民船自有之利，外人不得侵夺。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甚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我朝廷宜设法保护商民，并换去关上洋人，庶无偏护，如日本国家设法卫商：使外来争利者亏本自退，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中国商船之利悉归我有。否则仿外国例，岁助商船公司带书信箱水脚银百万两。欧洲各国通例：凡邮船往来归公司办理，而书札一项惟朝廷独擅利权。然传递又赖轮船，故国君皆助给经费。计法国每年拨给一百零四万三千五百十三磅，德国一百万磅，俄国四十五万磅，意国四十万磅，英国六十六万五千磅，日本八十八万元。多造坚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及华人寓居之埠，如南洋诸岛、北洋、海参威及朝鲜、日本各口，皆可以运我土货，畅销各国。又准公司添派小轮船，往来各省内河。船中驾驶、管轮悉用华人，以免滋事，遇有战务可仿西例报效国家。如是则利权渐收，商途日辟。中国地大物博，宁第与各国争雄海上已哉。即他年大一统之机缄，亦权舆于是矣！

商务四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理也，通于商务矣。夫贸易之道固以土产及土产所制之物二者为之纪纲，而国政民情未尝不与商务相维系。明乎此而后商务

可得而言矣。

英吉利商国也，恃商以富国，亦恃商以强国。曷为曰商国也？专藉商舶以觅新地，辟新埠，纵横五大洲，遍布于中国沿海、沿江地方，其与国政相维系者如此。艺术家日益精良，化学家自研新质，创耕稼新机以教农人，得粪溉新法以兴树艺，其与民情相维系者如此。窃尝究英国商务之所以兴旺者，其故有十三端，有为中国之可及，亦有为中国之难骤及得：曰地气清和，曰矿产甚富，曰国内水陆便利，曰海口多。此四者中国固有之，无不可及者也。曰百工技艺娴熟，曰首创机器擅利独多，曰资本甚巨，曰程法尽善，用人得宜，曰商船多，曰五大洲皆有属地，曰言语为商务通行，曰通商历年最久，曰近日出口货无税，进口货亦不尽征。此九者他国亦有难兼，中国所未能骤及者也。

姑举中国商务情形论之：一曰专业收放者为坐贾，此无甚远大之志，以彼出以此入也。一曰贩运出境者为行商，货不能得厚利于近地，必待转售于他乡，或数百里，或数千里，此其志在速销，以货往以货返也。一曰独商。商本不充者不能创设大庄，商资稍裕者辄喜独开生面。一曰伙商。人二为从，人三为众，向称股份者如是已矣。西商公司之法行，我商局大为一变。然止闻集股之害，终未见集股之利。

然则至今日而言商务，我君臣上下无不欣然艳羨，起而效之，独奈何不揣其本而师其末乎？揣本之道奈何？除

设商部立商务局诸大端前已详哉言之，复有两说于此：

一在先明大地贸易兴旺之故也。地面近赤道者曰赤带。近北极者曰冷带。两带之间曰温带。其土产之利既不相侔，而飞、潜、动、植之象亦觉大异。推之五洲之物，一国之物，一省之物，均未必同，惟彼商人世处其中，或各精一业，或力兼数业，究其大宗之源，实亦不外讲求天生物产、百工技艺两大端。

一在先明城镇口岸兴旺之故也。地当孔道、位镇中央必开大埠，如中国之周家口、汉口、樊城，俄之麦思果，德意志之伯灵是也。江海相接，内通数省，上下数千百里，如中国之上海，英之伦敦，法之立瓮城是也。海口便于泊舟，为海道所必经，中国之香港久为英人占踞者是也。支河一线，内外通海，埃及国之苏伊士河是也。势扼河、海要隘，地甚狭束，希腊与美国答陵湾是也。两海相夹，形如箕舌，南洋锁钥，东、西咽喉，新加坡是也。以上七项皆商埠要区，能占地势之大利者也。既商地之利有七，凡为商者孰不思得一地利以自居，倘或能兼数利，而商务不兴旺者未之有也。

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燕台、牛庄等处。有昔为大埠今就衰落者，如中国之清江、周家口、樊城等处。观船舶之多寡，知河道必有变迁；观海道之飞轮，知中道河南、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观火车之渐通，知旱道必增巨埠。有识者固思捷足先得，亦惟多财者乃能力着

先鞭也。况通商之利固有常经，亦多变局。

试观埃及国昔年缘国属罗马，例应贡麦，埃民遂加意麦种，而麦产贸易之旺者数百年。德国有地名活登倍克，凡民间娶妻者令种果树若干本，其地至今多果利，此因国法而竟能盛兴商务也。昔年英国禁种黄烟，烟贾无利，今弛禁而烟贩遂盛，此以禁令宽猛而可觐商务兴衰也。英国海口昔时麦税甚重，面粉价昂，后减轻收税，面价廉而麦贩愈多，此以捐税轻重而可验商务兴衰也。又有两地物产同而贸易之兴旺则未必同，盖旱道多，山路险，运脚必重，铁路近，轮船便，运脚必轻，此以运脚多寡而可衡商务盛衰也。顾天下政教不能道一风同者势也，而天下土地必须相其物宜者理也。不同者原难一例相从，不宜者仍需互相补救。试观中、印善种茶，而英国善织布，故英人常购中、印之茶，而售其布于中、印也。法国善织丝绸，英国善铸铁器，故法国常购英之铁器，而售其丝绸于英国也。美国富棉产，英国精造船，故美国常购英之船，而售其棉于英国也。于此可见各处有本产，即各业有专门，父传子、子传孙，各守恒产，业精物美，而即以其有余，补其不足。此交易之各得其所者也。

至若天气温煦，雨暘时若，则土产之物必鲜美而价廉，是谓得天时者也。土质膏腴，地脉滋润，则所产之物必丰富而价平，是谓得地利者也。技术有师承，制造多心得，则所出之物必精美而价高，是谓得人和者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乎此，方足与言商务。吾愿言商务者，

究其理而推行尽利可也！

商务五

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并由商务大臣酌定税则，恤商惠工，奏请朝廷颁示天下，悉如前篇所论。如有新出奇器，准给独造执照，及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俾臣民有所遵守，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以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庶商务可以振兴也。查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当道虽时欲整顿商务，挽回利权，究竟未知扼要所在，数年来工商生计愈见其绌。若再不悉心考究，徒效皮毛，仍如隔靴搔痒，有名无实，或言不顾行，势必至国困民穷，不堪设想矣！故书中反复详论广开学校及设技艺、机器、格致书院，撤厘订税、恤商惠工诸政，为当今致富之急务，非此不足补救万一也。

尝阅西书英国每岁集刊《列国政治》一书出售，西名《士得士文也卜》，凡各国之政治、兵船、铁路、火器新旧多寡，国用土产

等项，无不备载。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自设立制造局，风气一开，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惟物料仍需购之外洋，且剿袭西法，而不能尽得其秘，所以仍不能夺其利权。至民间近亦讲求机器：成衣用机器也，造纸用机器也，印书用机器也，磨面用机器也，碓米用机器也。然尚不过试行，而未能推广。今则缫丝机器规模宏大，出货甚多；而纺纱、织布之机器，则更利市三倍，推广愈甚。此商务之转机也。然各种机器仍须购自外洋，不特民间购取之不便；而洋人明知华人不能自造，往往格外居奇，要求善价，且多有以用过之旧物售之中国，而中国暗受其欺。且置一机器不知其所以然，而但知其所当然，偶一损坏，仍须倩洋人修理。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

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而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外洋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入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

且中国地居温带之中，所出之物悉较外洋为优，无如中国优于天工，而绌于人力。中国以为无用之物，如鸡毛、

羊毛、驼毛之类，洋人购之造之，人巧夺天，竟成美货。在华人以为洋人购此无用之物，可以得利；而不知洋人成货之后，售与华人，其什百千万之利仍取偿于中国也。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欧西所夺，而内地之利权又将为日本所夺矣！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

况丝、茶为出口货之大宗，年来养蚕、制茶之法均不如外国，其利亦渐为所夺，出口日减矣。尝考外国制茶新法，皆用机器以代人工，力匀而工省，制精而易成，无天雨不晴之虑，一切巧妙之处，日人已著书详言之矣。蚕丝较茶出款尤巨，法人郎都近创育蚕会，用显微镜测视，凡蚕身有黑点者谓之病蚕，即去之，讲求日精，故所养之蚕较中国出丝恒多三倍。虽然中国向有治病蚕之法，惜未考求尽善，常为病蚕所累，出丝不多。洋关税务司康必达著书详论其事，并遣人赴法国学习。利导可谓甚勤，奈华人积习未除，风气未开，尚罕信者。

考泰西各国最尚格致之学，有一事必设一会，集天下之深知此事本原功用之人，不厌繁琐，一一考究详察，以尽其利。譬如种田则必究其未种之先，何等种籽宜于何土，燥湿何宜；既种之后，必究其何以长茂，何以蕃实，必使业此者毫无遗利而后止。今访求养蚕各节，即此意也。泰西于蚕桑一事，亦设有会，托各国各就所产情形，专心考

究。此会设有年所，其于蚕之一物如何生长，宜食何叶，何以肥壮，何以有病，如何医治；何以必到其时不食而眠，每次眠时是何形状；何以必到其时乃上山结茧，其茧是何色样，何以茧有大小；何以必到其时乃出蛾，其蛾是何色样，有无疾病；何以必到其时蚕乃发生，又何以一年内再生至五、六生，即二蚕、三蚕至五、六蚕，如何使其不再生，而留其子使次年始生；所吐之丝何以有粗细韧脆，何以光洁，何以暗滞；何者为得天气之宜、地土之宜，究应如何蓄养，始无遗憾；所种之桑何桑宜何地土，何以茂密，何以虫生，如何去虫，何叶宜何蚕；又有各种野蚕，各种半家半野之蚕，何以为野，何以为半家半野，何蚕产何处，何蚕生何树，食何叶，何种可取回畜养，何种不宜取归，其蚕及蚕茧、蚕蛾、蚕子如何收取，如何功用。会中历年讲究，早得窍奥，不存私见，坦白大公，随时荟萃出书，布散各国，使人增长学问，有所仿效，俾无遗憾。但格致之学精益求精，无有止境，故是会仍就各国访求，不厌繁，不惜费，因蚕桑有关国计民生，亦皆各国公款所出，诚重其事也。

中国蚕桑之法讲求者，原不乏人，特忽略者众，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用旧法畜养，衰旺委之气运，年产不能递增，端在讲求不得其道耳。至各种野蚕，则更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实亦大有利用。今欲华人能知取益防患之法，必得会中新出之书考究仿效，所裨诚非浅鲜。欲振兴商务者宜知之。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①

尝闻上医贵能知病源，而尤贵如扁鹊之于齐桓公，能知病于未发之先。苟徒见病治病，不治其病之本源，则旋愈旋发，日见其殆。外邪易侵，百病必丛集矣。

治国者亦何独不然。今中国自为日本所侮，更为泰西各国所轻，皆知我兵将之弱，军器之窳，国库之空，汉奸之众，吏治之坏，民心之涣。莫不狡焉思逞，蚕食狼贪。尚欲以我之矛刺我之盾。当此时艰孔亟，如病者危笃之候，若非主治得人，力求治法，虽有对证之药，恐为庸医所摇，因以坐误，厥病何由瘳乎？

昔俄、日积弱之时，俄之旧主彼得，日之亲王大臣，皆肄业泰西，并聘其才德兼优之士数十人回国佐理。我国亦当筹借巨款亟仿而行之。

余侧足名利场中，留心中外时事三十年于兹矣。穷究成败之源，粗知治乱之理，旷观时局殊切杞忧。诚如陶中

^① 本序是郑观应为《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所作。

丞疏云：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畏受訾警，或曲为附和，或甘于缄默，绝无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风。平日视危为安，视弱为强，文武骄惰，莫由觉悟。一旦有事，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务虚名而贾实祸，诚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又云：若非激扬士类，则虚文相市，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济艰危，非精究洋务，则成法虽高，可以制上寇而不可以御外侮。皆至论也。

幸圣明在上，广开言路，一腔热血，罔识忌讳，不揣固陋，用成《危言》一书，藉旌木之献。惟中日战后，势殊事异，情形已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言，奋笔书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深通时事者名言伟论，合共二百篇。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勿畏难而惮改，速求三年之艾，以起痼疾于已深，则大局庶几有豸！于以奠安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不难矣。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①

经云：“上工治未病。”如扁鹊之望齐桓，能于病之未来洞见症结。苟俟其既见而治之，不探其得病之源，杂投方药，纵获暂瘥，而元气日损，客邪易侵，百病丛生，病加于小愈，殆矣！

治国亦然。我中国之病，其源在于学非所用，遇事推诿；其流在于粉饰徇私，见利侵权。自南败于法，北败于日；于是兵力之弱，军械之窳，府库之空，学校之陋，吏治之坏，工商之衰，民心之涣，向之上下相蒙者，至此予人以共见。

东、西各国假保商、护教之名，肆蚕食鲸吞之计，既据港口，复窥腹地，购粮练兵，以我之矛刺我之盾，明告译署，谓某省不可让人，长江、西江各口内地任彼通商行船。而我国工商旅食彼国者鄙为野蛮，非驱逐出境，即重征身税。种种欺侮，凡有血气，共抱不平，稍具知识，亦

^① 本序是郑观应为《盛世危言》八卷本所作。

深耻惧。惟当道敢怒而不敢言，安于苟且，保其富贵。士商愈屈而愈愤，苦无生计，急欲图新。内讧外侮，势几不可以终日。彼崇新而强，我泥古而弱。善夫纯常子云：“今使房、杜为相，孙、吴为将，而仍用今日之制度，果足以富强而与各国争抗乎？故拟先变法而求人材以守之。”英士傅兰雅有云：“处二十纪之时，行十九纪之法，何异冬葛而夏裘，岂第貽人之讪笑！”呜呼！我中国人民矿产富于他邦，何反不能自立，而衰弱至此？

余读各国史论，究心世事三十年于兹矣，深察古今盛衰之故，粗知宇宙利病之情。昔俄、普、日积弱之时，俄彼德、日亲王皆肄业强邻，借才异地，用能日臻富强。普之转弱为强，亦由其后细雷鼎新革故，其伯相所设良民会固结民心。我中国丁此时艰，欲变法自强，非政府得人，取俄、日、普变法之成案，实力仿行不可。若行一新政，必饬六部、九卿、各省疆吏会议而后定，恐守旧者多聚讼盈廷，纵有变法终不免暗袭成规，有名无实，譬如人于病笃之候不能自主，全赖左右，而左右谬谓知医，虽有和缓之方，嫌其异己，谓非所宜，妄为加减，欲求疾瘳难乎不难？

尝闻德相卑士麦论中国人材不如日本。余于癸巳、甲午年间，曾以中西学校之优劣，农事之丰歉，工艺之巧拙，商务之盛衰，与夫议政院之利弊，养贫院之章程，策格致书院肄业诸生，各举所知以备当道之采择。奈何衮衮诸公不知师长弃短，或鲁莽以僨事，或隐忍以偷安，是故中日之役不应战而战，中德之役应战而不战。陶子方制军云：论

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一、二有识者，非曲为附和，即甘于缄默，绝无古大臣交相儆戒之风。一旦有事，又不肯平心体察，谬托正论，骛虚名而贾实祸，诚可痛也！

今幸圣明在上，广开言路，一腔热血，罔识忌讳，用成《危言》一书，藉作旌木之献。惟中日之后，势殊事异，情形又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绪，奋笔述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近人名言伟论，都计二百篇，以期天下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毋畏难而惮改，则大局庶有豸乎。《易》曰：“不远复，无祇悔。”余为斯世望之。香山郑观应后序。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